



引用格式:马俊峰,马继.恩格斯历史间距性思想探究——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5):1-6.

中图分类号:A1;B0-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5-0001-06

恩格斯历史间距性思想探究

——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Exploration of Engels' s historical spacing thought

—Rereading Ludwigs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马俊峰, 马继

MA Jun-feng, MA Ji

西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恩格斯对政治与哲学之间关系的间距性分析表明: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紧张,其实质是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知性冲突的一种表现。一旦把这个问题置于思维与存在之关系的架构中,间距性分析将为解决哲学与政治、哲学与现实、政治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奠定基础。这种间距性分析为我们正确把握知识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演化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恩格斯的政治哲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
恩格斯;
历史间距性;
政治哲学

收稿日期:2017-07-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ZX015)

作者简介:马俊峰(1969—),男,甘肃省张家川县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哲学。

“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阅读主体与阅读对象之间、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间距。哲学解释学对此的解决方法是诉诸阐释的视域融合。这种融合既承认存在着历史性间距,又主张在理解中消融这种间距,这使得同一与差异在阅读中得以同时呈现。其实,文本阅读就是主体在努力实现理解上的一致性的同时,也使得内在蕴含的差异性得到进一步的延迟。因此,反复性阅读和理解就非常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不在场、空缺、隐匿之实在结构得以显示,从而真正达到对文本的新的有效性理解。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拟对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进行重新解读,旨在透过言语深入到其内部结构,探讨隐含其中的历史间距性思想。

一、互为表里的哲学与政治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在《终结》的开头提到了一种历史性的间隔。他认为,这种间隔容易使人们对过去产生隔膜,这不仅表现在经验层面,而且还表现在人的意识记忆方面。历史性使得人们的意识产生一种连续性的观念,使得每一个发生的事件通过历史方式传递给下一代。但是,当过去发生的事件在记忆之中所遗留的踪迹对记忆本身是一种刺痛或者伤害的时候,记忆就会不愿面对,从而有意或者无意地逃避事实,使得间隔在时间上延续,以此让自己在忘却记忆之中传承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恩格斯的话语:“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1]214}

在恩格斯看来,这样的历史性间距使得人们有可能对历史的理解更为客观、正确。如果

深入到历史事件中,受其情势的影响,人们将会变得不理性,被历史人物的激情和主观性偏好左右,换言之,人们容易用感情取代理性。这样,将会无法真正洞察历史的真相,而历史也将封闭或者隐藏自身。一旦人们理性地对事件进行哲学的批判性反思,就会立刻变得清醒与明智,就会对事件进行深入分析,而这种严密的逻辑分析对于历史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基于这种历史间距分析方法,恩格斯对18世纪的法国与19世纪的德国进行了历史性的比较,试图准确理解和把握政治与哲学的内在关联。恩格斯说:“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不同啊!法国人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士底狱。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1]214}这就是说,哲学在法国人那里,比在德国人那里表现得更为激进。哲学是对真理的追求,而真理对基于意见建立起来的政治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这就使得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而变得紧张起来。随着二者之间冲突和矛盾的激化,政治权力就会围剿从事哲学的人。政治权力在无法支配哲学强力意志的时候,就会启用国家机器来对付哲学,以保证政治权力畅通无阻地运行。此时,哲学就成为政治的死敌。可以说,政治权力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来有效地确保自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恩格斯在对哲学在德国处境的分析时提及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在当时的德国成了官方哲学,它协调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和矛

盾。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黑格尔哲学是如何解决哲学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的?恩格斯在《终结》中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黑格尔哲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这意味着,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对“真正真理”的追求,而是一种国家哲学。这样,哲学就丧失了本真,成为政治的奴仆,它不再对政治进行批判,成了普鲁士封建王权统治的捍卫者。这样,政治与哲学握手言和,共同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支配和操纵着人们。

由此可见,恩格斯的历史间距性比较方法,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哲学与政治内在关系的两种类型。一种是激进的关系。哲学对现实政治的积极介入,通过批判方式指认政治权力运作中存在的问题,纠正其偏差,力图建立正确的政治权力逻辑运作机制。如果政治当权者不愿接受哲学提供的观点,二者将会进入“斗争”状态,这种“斗争”就是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的激烈较量。另一种是保守的关系。哲学沦落成为对现实政治的辩护,放弃自己的求真意志而转向对权力的追求,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以实现自身。这种不顾原则性的妥协埋葬了自己,从而也将终结了哲学自身,这种哲学妄图“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1]219}。总之,如果哲学与政治处于激进关系中,哲学的处境将是不妙的;而哲学的妥协,又会让其堕落成为服务政治的工具。

恩格斯告诉我们,黑格尔构建自己哲学体系时,似乎提供了第三种可能性。不过,这种做法也使得黑格尔哲学遭到了很多褒贬不一的评价。恩格斯以黑格尔的一个哲学命题为例对此作了分析。这个命题就是众所周知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1]215}。这个命题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人们往往把他们对该命题的理

解等同于黑格尔本人所表达的意思。他们认为这个命题把一切现存的东西神圣化,不仅威廉三世是这样看的,其臣民也是这个看法。恩格斯认为,我们有必要纠正这样的错误认识。恩格斯区分了“现存”与“现实”这两个概念,认为这是澄清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认为,“现实”不等于“现存”,二者有着本质区别。这也就揭示了一般大众理解哲学观念时容易把“现象”等同于“本质”、把“偶然”视为“必然”的通常倾向,而哲学尊崇理性逻辑,提出的命题是一种普遍必然性的表述,蕴含着辩证否定。所以,恩格斯说:“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成了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1]216}恩格斯因此颠覆了一般人把现存神圣化的形而上学观念,从而由时间间距转向空间间距。这种转向具有极大的变革意蕴:旧的间距建构的观念被消解,新的间距建构新的秩序和观念。

二、辩证法的政治向度

基于这种间距转向,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哲学并非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是对现实政治的辩护,而是具有重大的革命性,究其原因“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

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1]216-217}恩格斯揭示了黑格尔哲学之中的合理性成分,这就是它的革命性的辩证法。也就是说,革命性是基于现实必然性,一旦维持现实必然性的条件不复存在了,现实也就失去了其现实性,就会被另一种必然性取代。这种否定的辩证法意味着一切事物及其观念都是暂时的和相对的。运用这种辩证法去审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到,黑格尔哲学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反而蕴含着对普鲁士王国很大的颠覆性。可是,这种革命性并不是黑格尔本人的主张。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哲学的革命的辩证法为它自己建构的体系所窒息了,“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1]218}。恩格斯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拯救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凸显其革命性就成了恩格斯所要做的工作。

恩格斯把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置于政治和宗教实践活动中,指认选择黑格尔辩证方法的人,在政治与宗教方面就是最极端的反对派;选择黑格尔唯心体系的人,在政治与宗教方面就是保守派。这样,黑格尔学派就分裂成了左翼和右翼。这两派在相互斗争中,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走向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而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使得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样一来,“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1]222}。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与方法之间的矛盾随着其体系的解构而随之消除。因为这样的矛盾其实负载于体系,而这个体系是客观观念,它的负载物会随着实体观念的破除而消失。恩格斯因此告诉人

们,一旦基于哲学视角去理解政治和宗教的时候,就会遇到诸多矛盾。这种矛盾显然是体现在观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方面。而观念与观念之间因张力敞明空间,必然与偶然、本质与现象镶嵌之中,在滑动与停留过程中弥合和修补裂隙,间距产生的空隙在晦暗不明中“绽放”。

因此,一旦我们从实践出发洞识哲学、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够辨识问题产生的根源,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这种有效方式不是把黑格尔的全部遗产“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而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2]40},而是采用新的方法即辩证法。“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2]112}在这段话的前半部分,马克思把辩证法视为一种主观辩证法即思维规律;在这段话的后半部分,马克思把辩证法视为一种客观辩证法。鉴于此,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中对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做了深入阐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解始终坚持客观的运动规律,无论是自然、社会还是思维都服从这个规律。这也从另一方面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要建立一门历史科学的主张。这也充分说明认为自然与历史之间存在对立只是一种旧的历史观,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作就在于确立一种新的历史观来超越这种旧的历史观。实际上,恩格斯在《终结》中强化了这种思想,即在一般运动规律的

辩证法意义上强调自然与历史的一致性。可以说,如果说辩证法是马克思研究历史的方法论,那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辩护和宣传的时候,不正是从历史科学的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来阐明它的方法论及其科学性质吗?^{[3]502}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他们自觉的写作不再是一种纯知识的需要,而是始终服务于现实分析和传播自己的思想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就辩证法的问题来说,只是在任务变得迫切、马克思本人没有精力完成它的情况下,恩格斯才毅然地承担了它。《反杜林论》的创作直接证明了这一点。”^{[3]302}而这种“服务于现实”的实质就是旨在把辩证法锻造成为“批判的武器”,即要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最终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可以说,马克思正是通过批判和革命的辩证法,揭示了资本危机和这种危机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瓦解的规律,从而从根本上为人类解放找到了一条现实道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而恩格斯在《终结》中同样也指出,“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1]258}。也就是说,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成为革命的主体,才能真正完成人类解放的使命,他们才是辩证法的真正实现者。

三、词与物间距指称非法使用的伦理后果

恩格斯在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时,针对哲学家们对世界本原问题的不同回答对哲学做了划分,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恩格斯写道:“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1]224-225}这就告诉我们,这两种关于世界本原性问题的回答仅仅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区分。问题只在于认识主体选择不同的认识方式,其实践作用各不相同,仅此而已。

从恩格斯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用语来看,他更具有一种后来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的味道,即拒斥形而上学的语义学观点。语词在意义上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词与物并非一一对应,相反,语词的意义是基于语句表达和语境而产生的。恩格斯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一旦成为党派斗争的原则,就会演变成为一种理论武器,就不再仅仅被视为思维方式的不同,而是被建构成为不同阶级的政治立场。这样,一种信念就被确立起来:无产阶级是唯物主义的继承者,它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着先进生产力。恩格斯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研究,深切感到费尔巴哈哲学虽杂糅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在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理解上融入了道德价值取向。这种做法给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带来了许多麻烦,特别是让唯物主义蒙羞。恩格斯指出,一旦“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思”^{[1]242}。恩格斯这是在告诉我们: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只是在知识论语境中才有意义,它表明了人们头脑中的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反映关系,更进一步表达了知识的生产方式。而一旦我们用已获得的知识去透视世界的时候,我们最为关注的显然是这种知识是怎样的反映,也就是说,我们称之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概念仅仅限于知识论领域,否则,对它们的使用就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

恩格斯进一步认为,“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模糊了”^{[1]253}。就是说,不是所有的

观念都能够提升为一种知识,观念与现实之间的间距,可能会使得一些知识转化成为意识形态,“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1]254}。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对自己拥有的观念产生的根源有正确的认识,意识形态也就终结了,而人们使用自己获得的知识去认识与改造世界,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恩格斯再次指认无产阶级为主体,“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1]258}。德国的工人阶级之所以能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就在于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德国工人阶级的生存处境使他们认识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9}。可以说,德国工人阶级选择德国古典哲学,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而完成这个使命的实质是把哲学变成现实。恩格斯试图表明,知识的生产者使得知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基于对自身职位和收入的担忧,会把知识转化为意识形态,与官方保持一致,以乞求自身利益得到保护。而工人阶级在面对生产出来的知识的时候,兴趣指向科学本身。因为工人阶级的生存处境能够使他们超越外在于他们的名和利的约束(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使得求真意志与求善意志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会运用基于这种统一确立起来的权力意志,争得话语权和领导权,从而达到解放自身,实现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

总之,恩格斯对政治与哲学之关系的间距性分析,使我们看到,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其实质是一种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之间在知性上的冲突,一旦把哲学与政治置于实践层面上,“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4]73}。这样,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构成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哲学与政治和现实社会生活关系问题的一种思路,它为解决哲学与政治的冲突,以及哲学与现实、政治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关系奠定了基础。这种间距性分析既表明关系内在冲突和矛盾的正当与合理,又表明解决矛盾的可能性。这种间距性分析为我们正确把握知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演化关系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说,它既为我们解构关系所固化的结构又为我们建构新型关系提供了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恩格斯在《终结》中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间距性分析方法,这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恩格斯的政治哲学思想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胡大平.回到恩格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引用格式:王浩斌,陶廷昌.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历史贡献[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5):7-13.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5-0007-07

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历史贡献

Cai Hesen'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王浩斌, 陶廷昌

WANG Hao-bin, TAO Ting-chang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和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蔡和森,不仅率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而且从理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及其发展史进行了探索。从历史背景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个人自身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对社会主义的不懈追求,是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主客观条件。他明确了从学说史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科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逻辑基点、根本问题和重要途径。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过程中,蔡和森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和辩证法原则,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特色,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

蔡和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收稿日期:2017-04-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KS017);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4YBA398)

作者简介:王浩斌(1976—),男,湖南省双峰县人,中南大学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有着两重内涵,它既是指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史和演变史,同时也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说萌芽、形成、深化和拓展的变迁史。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和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蔡和森,在早期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不仅率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而且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学术层面……作了可贵的理论探索……蔡和森留法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化的探索,结合于他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与实践,从学术层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1]。蔡和森的这一理论探索实质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说及其发展史的探索。全面系统地总结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说史的历史贡献,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互相作用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蔡和森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还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说史的理论探索,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厘清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说史的历史背景,有利于深刻地认识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说史的历史贡献。

1. 国外背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自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世界

历史进入到了一个崭新发展时期,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时期或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爆发的无产阶级依靠武装暴力直接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是在帝国主义实力较强的法国诞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而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帝国主义较为薄弱的环节发生且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些事件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对中国的进步青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所引发的示范效应是息息相关的。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并从四个层面对其进行了具体的划分:一是从革命已经成功的层面,指出俄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二是从革命正在进行的层面,指出中欧及巴尔干战败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正在发动的国家;三是从革命孕育的层面,指出五大战胜国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尚在酝酿中的国家;四是从革命觉醒的层面,指出土耳其、波斯、埃及、印度、朝鲜、中国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属于无产阶级觉醒后由爱国运动引导到“布尔什维克”上去的国家。蔡和森在科学分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改造中国与世界”^{[2]57}的主张,也就是主张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因此,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胜利,构成了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说史的国外背景。

2. 国内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说史,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所引发的示范效应为根本前提,而且同中国近代以来积极寻求现代化发展的出路所引发的实际需要息息相关。当时国内文化危机所引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需求,导致了蔡和森这一理论的探索。历史地看,当时国内文化危机所引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需求已然成为影响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发展和演变的主要因素。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亡国灭种危险之中的中华民族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历史抉择。历史表明,无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发动的器物层面(如引进西方技术等)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制度层面的戊戌变法,都不能引导中国摆脱内忧外患的窘境,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至于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尽管他们把矛头直指腐朽的封建制度,但由于自身和时代的局限性,都相继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但未能建立起新的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社会制度,此后的军阀混战使中国社会更加黑暗和混乱。要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出路问题,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反思和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找到生长点,即实现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进而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蔡和森联同毛泽东等人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发起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运动,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无疑为蔡和森发起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深入梳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提供了良好契

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是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国内背景。

3. 主体条件: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对社会主义的崇高信仰与不懈追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主要是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反思。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事实上已经开启了,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尚处于不自觉的阶段,更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史的梳理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研究,无疑需要研究主体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较强的分析问题能力和丰富的知识积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知识的积累,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这些条件,蔡和森全都具备。蔡和森在赴法国勤工俭学之初就写信给毛泽东,将“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确立为勤工俭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卤猛看报”,并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到,拟编译一套传播革命运动的丛书,内容包括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俄国十月革命后之详情四个方面。他在信中指出:“这四种东西,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2]49-50}通过读报学习法文,蔡和森随后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以及宣传十月革命和各国工人运动的资料。蔡和森认为,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是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的,也适用于中国将来的改造。可见,蔡和森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对社会主义的不懈追求,构成了他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主体条件。

二、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主要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蔡和森作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不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理论探索,而且也开启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历史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学说史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这种研究是否必要?对此,蔡和森认为,从学说史的角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其一,这是有效增进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解与认识的必由之路。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甚至怀疑。例如,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存在着冲突,即“马克思一面主张人为的革命说;一面又主张唯物史观”^{[2]80}。显然,陈独秀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他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强调的历史观是客观性和人为性的有机统一,既有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又有着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发挥。正如蔡和森所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全在于其把人为性和客观性这两点结合起来。他还认为,这已经为俄国十月革命所证实。因此,只有从学说史的角度科学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及其运用,才能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和怀疑,有效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认识。

其二,这是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

程的必由之路。蔡和森认为,我们固然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但更应该注重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国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3]所以蔡和森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既包括其理论的发展进程即学说演变进程,同时也包括其实践进程。因此,从学说史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能够在其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互相确证,从而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其三,这是有效增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并提升党的先进性的必由之路。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惟其如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研究无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可持续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蔡和森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这就是为了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经验与教训,深入梳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

2. 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逻辑基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指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或理论。就此而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自然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先决条件与活水源头。在蔡和森看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把握并实现其中国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逻辑基点。

1921年2月11日,蔡和森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中,一方面强调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称自己为“极端马克

思派”,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2]74};另一方面,又严肃批评了初期社会主义、乌托邦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和修正派社会主义。他认为,初期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共产主义属于没有内在理论依据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表现为不识时务地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工团主义仅仅专注于经济行动,吉尔特社会主义的特点是调和劳资矛盾以延长资本政治,修正派社会主义则是严重歪曲、篡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鉴于此,蔡和森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学说,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2]74}。蔡和森指出,若要达到这一目标,一定要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把握革命说与进化说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侧重于革命说就必然导致感情的革命主义;如果偏向于进化说就会演变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主义。他深刻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成功的根本之道就在于综合、全面地把握住这两种学说之间的辩证关系。

随后,蔡和森还以马克思的学理作为切入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作了深刻分析。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完整而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蔡和森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学说,必须将马克思的革命说同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结合起来。他由此提出了唤醒中国无产阶级的必要性和推进中国无产阶级社会运动的“三步骤”:第一步是为争取生存权和劳动权而向政府论战,并强迫政府向五国银团借入大量的实业外债;第二步是对借入的大量实业外债进行严格管控、监督,落实其用途;第三步是争取产业管理权和政治管理权。蔡和森坚定地认为,这三个具体步骤是中国社会运动、社会改造的不二法门。由此可见,蔡和森在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理解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作为逻辑基点。

3. 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有贯穿始终的根本问题或基本问题。在蔡和森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根本问题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党的建设,并形成“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的问题。事实上,蔡和森就是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撰写就是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完成的。蔡和森指出,要形成适合中国共产党发展要求的“自己的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必须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此,毛泽东在回信中非常认同这一观点,并说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4]其二,必须坚定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自己的理论”。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或者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其三,必须坚定地反对各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像叛徒兼骗子的施存统辈一样。”^{[2]803}在蔡和森看来,施存统的主要错误在于对革命社会主义前途的论断上,错误地认为革命社会主义前途属于现成的东西,不需要进行任何斗争就可以顺利达到。对此,蔡和森

严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党外现存的两种错误论调:一种是类似于施存统辈观点的油腔滑调,另一种是类似于陈公博“物观论”的机会主义。由此可见,蔡和森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研究,实质上是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服务的,而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探索又恰恰是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历史贡献。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蔡和森在厘清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的三条重要实现途径。

其一,应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学习,也就是按照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的发展。基于此,蔡和森主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仅应包括马克思主义,还应该包括列宁学说,即“共产党的原理和方略,我须先研究清楚,现已译‘议院行动’(系万国共产党之魁作)一篇,及列宁等重要文字数篇,拟续译‘俄国共产党大纲’”^{[5]26}。

其二,必须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早期建设的历史经验。正如前文所述,蔡和森实际上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史的角度来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的。在蔡和森看来,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实质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因此,蔡和森全面总结了自中共一大至中共四大以来这段历史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写成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研究报告。这无疑是在我党历史上开辟了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式,也事实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研究范式。

其三,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进行研究,需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运动。1920年

5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强调文化运动的重要性,提出了推进文化运动的具体方法,即“仿照李石曾贴邮花的办法”^{[5]20},同时强调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运动,即“现在中学以上的文化运动,要算各处都已进发了,新民学会所宜注意的,自小学文化运动以外,应注意劳动的文化运动”^{[5]20}。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发展表明,通过兴办新民学会和开展文化运动,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即文化运动的道路,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影响深远。

三、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方法论特色

从理论生成的视角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萌芽、形成、深化和拓展的发展史。蔡和森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宏观历史进程为背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进行梳理和研究的过程中,蔡和森很好地贯彻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并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色。这是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另一重大历史贡献。

首先,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始终是蔡和森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是他整个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出发点和哲学基础。这是蔡和森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时所运用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基本支撑。其次,1924年蔡和森撰写的《社会进化史》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创新性成果,它奠定了蔡和森分析

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发展史的方法论基础,是蔡和森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新生态。最后,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科学地运用历史主义方法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及其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理论内涵。正因为蔡和森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过程中很好地贯彻了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所以,蔡和森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研究范式。

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过程中,蔡和森所运用的历史主义方法论还很好地贯彻了辩证法的原则。1919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论述自由问题的时候强调:“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2]23}蔡和森指出,为达此目的,必须积极发展和传播列宁的理论主张与观点,学习他的先进思想,更为直接地了解和研究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在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目的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如“不必要”中渗透“必要”,“厌恶学校”的同时又要“欲入学校”。在这里,蔡和森不仅在对自由思想尤其是对列宁的自由观的理解上贯彻了辩证法的方法论原

则,而且在对自由实现的手段选择上也很好地贯彻了这一方法论原则。正是基于对这些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蔡和森的探索取得了重大进展。其研究成果,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发展,还是对于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尽管蔡和森一生极为短暂,但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说史的探索确立了一种典范,既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极大地深化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与研究。

参考文献:

- [1] 李永春. 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8(5):53.
- [2]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 [3] 蔡和森.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21.
- [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4.
- [5] 蔡和森. 蔡和森文集:上[C].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引用格式:赵壮道. 四十年来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研究述评[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5): 14 - 19.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3969/j. issn. 1009 - 3729. 2017. 05. 003

文章编号: 1009 - 3729(2017)05 - 0014 - 06

四十年来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研究述评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Mao Zedong's collectivism thought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赵壮道

ZHAO Zhuang-dao

洛阳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摘要:通过梳理四十年来学界对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研究阶段、基本内涵和历史地位研究成果发现,学者们认为:(1)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伦理思想。(2)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研究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在1980年代,对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专题研究的较少,且内容主要包含在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有关研究中;在1990年代,对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专题研究增多,少量包含在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研究中;21世纪以来,对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专题研究开始占主流,研究内容也开始从道德伦理领域向政治伦理领域和对比研究扩展。(3)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为人民服务是其基本立场,集体至上是其基本原则,公私兼顾是其协调方法,个性解放是其自由观念,民主集中是其政治原则。(4)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它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主义价值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集体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毛泽东;
集体主义;
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

收稿日期:2017 - 03 - 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项目(15JD710070)

作者简介:赵壮道(1965—),男,河南省洛阳市人,洛阳理工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理论。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集体主义论述之集大成,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积累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不仅形成了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政治伦理原则。本文拟通过四十年来学界对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研究阶段、基本内涵和历史地位研究成果及其现状的梳理,旨在揭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源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属性,从而为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支持。

一、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

纵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十年国内关于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主要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伦理思想。

1. 来源之一:中国传统文化

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集体主义思想,而毛泽东酷爱中国传统文化,饱读中国古典书籍,深受其熏陶和浸染。

江涌等^[1]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吸收了中国古代重群体、倡协同文化的积极因素。闫东明^[2]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心理、忧患意识、经世致用传统,对毛泽东伦理思想影响深刻。刘国胜^[3]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儒家都有历史悠久的“无我论”思想,从理论源头看,这种“无我论”思想正是毛泽东“大公无私”集体主义思想形成的基础;另外,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传统文化观念都把人生的社会价值置于个人价值之上,这些也是毛

泽东集体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

2. 来源之二:马克思主义

杜振吉^[4]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先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曹景田^[5]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集体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陈昭启^[6]指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真正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对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黄显中^[7]认为,毛泽东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属于从“虚构的集体”向“真实的集体”过渡的初级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真实的集体”的论述,是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韦世荣^[8]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主要是在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集体主义的重要性、兼顾个人与集体利益等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

3. 来源之三:西方伦理思想

学者们还认识到:毛泽东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受到了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例如,林青山等^[9]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受到了泡尔生的道德伦理学影响。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毛泽东就读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并写了一篇读后感——《心之力》,将泡尔生的自我观念转化为他的个人主义精神,主张在社会实践中张扬人的个性,后来毛泽东在他的集体主义思想中,提出个性与党性是完全一致的,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刘国胜^[3]认为,从思想渊源来说,毛泽东“自我的发现”显然是受西方近代笛卡儿的主体性哲学“我思故我在”观点的影响,因为笛卡儿思想影响了康德综合理论和经验论,而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正是一本深受康德主义影响的著作。

二、四十年来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研究的三个阶段

四十年来学界对于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1980年代;(2)1990年代;(3)21世纪以来。

1. 1980年代

1980年代,学者们对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专题研究很少,且内容主要包含在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有关研究中。建和等^[10]认为,毛泽东提出的“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道德原则”就是共产主义的基本道德原则——集体主义;林青山等^[9]指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这三者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道德理想;顾春明^[11]指出,毛泽东提出了完备的集体主义原则,他的“民族第一、群众第一、个人第二”的思想就是集体主义的集中体现,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杰出贡献;汪应峰^[12]认为,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核心集中反映了共产主义道德体系中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欧阳茂森^[13]认为,毛泽东伦理思想的道德规范体系包含着集体主义原则;宋惠昌^[14]提出,毛泽东“统筹兼顾”“公私兼顾”的思想是集体主义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温善策^[15]认为,毛泽东伦理思想体系的道德规范是集体主义;杜振吉^[4]认为,在毛泽东思想完整的理论体系中,集体主义思想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黄锡平^[16]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虽然对集体主义作过不少论述,但只有毛泽东对集体主义进行了全面论述,并明确把它作为社会道德的基本核心与价值原则。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集体主义被学者们定位于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学者们共同认为,毛泽东伦理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集体主义思想,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思想。但是,学者们对于集体主

义在毛泽东伦理思想中的具体地位的看法还不太一致。有人认为,集体主义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道德理想,有人说集体主义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有人说集体主义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道德规范。

2. 1990年代

1990年代,学者们对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专题研究增多,少量包含在对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研究中。江涌等^[1]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以共产主义道德为原则,继承中国古代重群体的价值传统而形成的;曹景田^[5]认为,集体主义在毛泽东伦理思想中居主导地位,是其道德体系中的基本原则;郭永军^[17]指出,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它在毛泽东伦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谢昌荣^[18]认为,毛泽东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思想,把集体主义概括为“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明确提出反对个人主义;夏伟东^[19]认为,毛泽东坚持了集体主义立场,把集体主义作为党的传统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集体主义被学者们定位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大家对集体主义为毛泽东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已不持异议,但对集体主义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核心这一观点仍有不同的看法。

3. 21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专题研究在我国伦理学研究中开始占主流,研究内容也开始从道德伦理领域向政治伦理领域和对比研究扩展。樊石虎等^[20]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是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是其内涵的本质,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实质就是革命的功利主义,在政治制度上表现为民主集中制。吴敏^[21]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为今天中国

人的政治解放创造了良好条件。苏伟^[22]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之核心是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关系,毛泽东“公私兼顾”的思想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指导思想。郭聪惠^[23]认为,集体主义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伦理思想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位置,他们虽然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些共识,但实际上自成体系。李建^[24]认为,集体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伦理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其政治伦理制度。张丹^[25]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价值观包括集体主义的实践观、公与私的义利观、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团结联合的和谐观。韦世荣^[8]指出,毛泽东强调集体在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具有重要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继承,完成了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协同思想的结合,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的发展。黄显中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伦理原则由两条基本条款组成:“条款一:社会主义集体鼓励和促进与其相容的个人利益(肯定原则),条款二:社会主义集体反对和限制与其不相容的个人利益(否定原则)。”^[7]其中第一条款是主张统筹集体与个人利益,第二条款是主张集体利益、首先是国家利益的优先性。孔全新等^[26]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经济伦理观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崔华勇^[27]指出,集体主义是整个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构建的指导原则。张晓燕^[28]认为,毛泽东农村社会救助实践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陈昭启^[6]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精神在方法论和价值论层面实现了对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双重超越。倪艳秋^[29]提出,毛泽东集体主义的特点是人民性、阶级性、实践性和阶段性。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学者们对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在它的本质内涵、价值观构成、伦理原则方面的研究,

大大丰富了毛泽东集体主义的内涵。另外,在对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集体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三、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国内有关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内涵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杜振吉^[4]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首要的、最基本的思想内容是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使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使局部利益让位于全局利益,使眼前利益让位于长远利益。江涌等^[1]指出,首先,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是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其次是公私兼顾,最后是个人利益在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要牺牲个人利益,保全集体利益。严静等^[30]阐释了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三层涵义: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相结合、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张丹^[25]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内容包括集体主义的实践理念、公与私之关系的义利理念、服务于人民的道德理念、团结联合的和谐理念。李合敏^[31]指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倪艳秋^[29]指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间的利益关系;三是反对个人主义;四是坚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五是树立先进典型和道德模范。概言之,为人民服务是其基本立场,集体至上是其基本原则,公私兼顾是其协调方法,个性解放是其自由观念,民主集中是其政治原则。

四、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关于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学者们大体有以下观点。

1. 它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主义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重群体、倡协同,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的群体主义属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范畴。群体主义重视群体利益,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倡导中庸、兼爱、贵和、尚同的思想。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主义价值观也存在着时代局限性,而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超越了群体主义价值观。江涌等^[1]认为,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主义实质上代表着统治阶级的私利,忽略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一方面超越了群体主义所代表的狭隘的统治阶级利益,用集体主义原则代表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超越了群体主义宗法制度对个人自由的束缚,提出尊重人的个性、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促进人的自由发展。陈昭启^[6]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是对群体主义的哲学基础——整体主义——的超越,整体主义企图在整体和个体之间找到一种最本质的东西,这种方法很容易导向唯心主义决定论。总之,学者们普遍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主义价值观,推动了中国从小农经济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为个人的经济自由、政治解放提供了理论基础。

2. 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的发展。

在理论方面,宋惠昌^[14]认为,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从集体主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概括;韦世荣^[8]认为,毛泽东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协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丰富了马

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顾春明^[11]认为,毛泽东吸取了马克思集体主义理论的营养,接受了斯大林集体主义实践的教训,从中国国情的实际情况出发,确认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在实践方面,顾春明^[11]认为,毛泽东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集体主义的实践内涵。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社会主义实践,列宁又逝世过早,他们均没有提出具体的社会主义应有的社会公德,而毛泽东在集体主义原则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物的社会主义公德。张丹^[25]认为,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服务于人民、注重群众的团结联合等集体主义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

3. 它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集体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夏伟东^[32]认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集体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一致的,集体主义思想在政治与伦理两个层面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指导思想。陈昭启^[6]认为,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在组织原则方面的实现路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直到今天,民主集中制原则仍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赵壮道^[33]认为,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后,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毫不动摇地坚守了这条政治伦理原则,后来“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立场演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总之,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不仅承继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和理论资源,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它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中,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 [1] 江涌,金人.毛泽东集体主义原则的民族渊源[J].湖南社会科学,1991(5):26.
- [2] 闫东明.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J].学术交流,2006(7):28.
- [3] 刘国胜.论毛泽东早期伦理思想形成的本体论基础[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2):60.
- [4] 杜振吉.论毛泽东的集体主义思想[J].齐鲁学刊,1989(6):8.
- [5] 曹景田.毛泽东对集体主义思想的贡献[J].社会科学辑刊,1993(6):20.
- [6] 陈昭启.论毛泽东的集体主义精神及其双重超越性[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3):16.
- [7] 黄显中.集体主义的伦理意蕴[J].道德与文明,2011(6):42.
- [8] 韦世荣.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集体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D].哈尔滨:哈尔滨理工大学,2011.
- [9] 林青山,李冬民.毛泽东伦理思想初探[J].兰州大学学报,1983(4):9.
- [10] 建和,燕弓.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和结构[J].伦理学与精神文明,1983(6):13.
- [11] 顾春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贡献[J].齐鲁学刊,1983(2):3.
- [12] 汪应峰.试论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核心[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2):33.
- [13] 欧阳茂森,杜振吉.毛泽东伦理思想略论[J].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5(1):27.
- [14] 宋惠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主要贡献[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12):130.
- [15] 温善策.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6):49.
- [16] 黄锡平,徐波.试论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特点[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6):9.
- [17] 郭永军.全国毛泽东伦理思想研讨会综述[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4):110.
- [18] 谢昌荣.论毛泽东的集体主义思想[J].西部学坛,1994(1):21.
- [19] 夏伟东.从毛泽东是否使用过集体主义概念谈起[J].道德与文明,2000(6):4.
- [20] 樊石虎,何健强.试论毛泽东的集体主义思想[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7.
- [21] 吴敏.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困境[J].重庆社会科学,2004(1):43.
- [22] 苏伟.“亚当·斯密之谜”的破解:毛泽东开创的“公私兼顾论”[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6):46.
- [23] 郭聪惠.毛泽东与邓小平集体主义思想研究[J].理论界,2007(9):21.
- [24] 李建.毛泽东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比较研究[J].湖湘论坛,2010(5):30.
- [25] 张丹.毛泽东集体主义价值观探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0.
- [26] 孔全新,王兆响.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转向[J].济宁学院学报,2013(4):59.
- [27] 崔华勇.集体主义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道德指导原则[J].教育教学论坛,2014(24):152.
- [28] 张晓燕.论毛泽东农村社会救助中的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J].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2):38.
- [29] 倪艳秋.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6.
- [30] 严静,罗宗火.集体主义:当今中国的道德导向[J].广西大学学报,1993(5):50.
- [31] 李合敏.毛泽东集体主义思想述论[J].毛泽东研究,2014(3):33.
- [32] 夏伟东.从毛泽东是否使用过集体主义概念谈起[J].道德与文明,2000(6):9.
- [33] 赵壮道.中国共产党集体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发展历程与理论特点[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4(3):21.



引用格式:陈鹏,闫博荣.论儒家君子人格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5):20-25.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0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5-0020-06

论儒家君子人格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

On the conservation of Confucian gentleman personality o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陈鹏, 闫博荣

CHEN Peng, YAN Bo-rong

河北金融学院 社科部, 河北 保定 071051

摘要:儒家君子人格曾在历史上作为理想典范对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塑造、道德修为、功业成就等方面起到过巨大的鼓舞与鞭策作用。虽然士大夫阶层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构而消解,但君子人格的文化内涵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依然深刻而久远,对当代大学生群体的人格塑造亦有价值。顺应时代所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儒家君子人格恰恰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独立人格的构建,爱国、敬业情怀的培养和诚信、友善品性的养成。

关键词:

儒家;
君子人格;
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收稿日期:2017-03-20

基金项目:中共河北省委讲师团2017年度科研课题(201727);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2016LX016)

作者简介:陈鹏(1980—),男,河北省沧州市人,河北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闫博荣(1990—),女,河北省保定市人,河北金融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

儒家君子人格内涵丰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具有一定契合度,不论是从理性认知还是从实际践行方面,对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都具有一定的涵养促进作用。鉴于此,本文拟在对儒家君子人格内涵进行阐释的基础上,从认知和践行两个维度解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价值准,指出儒家君子人格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的作用所在。

一、儒家君子人格的内涵

儒家君子人格并非只是理念中的构想存在,在中国历史上它作为振奋士人的精神力量也确实产生了深远影响。余英时曾说:“也许中国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但是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终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1]也就是说,儒家君子人格理想典范存在的历史事实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士人都做到了儒家的君子要求,而是表现为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无数具体个人的主体实现形式与主体性的不同实现水平。儒家君子人格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中国文化中“士”的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早期作为封建等级中的末等贵族,由于在诗书礼乐等方面受过专门的教育,能够掌握某种特殊技能,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贵族身份与地位的文化阶层。周室东迁之后,士阶层逐渐发生变化,其身份从固定的封建贵族降为后世所谓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君子是基于社会地位而对人的一种身份称谓。先秦时期,孔子对其作了不同于以往的道义内涵设定,自此以降,君子多是以德而论而非地位象征。严格来讲,士阶层与儒家的君子人格在道义追求方面是存在差异的,但先秦儒家并未对此作出严格区分,而是沿用“士”这个古

已有之的概念来阐述自己对君子人格的道义要求。

孔子规定了君子独立人格的内在要求,即为仁由己而非由人。这既是道德领域中主体独立人格的彰显,又是君子修为活动中的自觉与自主的表现。在道德领域之外,孔子进一步赋予君子人格以自由意志的内容,强调三军可夺帅而匹夫不可夺志。这充分表明先秦儒家对主体性原则的重视与对个人主体性意识的尊重。儒家君子独立人格的价值依据何在?对此,孔子以“士志于道”^{[2]38}最早奠定了君子独立人格与价值实现的基础。曾参进一步发挥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85}、死而后已的坚决与果敢。后来孟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志于仁义而已,道义只有本于自身且只有以自身为目的,才是纯粹完满的。先秦儒家在追求主体完满人格时还对君子提出了纯粹道义上的要求:“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2]153}这样,先秦儒家以主体自身的合理性为价值依据,对士阶层的修身涵养提出了更高的道义要求:士阶层以义修身而为君子,君子作为主体完善的理想人格典范而存在。由此,先秦儒家剥离了士与君子概念中古已有之的社会身份所指,重新赋予其以文化与道义的价值规定。这种君子人格的价值指向对后世文人士大夫的主体人格完善影响深远。

第二,仁以为己任的历史担当与救世情怀。儒家君子自觉担负起文化价值的承担者这一历史使命。他们超越自身一己私利而致力于维护社会基本价值原则,关怀国与天下的公共利害之事。这种“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自觉担当的文化性格构成儒家君子人格的应然之义。

儒家君子人格具有超越性与现实性双重设定:一方面,超越性之道可以本于自身,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约束,不受一切外在利益的驱使,

即天地间惟道为最尊,而势不能多之;另一方面,超越性之道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特质,道并非脱离具体事物的实体存在,而是内在于事物之中、贯通于日用常行的中庸之道。自先秦起,整个儒家文化中这种既超越又现实的双重性格彼此融合,超越之道与现实之人伦日用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弃不离的关系。极高明之道并非脱离现实的抽象之道;同理,日用常行间或人伦事理中即可知善明德。基于这种“一物两体”的辩证思维,先秦儒家之道兼顾道义与现实,赋予君子人格以仁为己任的救世情怀。

如果说儒家君子的独立人格强调道的超越性,那么儒家君子的救世情怀与自觉担当的责任意识则是道的现实性体现。孔子认为,君子修身的目的非为人前炫耀,也不是作为个人沽名钓誉的工具手段,而是以义修身而成君子,君子以安百姓。孔子曾坦然谈到自己的平生所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55}孟子借伊尹之口表达士君子阶层的济世情怀:“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3]。君子能够觉察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在于有所作为,这种作为不应该只是利及己身,还应该“自任天下重”,即利及天下万民,追求终极至善,成为以斯道觉斯民的历史担当者。

第三,一以贯之的忠恕与信义原则。先秦儒家将忠与恕作为君子修为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孔子认为若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则必为恕,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68}。按照朱熹的解释,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以己之好恶推想人之好恶,以对己之心来相待他人,尽心竭力;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爱人。子贡将其解释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2]48}在这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己原则中,蕴含着先秦儒家欲将仁的核心价值贯彻于整个士阶层的努力。毋宁说,先秦儒家以仁为质,以忠与恕作为行仁之方,以君子人格为旨归,对

内而言,凸显主体性人格的自觉与自主;对外而言,彰显不同个人主体之间的平等与尊重。

人作为个人主体,不仅有完善自身主体性的精神需求,同时还应该意识到他人也有同等要求,从而尊重他人的主体性完善。先秦儒家深谙于此,所以在道德理念中承认且肯定了每一个人均有追求自由与完善主体的平等权利,从而以人性论为逻辑前提,从孔子性相近到孟子以良心论性,而得出人人皆可为尧舜的结论。这便是儒家在理念上进行主体性完善的逻辑推论。就现实中如何尊重他人的主体性完善而言,先秦儒家将信与义作为处理人、己关系的重要原则。具体而言,信体现为真诚不欺;义者,宜也,即为合理。先秦儒家认为君子无信不立,大丈夫行一不义而得天下,坚决不为。这种以信待人、以义正我的处事原则,使儒家君子修为活动在内与外、人与己之间得以相对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君子人格的日臻完善。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价值准则的认知与践行解析

在现实社会环境中,人总是作为自主与自由并未完全实现的主体形态而存在的。人做事情的具体原则或从主体理念出发,或从具体生存需要的状态出发。人类的正义观念,既有来自主体理念的部分,也有来自生存经验的部分,所以,人在制定规范、法律、准则时,不仅要考虑正义原则,还需要顾及现实可行性问题。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以24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公民在个人层面的基本价值观要求。这一做法立足当下具体民情,考察社会民间事态,了解公民大众需求,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公民主体性与群体性的本质要求,同时兼顾人作为个体生存者的现实情况,因而是满足公民主体之间完善自身的价值准则。

1. 爱国与敬业:连接个人与国家、社会的价值桥梁

实际上,个人总是处在具体环境中的一分子,不可能脱离群体和社会而单独存在。因此,个人完善自身主体性必须处理好自身与所在群体之间的关系。

毋庸置疑,国家主体作为群体主体与公民个人主体在理性与规范上会存在不同。主体活动自然有其目的所在,而不同主体的行为目的更是各异。比如,国家有其政治宗旨,社会企业有其利润追求,公民个人有其自我价值实现,等等。因此,不同性质的群体与个人各自的行为目的不可一概而论,更不容相互混淆。党和国家深谙于此。中共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针对不同类型主体的不同特征与具体要求,分别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具有各自针对性的道德规范与价值要求。在个人层面,爱国是公民个人对于祖国的一种心理寄托与情感归属,这种个人与国家间的情感并不囿于某一特定个人与特殊国家之间。如果说爱国是公民个人对自己国家的普遍情感,那么敬业则是公民个人在社会中对所隶属群体或行业的责任担当与职业操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与敬业将公民的自我价值与国家、群体的共同价值完美结合起来。公民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所在社会行业得以展开,同时社会具体行业的合理化发展也绝不能离开行业中个人的自我成长与努力,而公民个人对自己国家的情感表达则直接或间接成就国家主体意志的理性诉求。在这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联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的爱国与敬业要求,使国家、群体和个人的各自价值需求得以对接、融合、贯通与实现。

2. 诚信与友善:沟通个人与他人的价值渠道

在个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处理

公民与他人这一不同主体间关系上提出诚信、友善的基本原则。众所周知,社会正义虽是从主体性自身推导出来的,主体的自由本质是正义理念的理论依据,但不可否认,利益也是社会正义不可或缺的现实基础。社会中每个人作为社会正义的价值承担者,彼此之间需要相互沟通并因此发生诸多关联,这就不可避免会存在相互限制与冲突。如何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自由,并且得到他人的尊重?不同领域中的个人与他人之间如何体现其价值合理性与正义?这些问题不仅表现了个人行为的理性要求,还意味着个人的合理性要求势必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生存于具体社会环境中的个人主体并不能完全实现自身的自主与自由,因为人在实现自身自由的同时,他人也在实现其自身的自由。每个人为了保证自己自由的顺利实现,就必须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由并对他人的自由给予尊重。

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4]。主体自主性的实现与不同主体之间的互相限制,归根到底还是人作为生存者所受到的物质方面的限制。主体通过认知与实践活动建立起理性思想,这在价值实现意义上可以视为真善美的自我规范。另外,对客体(他人)而言,还需要建立起公共规范与道德准则即公德。公德主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相互监督来确立带有普遍性和约束性的公共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诚信和友善作为规范公民的基本道德准则,要求公民以真实敬笃正视自己,以诚信不欺看待他人,以他人善己之心而友善他人,彼此尊重,和谐共享。

三、儒家君子人格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的促进作用

历史上,儒家君子人格的现实价值体现于

“仁以为己任”的历史担当、“颠沛必于是”的道义操守。这种君子人格理想典范的形象塑造对当代知识分子阶层在功业成就、修身涵养、人格追求等方面同样具有巨大鞭策与鼓舞作用。大学生作为当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后备军,其个人道德观念与人格塑造不仅关系到未来中国知识分子整体阶层的文化品格,而且对中国社会主义整体的思想面貌会产生关键性影响。因此,儒家君子人格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独立人格的构建。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后备力量,其人格尊严的塑造与主体人格的构建事关重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君子阶层虽然在现代社会结构中被消解了,但是士君子的精神与文化风貌并未随着这个阶层的消解而消失,恰恰相反,它以种种不同方式或深或浅地体现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的主体人格与追求真理的道义担当,是君子人格的精神再现。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未来知识分子的储备力量,他们身肩文化与思想传承创新的时代任务,应当呈现出中国知识分子整个社会阶层应有的文化品性。这既是文化与思想传承的历史使命,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赋予的责任义务。

塑造公民主体人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为此,当代大学生理应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知与日常生活中的切实践行。应深入学习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义务,继承儒家士君子阶层自觉担当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将国家价值的实现视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与道义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这一使命责任的肩负与完成,取决于当代大学生个人独立健全人格的塑造,即其个人主体性的健全。儒家君子人格对“士志于道”的笃定、

“颠沛必于是”的坚守,对于当代大学生独立人格的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是巨大的砥砺前行力量。

其次,有益于大学生爱国与敬业情怀培养。爱国情感与敬业态度的培养是不分身份和职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提出爱国与敬业的要求,不仅满足了公民个人对祖国的情感寄托,更是对在校大学生正视自身与国家主体情感的理性表达,是对其学习与工作之诚恳负责态度的端正。

儒家士君子阶层“仁以为己任”的使命感,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化阶层。立足于此,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超越个人一己私利,关怀国计民生与社会公共利害之事。这种明道救世的情愫最能激荡知识分子心弦,自然对当代正在接受知识与文化的在校大学生也不例外。爱国与敬业既是大学生必备的文化素养,更是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儒家君子“穷达以时而兼善天下”的历史使命,不仅有助于深化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爱国要求的历史认知,而且也有益于强化大学生敬业精神的理论涵养。

再次,能够引导大学生养成诚信与友善的品性。大学生作为高校文化群体,其所在群体与特定社会身份决定了大学生需要妥善处理自己与所在群体中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正确看待自身所处的学生群体与社会中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大学生在校期间需要与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互敬互让、友好相处。对老师深表感激,尊敬其人其学;对同学彼此关怀、友爱互助。这不仅有助于大学生在群体组织中培养互助共赢的团队精神,更有助于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诚信与友善要求的自觉贯彻。

先秦儒家自孔子就提出君子一以贯之的行仁之方,这种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人己原则被

其弟子概括为忠恕之道。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在道德实践中所说的绝对命令“应该如此如此做”或者“不应该如此如此做”^[5]也表达了同样心声。而无论是先秦儒家的忠恕原则还是康德的“绝对命令”,都与21世纪伦理学国际讨论会所提倡的“黄金法则”不谋而合,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提出诚信与友善的要求,不仅顺应了国际普世价值的时代潮流所向,而且也继承了儒家优秀文化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为当下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理念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当代大学生步入社会、投身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观念的理性指导,而儒家的忠恕原则能够引导大学生接受且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诚信、友善要求,形成内化于心的自律与自觉。

四、结语

作为公民个人层面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基本覆

盖了公民对国家、群体和个人主体性完善的各方面精神需求。对大学生群体而言,这些要求不仅有助于其个人主体性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而且有利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整体局面的稳定形成。就文化传承性与创新性来讲,儒家君子人格的文化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有一定的契合,对于大学生的主体完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都有很大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 [1]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
- [2]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 李振纲. 中国古代哲学史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71.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
- [5] 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24.



引用格式:郭晓林.“知行合一”论的形而上重审[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8(5):26-32.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0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5-0026-07

“知行合一”论的形而上重审

Metaphysical retrial of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郭晓林

GUO Xiao-lin

贵州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朱熹与王阳明的知行观表面上有分歧,但具有内在一致性。对朱熹知行观的误读,导致的是伪善及其合理性辩护的可能,而王阳明的知行观恰是针对此的补偏救弊;然王阳明的知行观表现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倾向,某种意义上忽视了其致知过程无法逾越的学、思环节。因此,需要重新回到朱熹真知论的层面,通过对“知”的道德形而上重审,最终完成对流俗之“知行合一”观的清算。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其“知行合一”观的最后归宿都是超验的道德理性,只不过其植根于“事事物物”这一经验层面,通过在“事”这个层面体现个人对“知”的把握和体认,并从其实践(“体知”)的程度来判断道德行为是否合乎天理(“道”“良知”)的普遍有效性。

关键词:

知行合一;

致知;

真知

收稿日期:2016-08-07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2016JD001);贵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项目(GDYB2016010)

作者简介:郭晓林(1983—),男,仡佬族,贵州省石阡县人,贵州大学讲师,贵州大学—孔学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儒家伦理思想。

“知行合一”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理念,正在被大众越来越广泛地关注,甚至直接进入了社会的文化建构与日常话语体系中。它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儒家思想观念,能深入地影响中国人的日常思维与行动,无疑有其值得赞赏与肯定之处。但是,对于何为“知行合一”、何为“知行合一”之“知”、何为“知行合一”之标准等问题,由于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故“知行合一”作为日常行为合法化的道德标准仍未能建立起来。前一方面体现在朱熹和王阳明“知行合一”观之间的差异及其尚未和解的现实,后一个问题体现为“知行合一”之“知”的内涵尚未被确立为道德行为之标准。基于此,本文拟对“知行合一”论进行系统梳理,通过对其进行形而上学的重审,正本清源,从而完成对流俗之“知行合一”观的清算。

一、朱熹与王阳明知行观的内在一致性

王阳明之所以提出“致良知”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是要对当时社会因曲解朱熹知行观而造成的社会风气之败坏和价值观混乱进行纠偏。他说:“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1]313}这里显然有两重指向:一是对社会歪风邪气之拨乱反正的价值指向;二是明确批评宋儒特别是朱熹的知行观对于“格物致知”解释的偏颇。

针对知行分离说导致的知行不一,王阳明强调知行原本是“一”,而非“合二为一”。虽然,王阳明对此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但当前很多人谈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却十足是“挂羊

头卖狗肉”,此一现象之普遍,说明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理解王阳明,反而是对其思想的以讹传讹,也是对朱熹知行观的误解和伤害。何以至此,其原因有二:一是朱熹的知行观存在着一种容易被通俗理解的可能;二是当前流行的知识主义观念在经世致用理念下的“借尸还魂”。但无论出自何种原因,都是对“知行合一”的误解。这种误解如果得不到澄清,将会导致两个因循相依的恶果:其一,“知行合一”作为王阳明心性伦理的立言宗旨,必然会堕入知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流俗层面,从而失去其作为心性伦理学纲领对心体和功夫的统摄;其二,这将完全消解“知行合一”在道德实践中的至上性,以致消隐“知行合一”论在敦化社会风气、重建伦理秩序上的力量。因此,有必要从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立论基点上对现今流俗的“知行合一”论的理解进行全面的清理。

为了奠定“知行合一”的理论基础以达到对程、朱知行论之纠偏,王阳明将“知行”提高到本体的意义上。这个工作的起点是对“格物致知”的重新阐释。王阳明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1]51}王阳明与朱熹的格致观的区别,一方面是“格”的方式不同,即内外求索的区分;另一方面是道德知识的先天来源不同,在朱熹看来,道德知识天赋之于性,而王阳明则认为是天赋之于心,从而是心体自有。因此,王阳明认为:“‘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1]7}据此,王阳明认为,“格”字应作“正”字训,是“正其不正以归

于正”,所以穷理不是从外在事物上“格”,而是从自己本心上去格、去做功夫。这就回答了现实中为何还有“知而不行”的事实。因为在王阳明看来,宋儒所言的“真知”并不是真正的“知”,因为,“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14-5]。这里就明确指出了“知行合一”并不是知与行两件事合在一起,而是知与行本身就是“一”。朱熹的真知论强调未有知而不行之道理和现象,认为要想获得真知就必须真行,否则就是知得浅甚或直接可以说是不知。可见,朱熹与王阳明的知行观具有内在一致性,只是他们阐释的视角和侧重有所不同而已。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及其实践局限进行反思。

二、王阳明“知行合一”论之道德理想主义倾向及其局限

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重释,建构了不同于程、朱的“知行合一”观,由此来体现“致良知”对本体和功夫的统摄。陈来认为,正是因为“致良知”统摄了本体和功夫,世人才把王阳明哲学称为“致良知教”。具体到功夫,知、行是其根本问题。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事实上就是为了说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知行功夫乃是一体的,因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1]15}。对此,劳思光总结到:“阳明主旨总不外指出‘良知’与‘意志’间应有及本可有之贯通状态,此是‘知行合一’之本旨。”^[2]或可以简洁地说,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在功夫层面的理想状态。秦家懿甚至直接说:“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也就是他的道德理想。”^[3]而要达到“致良

知”这一修身理想,必须有“知行合一”的功夫。在王阳明看来,“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1]58}。所以只有通过“知行合一”致其本心之良知,才能“从事于事为论说”,且“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1]5}。也就是说,吾心之良知就是天理,且致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就有了吾心之“理”。这虽然只是个人的道德实践,但它内蕴着公共层面的儒家道德理想,涵盖了公共事物,所以其所得之理也就有了公共之理。“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1]79}，“致良知”就是致那“知行本体”，这是儒家一贯的道德理想。

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和入世情怀,就个人成德来讲,终究是要落实为“修、齐、治、平”这一道德理想。此一信念所体现的是儒家对个人成德与群己关系的某种确信,即个人所成就的德性“并不仅仅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它总是内在于社会群体之中”^{[4]245},所以“将成人的过程与群体的关怀统一起来,可以避免将理想人格理解为一种封闭的自我”^{[4]246},从而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社会历史的发展之中。个人德性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是某种社会担当的保证,正如顾炎武所言的那样,“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5]。无论贤愚都对天下有着一样的责任和使命,这是儒家一贯的情怀和理想蓝图。因而,入世的价值理性就是自我充分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哲学精神只有在伦理共同体(群)的范围内才能得以体现,其“知行合一”就是为了让个人的德性修养最终为伦理共同体秩序奠基:他尝试从本体和功夫的角度,为个人的成德提供一个理论和实践的规范性根据。换言之,就是要确立良知作为道德实践之规范,而不是把良

知看作知识,所以如果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解为经世致用层面的知识与行动的有机结合,就是对包括程、朱在内的宋明儒学知行观的最大误解,即便程、朱的知行观本身带有某种知识论倾向,但这种倾向并没有背离儒学一贯的价值追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要从道德理想实现的两个层面——个体层面和公共层面——来重塑这一理想的价值追求。

首先,个体层面的知行本体总是朝向两个紧密关联的维度。一是道德实践的出发点(“正心诚意”),即私人领域;二是道德实践的现实落脚点(“修、齐、治、平”),即公共领域。这两个维度的合成即所谓的“内圣外王”。

个人的道德修养即个人的“致良知”是从自己内心开始的,即所谓格其“心之不正”,“以归于正”;但“致良知”的过程总是伴随着良知的发用流行,并且也只有在良知发用流行中,“道”才能得到体现。所以王阳明说:“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1]121}这实际上是主张个人顺其良知之发用离不开日用常行的生活实践,因为人总是置身于各种社会角色和组织之中。在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蓝图中,家庭作为第一层级的伦理共同体,是作为更高层级伦理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修身齐家的目标不仅仅是培养一个有德性的人,不仅仅只是为了家庭的福祉,更重要的是要让人广泛地参与到“国”这一层级的伦理共同体中,即要有天下为怀的伦理精神。儒家因此强调要有“位”、“学而优则仕”,将“修身齐家”的终极理想确立为“治国、平天下”。可见,个体层面的知行本体总是朝向公共领域,这是儒家道德理想的基本路径。

也正因如此,儒家树立的那些圣人形象,总是以“内圣外王”作为标志或标准。朱熹说:“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

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6]20-30}儒家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圣人都有治国平天下的功绩,唯独孔子“不得其位”,朱熹虽然认为孔子还贤于尧舜,但对于“子不得其位”始终存留遗憾。所以由尧舜禹等圣贤开启并继承下来的道统,一直引领着儒家心性伦理之实践,那就是要由“内圣”而“外王”,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7]320}。由此,儒家知行之更深层次的内涵也就得以显现。相对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它不过是个体成德向公共层面的“立功”的过渡和保障。

其次,个体层面知行本体之“知”来自天理,因此它具有共知性的潜质,这是向公共层面过渡之前提。这里所说的“知行本体”即良知,在王阳明的语境中,我们不能做任何理论的僭越。

就公共层面而言,“知行合一”体现的就是能“致良知”。对此,王阳明说:“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谦而已。”^{[1]82}这里的核心概念是“义”。对于孟子之“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朱熹认为,“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6]289-290}。而“义”即“宜”,《中庸》认为“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朱熹认为“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6]45}。根据这些阐释,结合王阳明之观点,我们可以粗略地说,良知就是“修、齐、治、平”的普遍原则即“宜”。良知之所以对“修、齐、治、平”普遍有效,是因为良知作

为个人之道德自觉意识在实践活动中可以得到某种保证。对此,杨国荣指出,按照王阳明的理解,良知的先天性固然担保了良知的普遍有效性,但无法担保主体对良知的自觉意识。“先天与明觉的这种区分,无疑有其理论上的意义。从逻辑上看,先天的完成往往意味着对主体作用的某种限制:作为天之所赋,良知的形成并非出于主体的学习与思考。然而,如果先天之知最初只具有本然的性质,唯有通过致知过程才能提升为明觉之知,那么,主体的学习与思考便成为无法跳跃的环节”^[8]。这也就说明,“知行合一”如王阳明所言在实然层面是道德行为的规范性根据,这不仅因为良知出于天赋(“明觉”),而且因为致知过程必然得借助于学习与思考。无法否认的是,世间总有那些“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和“悬空思索全不躬行”的人,他们认为要体现良知的普遍有效性,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似乎还需要一个有效的补充。由此,我们就必须回到朱熹的“知行合一”观,通过讨论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之关系来对“知行合一”之流俗理解进行批驳。

三、“知”的道德形而上重审对流俗之“知行合一”论的批驳

在价值观重建的时代,我们在对很多传统价值观失去信心的同时,也出现了对之误读误用甚至滥用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知”进行道德形而上重审,以此对流俗之“知行合一”论进行批判。

首先,对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及其“知行观”的重审,是道德形而上得以建构的前提。朱熹明确地将《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之“知”解释为“识”^{[6]16}。也就是说,格物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认知、知识和体知。“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各有长短。朱熹把‘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对于‘成知识’有促进

作用,但这与‘正心诚意’没有必然之关系,因为有知识的人未必心正意诚。”相比之下,“王阳明把‘致知在格物’中的‘知’界定为‘良知’,把‘物’训为‘意之所在’,把‘格物’解释成‘正念头’,亦即成为‘致良知之功夫’。这与‘正心诚意’步步紧逼,有必然之关联,但在‘致吾心之良知于事物’这一点上没有讲清楚,因为这涉及有关事物物的知识。”^[9]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之说虽各擅胜场,但最后都必须解决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因为,知识在一定范围内的客观实在性和普遍有效性,即便不能保证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与客观知识始终保持一致,但作为一种可被普遍接受和践履的根据,它能为学习和思考提供较为可靠的前提。

道德意识与情感、知识有着紧密的联系。儒家一贯的立场是坚持情感直觉主义,孟子用“恻隐之心”奠定的道德动机结构基本排除了外在动机的可能,也排除了知识及其背后的道德理性在道德动机结构中的地位。按照道德发生之规律,意志活动与欲求、价值观念、信仰、目的、心理机能等息息相关。关于意志活动,祝平次是这样理解的:它是一种心理机能,起始于一个过去的决定,指向一个未来的目标,而在一个人的行为态度中表现出行为者与这个决定及其目的的联系。^[10]“过去的决定”是由什么导致的?所指向的“未来的目标”又是由什么规定的?行为者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从他的行为态度中得到展现的,因此,我们又不得不追问,是什么最终构成了这个行为态度的产生和持存?从《中庸》关于不同“利根”之人对“达道”和“达德”之普遍性的不同掌握方式来看,我们可以肯定“知行合一”之实现必须经由学、思环节。生之安行乃圣人所能为,自然是不需要学、思的过程,并且日用常行莫不是“良知发用之思”;对于“学而知之”或者“困而知之”,则无法

脱离学、思环节,必须有一个规范性的规定根据在“事事物物”上给予个体以实践指导。不然就无从“学”也无从“思”,“利行”与“勉行”都无从谈起。

所以,朱熹的知行观恰好构成了“知”的道德形而上的第一层次,即用“真知”的观念对流俗的“知行合一”论进行清算。朱熹说:“知而未能行,乃未能得之于己,此所谓知者亦非真知也。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6]3483}对于王阳明所批评的“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之现象,朱熹的“真知”观恰好能撕掉其假面具。只有明确“德性之知”作为超越一般事物、来自于对生命和人伦之道德体认的“道德知识”的普遍有效性,才能从流俗的“闻见之知”中超越出来,才能将“知”上升到王阳明意义上的“明觉之知”。

儒家道德的最高概念是“道”,因为“道”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圣人知行之无上性和普遍有效性。比如,孔子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再如,儒家将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和朋友这五者视为天下之“达道”。事实上,真正的“达道”乃是“忠孝节义信”这些道德规范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所以,儒家道德规范及其观念是考察道德知识来源的前提。对此,提出“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张载,其相关论述是可以信赖的。“世人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闻见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7]24}对于张载此论,王夫之评论道:“天下之物皆用也,吾心之理其体也;尽心以循之,则体立而用自无穷。闻见,习也;习之所知者,善且有穷,况不善乎!尽性者,极吾心虚灵不昧之良能,举而与天地万物所从出之理合而

知其大始,则天下之物与我同源,而待我以应而成。故尽孝而后父为吾父,尽忠而后君为吾君,无一物之不自我成也;非感于闻见,触名思义,触事求通之得谓之知能也。朱子谓知性乃能尽心,而张载以尽心为知性之功,其说小异,然性处于静而未成法象,非尽其心以体认之,则偶有见闻,遂据为性之实然,此天下之言性者所以凿也。……德性之知,循理而及其原,廓然于天地万物大始之理,乃吾所得于天而即所以自喻者也。萌者,所从生之始也。见闻可以证于知已知之后,而知不因见闻而发。德性诚有而自喻,如暗中自指其口鼻,不待镜而悉。”^[11]结合张载的观点与王夫之的注解,对于儒家道德知识观念,我们可以大略归纳如下:其一,道德知识是个体之心对理的体认和践履;其二,道德知识不是来自于物理事实,而是来自于对天理的遵循;其三,德性之知非见闻中所得,而是内心自得。鉴于闻见之知是“物交而知”,所以,儒家道德知识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它是内向性的,无论是天启还是体知,总是从心上获得;第二,它是德性之知,因为“知是心之本体”,“故思尽其心者,必知心所从来而后能”^{[7]25};第三,道德知识还先天地蕴藏于人心、人性之中,所谓“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之为良知。按照朱熹之解释:“良者,本然之善也。”^{[6]430}良知就是对本然之善的认知、认同、体知。总之,儒家道德知识是经由一般之理上升到的天理,只有天理才是真正的道德知识,也就是王阳明所言的“良知”,即对个体自身本然之善的体知,以及体知后对自我道德状态、心理机制和行为的影响。

当然,这种“体知”并非纯然私我化的领悟,它带有天理、天道之成分,只是每个人都能通过自我的本心去体认罢了。在王阳明看来,“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1]39}。可见,儒家道德知识观念是其心性观念的实然化,或者,正因为

儒家道德知识的来源是由其心性决定的,才把所谓的“闻见之知”排除在道德知识的界限之外,而道德实践的所有原则和道德发生的决定性因素才能摆脱经验的影响。

王阳明的良知理论是为具体的道德实践而存在的,即他所追求的“成圣”,所以,先天的道德原则只有在经验世界与具体的道德实践相结合,才能体现良知在日用常行中的“首脑”地位。因此,即便王阳明拒斥了“闻见”是道德知识的来源,但他并不否认良知的日用常行就在见闻之中。所以他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1]80}在这里,王阳明“良知不由见闻而有”的观念,就直接回应了儒家道德知识观念是德性之知的传统,而他所说的“见闻莫非良知之用”,又将良知本体与经验世界进行了有效地链接,使得良知实践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的实践推演,而且具有实然的根基。

所以,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其“知行合一”观的最后归宿都是超验的道德理性,只不过其植根于“事事物物”这一经验层面,通过在“事”这个层面体现个人对“知”的把握和体认,并从其实践(“体知”)的程度来判断道德行为是否合乎天理(“道”“良知”)的普遍有效性。

参考文献:

- [1]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上[C]. 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2] 劳思光. 新编中国哲学史[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30.
- [3] 秦家懿. 王阳明[M]. 北京:三联书店,2011:57.
- [4] 杨国荣. 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5] 顾炎武. 顾炎武全集·日知录(一)[C]. 严文儒,戴扬本,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27.
- [6] 朱熹. 朱子全书[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7] 张载. 张载集[C]. 北京:中华书局,1978:320.
- [8] 杨国荣. 杨国荣讲王阳明[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9-90.
- [9] 张庆熊. 从“致知疑难”的求解看牟宗三与熊十力的异同[J]. 学术月刊,2016(6):13.
- [10] 祝平次. 意志、知识与道德:论朱熹伦理学中的几个问题[C]//吴震. 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68.
- [11] 王夫之. 张子正蒙注(卷四)·大心篇[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21-122.



引用格式:高蕊,毕跃光. 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以民心相通为视角[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5):33-39.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5-0033-07

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

——以民心相通为视角

The function of cross-border n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aking the people-to-people bond for example

高蕊, 毕跃光

GAO Rui, BI Yue-guang

云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一带一路”是在顺应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变化的格局下提出的重大方略,而民心相通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跨界民族虽被政治疆域分隔在不同国家,但他们有着相通的语言和族内通婚习俗,传统体育文化交流频繁,加之节日互动、共同的宗教信仰等为民心相通奠定了基础。跨界民族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将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经贸往来、政策沟通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要提高跨界民族民心相通的战略地位,一应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增强沿线跨界民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二应建立相关组织机构,为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提供组织保障;三应推动跨界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厚植民心相通的文化根基。

关键词:

跨界民族;
一带一路;
文化交流;
民心相通

收稿日期:2016-11-28

作者简介:高蕊(1991—),女,河北省唐山市人,云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毕跃光(1971—),男,云南省昆明市人,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之一,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为民心相通提供了便捷条件。2017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高度肯定了跨界民族作为民心相通的先行者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本文拟以民心相通为视角,探讨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

一、跨界民族是民心相通的先行者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顺应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变化的格局下提出的重大方略,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1],是实现跨界民族之间、跨界民族所属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而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则是民心相通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体现。跨界民族地区呈现出山水相连、通道众多的地理状态^[2],虽然被政治因素分隔开来,但由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同、语言相通,一直存在相互通婚现象,存在体育文化、民族节日、宗教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这些都为民心相通奠定了基础。

1. 跨界民族间的语言相通为民心相通提供了便捷通道

跨界民族间的语言相通是民心相通最有力和最有效的体现。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每个民族对自己的语言都有着深厚的情感,跨界民族语言相通有利于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互动,有利于凝聚人心,有利于形成价值认同。

跨界民族虽然被政治疆域分隔在不同国家,但其共同语言为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我国有56个民族,有14个国家与我国接壤。其中,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瑶族、哈尼

族、哈萨克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布朗族、仡佬族、阿昌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33个少数民族语言是跨境民族语言。以跨境语言功能的强弱与使用跨境语言人数的多少为依据,可将我国跨境而居的这33个少数民族语言分为四大类:一是境内境外均为大语言(壮语、维吾尔语、苗语、哈尼语等9种);二是境内为大语言、境外为小语言(藏语、彝语、布依语3种);三是境内为小语言、境外为大语言(景颇语、塔塔尔语、德昂语、珞巴语4种);四是境内境外均为小语言(布朗语、阿昌语、鄂温克语等9种)^[3]。例如,中越两国山水相依,两国边境地区跨界民族、语言名称虽众多,但其语言与文化相通。中越两国共同语言有壮侗语族语言(壮语、侬语、岱语、傣语等)、藏缅语族语言(彝语、哈尼语、桑孔语等)、南亚体系语言(莽语、布芒语、克木语等)、汉语(客家语、粤语、闽语等)、京语。其中,汉语、京语、壮侗语族语言是中越两国使用最多的语言。我国云南、广西与越南交界地区大部分是傣族、壮族,越南岱族、侬族与我国南部壮语方言同属台语支(壮傣语支)中部方言,傣族语言都属于西南方言,跨界民族进行交流时语言障碍不大^[4]。跨界民族间的共同语言有利于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互动,有利于增进跨界民族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民心相通提供了便利条件。跨界民族间的共同语言不仅是跨界民族间进行交流的工具,更是加强跨界民族团结、实现跨界民族地区双向开放的重要保障。

2. 跨界民族族内通婚形成的亲缘性联系为民心相通提供了现实基础

尽管分属不同疆域,但跨界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大体相同,加之语言相通,使得跨界民族之间很容易进行沟通。比如我

国的壮族与越南的岱族、侬族虽然分居在中越两国,但在婚嫁方面有着相同的风俗习惯。壮族、岱族、侬族都有笃信生辰八字的习俗^[5]。

跨界民族间(同一民族)通婚自古有之,且通婚比例较高。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泰国王室与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土司之间就存在着长期姻亲关系。^[6]这是由于两个地区历史文化相同,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语言沟通也没有障碍,所以该地区的通婚现象就很普遍。我国云南与越南接壤地区的富宁县田蓬镇的苗族基本上都是族内跨界通婚,即使在汉族、苗族混居的村子,也基本上是苗族内跨界通婚。^[7]近些年,跨界民族地区的通婚率呈上升趋势,且呈现出由边境地区向内陆地区延伸的态势。跨界民族间通婚,增进了跨界民族间的感情,促进了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同时,跨界民族生活在不同国家,其风俗习惯也会受到所在国家主体民族的影响,这为跨界民族通婚增添了不同文化元素,有利于跨界民族间不同文化的传播,为民心相通提供了现实基础。

3. 跨界民族间传统体育文化的长期交流为民心相通搭建了重要平台

跨界民族间文化互动的关联因素和内在动力在于,国界线两边的群体在文化上有着诸多内在的同一性,同源和共同的文化是维护共同民族情感的有力纽带。^[8]作为跨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传统体育文化对于增强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跨界民族虽然分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但跨界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和共源性,使建立跨界民族文化互动和交往平台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9]我国新疆就是一个例子,它与中亚五国自古为邻,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作为主体民族世代生活在中亚地区。由于新疆和中亚地区地形主要是荒漠、绿洲和草原,新疆与中亚地区的跨界民族多以放牧为

生,该地区的体育文化活动也多与此有关,如赛马、赛骆驼、摔跤等。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性格豪放,擅长骑射,每年的节假日都会有各种体育活动,如赛马、摔跤、叼羊等,这与我国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基本相同。近年来,新疆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间的合作不断增多,中国先后派代表参加了在哈萨克斯坦举办的阿吉亚达乌萨比赛、库尔曼冬不拉比赛等多项活动。新疆与中亚跨界民族间的文体交流活动,不仅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同时也提高了跨界民族对同一文化的认同,增强了跨界民族间的民族认同感,有利于促进跨界民族与跨界民族所在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为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奠定了基础。

4. 跨界民族间的节日互动为民心相通提供了外部动力

跨界民族间的节日互动是跨界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对于促进跨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有重大意义。

总体上看,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民族关系是比较正常和友好的,这对于我国与周边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至关重要。^[10]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中缅交界地区,中缅两国的傣(掸)族、景颇族(克钦)族历史上同根同源,所以一个民族有盛大节日,对面国家的同一民族也会参与其中,有时政府也会互派代表参加。例如,每年的公历四月中旬是傣族的泼水节,即傣族的新年,在这期间,位于缅甸的掸族同胞与云南地区傣族一样,清晨起来沐浴礼佛,与傣族同胞一同庆祝这一传统节日;木瑙纵歌节是中缅景颇(克钦)族的重大节日,每逢木瑙纵歌节,中缅景颇(克钦)族身着盛装,奔向木瑙广场,伴着音乐载歌载舞,共同庆祝这一传统节日。此外,缅甸的独立节、联邦节也是中缅两国

互动交流的共同节日,不仅提高了跨界民族间交流的频率,同时也增进了中缅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的交界处,随着中老、中越友好关系的不断加强,2009年10月江城县人民政府举办了在哈尼族传统节日基础上打造的“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11],老挝、越南都派出代表团来到我国参加这一节日活动。“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成为中、老、越三国文化互动的桥梁,促进了中、老、越三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由此可见,跨界民族间的节日互动为跨界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基础,有利于跨界民族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传播,为民心相通提供了外部动力。

5. 跨界民族间共同的宗教信仰为民心相通提供了深层的心理链接

宗教是一种基于信仰的文化^[12],跨界民族山水相连、文化同源,宗教信仰也往往相同。跨界民族虽由于政治疆域而分居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但其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宗教仪式或活动,所以一方民族举行宗教仪式时,对面国家的同一民族也会参与其中。据史料记载,南传上座部佛教大约在15世纪中叶传入中缅边境地区,中缅边境的傣(掸)族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13],且每年的宗教活动颇为频繁。例如,在傣历九月关门节至十二月十五开门节的3个月净居期内,要举行多次佛会,缅甸境内的掸族法师、信徒也会参与其中,与傣族法师、信徒进行交流。跨界民族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不仅有利于提高跨界民族对同一宗教文化的认同,同时也有利于相邻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一带一路”辐射范围广,覆盖地区呈现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交融的特点^[14],沿线跨界民族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加强了沿线各民族间的心理认同,为民心相通提供了深层的心理链接。

二、跨界民族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节点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全方位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家与区域之间共同发展,其顺利推进一方面需要沿线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贸易、金融、设施等方面互联互通,另一方面也需要沿线各民族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基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相同的历史文化渊源,跨界民族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将在文化交流、经贸往来、政策沟通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1. 跨界民族是不同国家之间加强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跨界民族相互之间具有跨越国界的民族感情,使得跨界民族成为促进国家间文化交流的纽带和重要力量。基于跨界民族这一特殊重要性,充分利用其自身与周边民族的同源关系,借助跨界民族之间共同的语言、同一民族间通婚形成的亲缘性联系、传统节日交流与宗教信仰一致性,提高跨界民族之间的互动频率,可以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精神纽带。此外,历史与文化是各民族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民族意识也反映了其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跨界民族地区是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渗透和破坏的重要目标,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通过跨界民族增进相邻国家亲密关系作用的有效发挥,提高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与所在国的协同发展,有利于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亲民惠民的友谊之路。

2. 跨界民族是国家间经贸往来的有效渠道

跨界民族具有相同的历史与文化渊源,了解、熟悉相邻国家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能够有效推动沿线国家跨界民族之间的民心相通,使得该国与周边国家间的金融、贸易交流更加

畅通。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起初作用是将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运输到亚洲、非洲、欧洲等地区。随着古代中国商品的输出,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沿线民族充当了亚非欧地区经济贸易往来的使者,跨界民族地区也承载了亚洲、非洲、欧洲等地区的贸易交流活动。“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推进沿线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基于跨界民族的特殊优势,有效发挥跨界民族在国家间经济贸易往来中的建设性作用,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跨界民族地处边境地带,在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与相邻国家的民族有密切联系,能够利用自身语言优势,准确地翻译、解读邻国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地区之间的隔阂与误解,减少相邻国家经济交往过程中的问题,推动沿线国家间资金融通、贸易畅通。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中,不断提高跨界民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水平,可以增强沿线国家和地区各民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与认同,推动周边各民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3. 跨界民族是增进国家间政策沟通的有效保障

跨界民族对国家政治关系的影响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良好的跨界民族关系会加强国家间的友好往来,反之则会破坏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此外,一国所制定的跨界民族政策对于跨界民族所属国家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有重要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政策协商与沟通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跨界民族作为国家相关政策(比如我国的西部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对口支援计划、精准扶贫政策等)的受惠群体,更能深刻体会国家民族政策的深

刻含义。因此应注重发挥跨界民族在宣传国家政策措施方面的作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少数民族群众中的精英人物,对于国家大政方针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能够更好地将边疆惠民政策落实到本地区群众当中,以实现边疆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加之跨界民族与周边民族的亲缘性联系,跨界民族能够有效传递“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相关政策,增进相邻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三、提高跨界民族民心相通战略地位的策略

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条件,而跨界民族间的文化相通是民心相通最直接、最有效的体现。我国要提高跨界民族民心相通的战略地位,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 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是推动民心相通的重要动力,而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就应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只有尊重才能得到认同,只有认同才能获得行动上的支持。我国跨界民族众多,每个跨界民族的成员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同时也是本民族的成员之一,带有本民族的特征,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因此,要加强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首先应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让跨界民族真切感受到国家重视其文化的发展,给予跨界民族文化发展的空间,赋予民族地区制定和实行有关本民族条例的权利。例如,《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自治条例》(2007年修订)第67例中就规定,每年的1月23日为自治州建州纪念日,全州放假3天;泼水节全州放假3天,自治州内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应当受到尊重。民族地区单行条例的实施,体现了国家对于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发展的支持,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区实际进行建设。另外,“一带一

路”倡议要顺利推进,也需要各民族的支持和广泛参与。沿线跨界民族应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发挥自身的地缘、文化优势,加强与邻国同一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使我国跨界民族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得到传播与发展,并且得到沿线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使我国边疆地区的多元民族文化“走出去”。只有充分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给予各民族文化充分发展的空间,才能为广泛的文化交流提供可能性,也为民心相通创造更多的条件。

2. 建立相关组织机构

“一带一路”倡议覆盖范围广、建设内容多,沿线跨界民族众多,因此,要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文化相通,不仅应尊重沿线跨界民族的文化发展,同时也要建立相关组织机构,为沿线跨界民族文化交流提供组织保障。目前,我国已出台相关政策,帮助跨界民族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就“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资金融通也制定了相关规划,并开展了一系列沿线贸易、资金活动。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同组成的以促进成员国之间睦邻互信与友好关系、巩固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永久性政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友好交往提供了组织保障,有利于我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友好往来。同时,跨界民族间文化交流方面的机构建设也应提上日程,以促进沿线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为民心相通提供动力。建立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机构,旨在为跨界民族的节日庆典、文体活动、宗教祭祀等文化交流提供平台,促进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另外,“一带一路”沿线高校是各民族文化聚集和学术交流的最理想场所,具有进行文化交流的良好氛围,容易将各民族文化凝聚起来。所以,跨界民族地区的高等学校应充分发挥自身作用,成立民族文化交流机构,为沿线跨界民族文化交流提供

服务。这不仅可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跨界民族文化发展,有效促进沿线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可提高跨界民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增进民族间的友谊,推动我国传统文化“走出去”,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

3. 推动跨界民族地区文化发展

我国将跨界民族地区纳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体系中,使跨界民族地区由我国发展的边缘地带转变为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沿阵地,有利于跨界民族地区的长远发展。跨界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发挥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国家应给予大力支持。每年应组织各类艺术表演深入到跨界民族地区进行演出,丰富跨界民族地区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时,应加强跨界民族地区文物的保护,帮助跨界民族地区建立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等。2015年上半年建成的云南省博物馆,就体现了政府对云南地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视,同时也为该地区人民提供了更多了解本地区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机会。除此之外,跨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跨界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跨界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丰富,为该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近年来,党和国家为跨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促进了跨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繁荣,有利于提高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促进该地区跨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使该地区更好地融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充分发挥跨界民族的优势作用。

四、结语

“一带一路”是实现国家和区域间合作的重要方略,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五通”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跨界民族虽然被政治因素分割开

来,但由于他们有着相通的语言和族内通婚习俗,传统体育文化交流频繁,加之节日互动、共同的宗教信仰等为民心相通奠定了基础。跨界民族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必将在沿线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经贸往来、政策沟通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建立相关组织机构,厚植民心相通的文化根基,提高跨界民族民心相通的战略地位,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郝时远. 文化多样性与“一带一路”[N]. 光明日报,2015-5-14(05).
- [2] 张金平. 云南跨界民族的宗教安全问题探析[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4):4.
- [3] 周庆生. 中国跨境少数民族语言类型[J]. 文化学刊,2014(3):12.
- [4] 李锦芳. 论中越跨境语言[J]. 百色学院学报,2013(4):48.
- [5] 江南. 中越跨境民族婚姻家庭习惯法研究[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
- [6] 董建中. 云南边境民族地区跨境婚姻问题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5):38.
- [7] 华袁媛. 滇越边民跨境通婚的现状、影响及对策[J]. 文山学院学报,2015(1):39.
- [8] 黄光成. 跨界民族的文化异同与互动——以中国和缅甸的德昂族为例[J]. 世界民族,1999(1):25.
- [9] 曾建民,孙剑宇. 新疆与中亚跨界民族体育文化的互动及其价值研究[J]. 新疆社会科学,2009(2):42.
- [10] 葛公尚. 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3.
- [11] 普丽春. 桥头堡建设中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交往与安全[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2):8.
- [12] 纳文汇. 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建设中的宗教文化建设[J]. 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3):17.
- [13] 黄彩文,黄昕莹. 中缅边境地区布朗族的宗教文化交流与国家安全[J]. 大理学院学报,2014(7):17.
- [14] 中国宗教. 重视发挥宗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积极作用[J]. 中国宗教,2015(6):1.



引用格式:金勇强.“一带一路”视野下河南佛教文化旅游转型升级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5):40-47.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07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5-0040-08

“一带一路”视野下河南佛教文化旅游转型升级研究

Study 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Buddhist culture tourism in He'nan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金勇强^{1,2}

JING Yong-qiang

1. 洛阳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2. 洛阳理工学院 区域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 洛阳 471023

摘要:河南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核心区,河南的佛教文化与古丝绸之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发展也因此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河南拥有丰富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但目前存在着商业化开发过度、寺庙旅游发展两极分化严重、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激烈冲突等问题,这影响了河南佛教文化旅游的发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应转变原有的寺院治理模式和发展路径,以文化和机制创新为引领,通过优化寺院商业模式、创新管理机制、挖掘文化内涵和强化对外交流,实现佛教文化旅游转型升级。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佛教文化旅游;
寺院治理模式

收稿日期:2016-08-07

作者简介:金勇强(1982—),男,河南省洛阳市人,洛阳理工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当前,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河南省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加之河南的佛教文化与古丝绸之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使其佛教文化旅游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一带一路”的视野下,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如何提升自身的层次并推进转型升级,是我们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本文拟在对河南现存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丝绸之路与佛教的历史渊源,研究当前河南佛教文化旅游类景区开发运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在“一带一路”视野下应该采取的转型策略,以期有助于提升河南佛教文化旅游竞争力,实现“一带一路”视野下河南文化旅游的复兴。

一、河南佛教文化旅游研究综述

佛教在西汉后期传入中国,在将近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据统计,我国佛教名山有 219 座,主要佛教寺庙有 736 座,佛教主要的洞窟佛塔有 690 座^[1]。这些佛教文化遗产内涵丰富、类型多样、分布范围广泛,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极具特色和吸引力的人文旅游资源,与佛教有关的旅游项目,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类别。随着旅游业的兴旺和游客数量的增多,寺院收入不断增加,这有利于佛教文化的传承、交流与研究。由于佛教文化旅游有着重要的地位,不少学者对佛教文化旅游的内涵、应处理好的关系、注意事项和类型等进行了研究。例如,颜亚玉^[2]指出,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旅游是宗教信众以信仰为主要目的而从事的旅游活动;赵伯乐^[3]指出,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要处理好佛教文化内涵挖掘与佛教自身发展、旅游活动与正常宗教活动、佛教景区管理与利益分配之间的关系;明世法^[4]认为,宗教旅游利益分配应兼顾相关各方权益;彭惠军^[5]基于观察法,分

析了佛教文化旅游者的不同类型。河南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河南,此后,河南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于是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佛教文化资源。目前,河南全省有 267 座佛寺、130 座佛塔、15 个石窟和 14 座塔林,其中不乏一些世界级的旅游资源,如龙门石窟、少林寺、相国寺、白马寺等。^[6]在对佛教与旅游之关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进一步探析了河南佛教文化旅游的发展特点,如王海^[7]研究了河南嵩山少林寺旅游发展模式;李湘豫^[8]基于 GIS 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经济、交通等方面,分析了河南塔寺文化资源空间分布,研究了开封大相国寺的游憩价值。总的来说,相关学者对于河南佛教文化旅游的现状和发展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基于“一带一路”视野探寻河南佛教文化旅游问题的研究不多,研究者们对河南佛教文化旅游现状虽有认识,但对存在问题的分析还不充分,对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转型升级也缺乏深入思考。

二、“一带一路”对于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内涵提升的依据

“一带一路”建设将会极大提升河南佛教文化旅游的内涵,这是因为,一方面,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本身就与古丝绸之路存在密切联系,这是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内涵提升的历史根源;另一方面,佛教在东南亚、南亚地区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是沟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文化纽带,这是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内涵提升的现实依据。

1. 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内涵提升的历史根源

丝绸之路又被称作“佛教之路”^[9]。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均盛行佛教,甘肃、新疆境内丝绸之路沿线遗存了大量的佛教石窟,如喀什的三仙洞、吐鲁番的雅尔

湖、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和世界闻名的敦煌莫高窟,都是当年佛教兴盛的见证。^[10]由于汉唐时期中国的统治中心在中原地区,印度——西域的佛教文化在东渐过程中逐渐影响渗透了中原文化并与之融合。如果说丝绸之路是汉唐盛世物质文化空前繁荣的象征,那么佛教就是汉唐盛世精神文化的显著代表。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丝绸之路,而后东汉明帝于公元67年迎请印度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在洛阳建白马寺,佛教由此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再经魏晋南北朝,杨衒之在洛阳著下《洛阳伽蓝记》,佛教文化在中原地带进一步兴盛。随着隋唐时期国力的逐步增强,到唐代贞观年间,佛教的发展达到了历史高峰,形成了华严、天台、禅宗、律、净土、密等八宗,高僧辈出。其中,洛阳籍的玄奘大师沿着丝绸之路西行求法17余年,行程5万余里,回国后翻译佛经75部1000多卷,为中国佛教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武则天时期又对洛阳的佛教寺庙和龙门石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扩建,进一步提升了河洛地区的佛教文化氛围。总之,从汉朝到唐朝,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不仅是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也是佛教最兴盛的地方,佛教给河南留下了白马寺、龙门石窟、大相国寺等大量文化珍宝。河南佛教文化与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为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内涵的提升提供了历史根源。

2. 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内涵提升的现实依据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实现“五通”,“五通”之一是民心相通,而民心相通又是建立在文化交往的基础上的。佛教作为中国许多民众与东南亚、南亚诸多国家民众的共同信仰,发挥着民心相通的纽带作用,而河南作为汉传佛教发源地,通过河南佛教与东南亚等地佛教的交流与互动,可以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诸多国家间的互通互信。众所周知,

早期中外佛教交流肇始河南,在中印之间,随着汉代西域丝绸之路的开辟与佛教的传入,印度文化开始渗入中华文明体系之中,于是中国“始闻浮屠之教”,第一次了解到了南亚地理风貌。这种中印文化交流使古代中国第一次开始了对“西方”的探询与认识,从认识古代印度而最终认识到真正“西方”的欧洲,也使得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探索,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理探索之外,更增添了文化传播与沟通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印度僧侣东来传教的足迹,也有中国人“西天”取经的身影,而作为当时中国佛教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也成为佛教信徒们东传的终点与西去的起点。现存中原地区早期佛教寺院,印度元素仍是其不可或缺的文化印记。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传承地和汉传佛教发源地,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在佛教文化上有着天然联系,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一带一路”的实施必将带动河南佛教文化旅游产业大发展。河南与上述地区开展的以遗址保护为中心的佛教文化交往和跨文化互动,为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内涵的提升提供了现实依据。

三、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发展现状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佛教文化具备实现民心相通的巨大潜力,民心相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宗教旅游的形式实现。近年来,河南在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运营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首先,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品牌已经初步构建,国内外影响力显著提升。河南文化旅游部门以国内外知名的少林寺、白马寺和龙门石窟、大相国寺等为依托,全力构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宗教文化旅游品牌,2000年、2010年龙门石窟和少林寺相继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龙门石窟和少林寺成为首批国家5A级旅游

景区,目前白马寺和大相国寺正积极申报国家5A级旅游景区。电影《少林寺》的公映引起轰动,各种以少林为题材的影视作品随之出现。譬如,河南电视台参与制作了22集功夫电视剧《少林武王》,并主创大型电视连续剧《少林寺传奇》,上映后都观者如潮。^[11]少林寺名声大噪,景区游客大增,2015年接待国内外游客量达到1000万人次。此外,白马寺等其他宗教旅游景区的国内外影响力也显著提升。

其次,河南佛教文化旅游的文化品位显著提升,旅游文化内涵日渐丰富。随着河南省委省政府文化产业振兴战略的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快宗教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把资源要素转化为市场要素,已成为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近年来,河南基于少林寺精心打造了《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少林功夫等精品佛教旅游项目;基于白马寺推出了泰国、印度、缅甸等异国风情的寺院旅游项目,加强了与国外寺院的合作与交流,提升了宗教旅游的文化品位。另外,还相继推出了诸如宗教圣地朝觐游、宗教学习体验游、宗教胜地修心养性度假游等灵活多样的旅游活动,促进了宗教文化旅游活动与民俗活动的相互渗透。

第三,基于互联网技术,推动佛教景区向智慧景区转型。2015年7月15日,“互联网+龙门”智慧景区项目上线运营,龙门石窟率先跨入了“互联网+智慧景区”新时代。目前,龙门石窟已成为全国最具代表性的新型“互联网+”智慧景区中的典范和样板,全国首个4G、Wi-Fi全覆盖的大型景区、全国首个全面支持微信支付的智慧景区、河南省首个“互联网+”上线项目。智慧景区涵盖互联网+购票、互联网+游园、互联网+管理、互联网+宣传、互联网+经营、互联网+文物保护、互联网+文化创意等多项功能,为游客带来了佛教文化旅游全新的智慧体验。

尽管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佛教景区在定位上仍为观光类景区,经营模式单一,旅游内容死板;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佛教景区人流量高,商业化特征过于浓厚,以致于喧宾夺主,使寺院失去了人们心目中佛门净地的神圣光环;很多佛教寺庙因为地理位置偏僻等原因,多是养在深闺人不识。另外,由于佛教景区存在较多的利益相关者,其相互之间的纠纷与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景区的正常运营。

1. “神圣”的异化

当今时代,佛教寺庙的存续,除了信徒本身外,在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于旅游业。雅法尔·雅法里认为,“许多宗教和考古建筑之所以能从被毁坏的境地中拯救出来,更多的是由于旅游的发展,而不是由于它们在当地民众看来所具有的价值”^[4]。但佛教文化旅游开发也会给佛教文化带来负面影响,如导致佛教文化旅游区所处社区文化的异化、环境的污染、文物的破坏等,甚至使佛教仪式脱离原有的氛围,成为旅游产品提供者的商业化表演。“这种对佛教的亵渎可能在短期内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在很多事例中,这种商业化表演带来的影响是,使朝拜者不再坚信宗教仪式的神圣性。”^[4]目前,国内多数的佛教场所、仪式和节日变成了旅游吸引物,登封少林寺在国内佛教寺院中更是把商业化运作推到了极致。从1982年电影《少林寺》上映,少林寺就开始了其商业化之路。1974—1978年,少林寺的旅游人数总共才20万人左右,而1982年一年就暴增到70万人,1984年更是达到了260万人(见表1)。不过,少林寺真正的商业化运作还是从1998年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开始,此后少林书局、少林寺食品公司、少林香堂公司、少林文化传播公司等相继成立,2008年接管昆明四座寺庙,开创了特有的分寺模式,与此同时少林寺游客接

待量爆发式增长,至2015年攀升到了1000万人次。白马寺的商业化氛围不是很浓厚,但白马寺外围那片规模比白马寺本身更大的杂乱商业街区,仍给很多游客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象。

2. 发展格局的两极分化

尽管少林寺在商业化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种成功并不具备可复制性,绝大多数寺庙并无少林寺的地位、知名度和商业的可操作性,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佛教寺院面临着客源稀少、人不敷出的处境。河南省开放的佛教景区有192个,年游客接待量超过100万的只有5个,分别为少林寺、龙门石窟、中原大佛、大相国寺和白马寺,占佛教景区总数的2.6%;游客超

过1000万的景区只有1个,即少林寺,占佛教景区总数的0.5%(见表2)。根据2015年河南省旅游局与各地市旅游局给出的数据,在河南省内10个4A以上的佛教文化旅游景区中,少林寺一家游客接待量就占了10家寺院总接待人数的50%左右,客流量最高的登封少林寺与客流量最低的浙川香严寺的客流量比是92:1,这凸显了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发展的两极分化格局。

3.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

目前,我国旅游管理体制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赋权,如地方政府赋予旅游管理部门开发和决策的权责等。佛教景区不同于一般景区,

表1 少林寺商业路线图与游客量变化

年代	商业路线图	游客量(万人次)	年代	商业路线图	游客量(万人次)
1974—1978		20	2008	少林寺接管昆明官渡古镇的四家古刹,淘宝“少林欢喜地开业”	171
1982	电影《少林寺》公映	70	2009	少林香堂有限公司成立	189
1984		260	2010	港中旅与登封市政府重组少林寺景区,并计划上市,后因争议搁置	270
1986		267	2011		397
1989	少林武僧团成立	161	2012		560
1998	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106	2013		780
2002	少林书局成立	121	2014		879
2004	在维也纳开办第一节少林武术文化中心	116	2015	少林寺在澳大利亚购地建立分寺,所建项目中还包括四星级酒店、高尔夫球场等设施	1012
2005	少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并与深圳广电合推出功夫之星大赛	122			
2006	少林药局开张,少林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150			

注:数据来源于登封市旅游局官方网站

表2 2015年河南省主要佛教景区客流量统计表

景区名称	日承载量(万人)	瞬时承载量(万人)	日最大接待量(万人)	2015年总接待量(万人)
登封少林寺	6.82	2.810 9	9.5	1012
洛阳龙门石窟	7.9	0.963	10.1	412
平顶山中原大佛	9.9	4.5	7.5	296
开封大相国寺	5	0.9	7.2	164
洛阳白马寺	10	1.12	8.9	153
信阳灵山寺	5.6	0.8	2.1	46.6
汝南南海禅寺	16.754	2.355	1.2	31.2
汝州风穴寺	暂无	暂无	暂无	28.8
焦作圆融寺	4	0.5	1.6	14.6
浙川香严寺	2	0.4	0.8	11

注:数据来源于河南省旅游局与地方旅游局官方网站

其利益相关者众多,包括政府、佛教人士、佛教场所所在社区的群众、游客、相关企业等。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因职权、作用不同,其利益诉求也有很大差异。一些佛教寺院景区,企业的介入虽然提高了景区的管理效能,但随着利益主体的增加,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纠纷也变得更加不可调和。少林寺景区在引入港中旅之前,由少林管理局、嵩阳管理局和中岳管理局共同经营管理,其上再由嵩山管委会监督,由于政出多门,景区运营中矛盾丛生、事故频发。港中旅进入之后,对嵩山少林寺的三大片区少林景区、嵩阳景区和中岳景区实施经营、营销、财务、人员和管理“五统一”,三个管理局 600 多名员工全部纳入合资公司,管理局被取缔;将过去行政式管理转型为企业化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景区的管理效率,但这又与少林寺以释永信方丈为代表的寺方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企业化的管理模式也损害了政府及相关参与者的利益,这种冲突在 2010 年的上市风波中表现得最为突出。2009 年港中旅推出了少林寺上市计划,但遭到了寺院方的激烈反对,因为根据中国上市企业的管理规定,上市后在少林寺的运营管理和少林寺品牌的授权上,寺院方的利益必然会受到严重侵害。少林寺与政府之间也存在龃龉,嵩管委认为,少林寺作为文物,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少林寺仅有经营权和使用权。但寺方认为,所谓国家所有,概念很空泛,寺产归属界限不明,会导致少林寺无法获得自治的权利。利益纷争导致各方无暇管理,直接结果就是 2011 年少林景区面临 5A 级景区摘牌的危险。

四、“一带一路”视野下河南佛教文化旅游转型升级的应对策略

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

路。对于佛教文化旅游来说,应转变原有的寺院治理模式和发展路径,以文化创新和机制创新为引领,通过优化寺院商业模式、创新管理机制、挖掘文化内涵和强化对外交流来实现其转型升级。

第一,优化商业模式。商业化是寺院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途径,因为目前已非传统佛教时代,寺院土地房产均为国家所有而非宗教社团所有,僧人无法靠田产、地租和香火维持生计,必须找到新的生存模式和生活方式。日本也是一个佛教大国,目前约有 7.7 万个寺院,但预计 25 年内将减少三分之一以上,主要原因在于寺院的财政收入大幅下滑,不少寺院为了维持正常运营,不得不开展新业务,比如开设酒吧、主持养生讲座等。中国寺庙要想维持自身生存,商业化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但寺庙运营商业化应区别对待。对于知名度较高的大型寺院,如少林寺,需要控制商业空间扩张,保持寺院内较好的绿化环境和肃穆、清幽的宗教氛围,保证宗教文化旅游的质量和宗教活动的正常开展。因此,这些佛寺应注意限制游客数量。当然,在宗教节日或举行宗教法事活动时,可适当放宽对游客数量的限制。另外,应减少宗教场所内商业化成分的痕迹,在寺庙之内不宜随便开设商铺,商业空间应外移。宗教商品、手工艺品的开发等应体现宗教文化的品位,兼顾宗教文化旅游收益和游客宗教文化的消费需求。对于偏远的小型寺庙和知名度不太高的寺庙,应在政府的协助下加大商业营销宣传,并结合乡村旅游对其进行综合开发,以避免其消失。在商业化过程中,应严格限制以烧香、求签等为幌子的非法经营活动。对于一些具备重要遗产价值的寺院,如洛阳的白马寺、香山寺,应加强保护,在规划设计上应注重环境营造。

第二,创新管理机制。鉴于佛教寺庙利益相关者众多,应由各相关主体联合成立一个具

有广泛代表性的管理委员会,形成专业的佛教旅游综合管理和服务部门,吸纳包括旅游、景点居民、宗教人士、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旅游管理部门、文物管理部门、林业部门、工商管理,以及相关企业的代表共同参与管理,形成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协商对话机制,及时缓和与化解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将管理模式从完全的政府主导转变为社区主导、政府协调、全社会参与,使当地各种宗教团体、相关机构、普通群众都能选派代表参与到旅游发展决策过程中来,因为这些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影响到每一个旅游项目的开发,从初始的可行性评估阶段直至实施阶段。这样做可以使多方的诉求都能得到表达,权利都能得到尊重,利益都有机会实现。政府和寺院不应反对佛教寺庙引进先进企业管理方式,但应反对纯粹的以营利为目的、把寺庙承包给公司或个人经营的行为,反对宗教活动场所以任何形式上市。此外,将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民法总则》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其中,非营利法人又分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捐助法人,捐助法人包括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和宗教活动场所。这就意味着宗教活动场所所有捐助法人资格,其法律地位将得到保障,这不仅有助于政府对寺院的管理,也有助于寺院明确自身地位,促进佛教寺院景区的正常运营。

第三,构建“一个品牌三个中心”的佛教旅游版图。“一带一路”倡议源起古丝绸之路,不仅有明显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文化是佛教文化旅游的灵魂,独特的文化内涵是佛教文化旅游的生命力所在。目前河南佛教遗产旅游对宗教文化内涵及艺术价值的深度挖掘不够,将旅游资源等同于旅游产品,佛教文化旅游产品类型单一,结构不尽合理,佛教文化的展现大多是一种浅层的体验,不同寺院的佛教文化内容雷同,缺乏差异性。河南佛教文化旅

游应对不同佛教文化遗产地的文化进行深入发掘,凝练内涵,提炼主题,找出其文化异质性,凝练遗产旅游地的文化意象,将其活化、可视化,并进一步品牌化,最终实现其文化传承与扩张。根据河南省目前的实际情况与佛教寺院的分布特点,综合考虑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建议以“一个品牌、三个佛教文化传播中心”为发展重点,推动河南佛教文化的传承与扩张。“一个品牌”即充分发挥登封少林寺在佛教旅游方面的综合优势,把少林寺打造成世界级的佛教文化品牌,“三个中心”即以汉传佛教发源地闻名的洛阳白马寺、以禅宗祖庭和少林武术闻名的登封少林寺、以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皇家寺院闻名的开封大相国寺为中心,采用差异化发展思路,形成各自有代表性的佛教文化旅游产品。

第四,大力发展禅修旅游。在佛教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上应注重激发旅游者对宗教文化的浓厚兴趣和深层体验,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结合起来,构建新型佛教体验式旅游——禅修旅游。这是挖掘佛教文化内涵、促进佛教文化旅游升级的有效路径。禅修旅行就是听禅院钟声,品清风朗月,抛却宠辱、名利和欲望,享受那份惬意与自在,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来一次心灵之旅。这种将修身养性与休闲度假相结合的禅修旅游,目前已成为部分都市白领舒展身心、减轻压力的有效途径。台湾地区有1200余万的禅修客,占台湾总人口的二分之一,每年要到妈祖庙进行为期两三天甚至一周或半月的禅修。在北京、广州的一些寺院,禅修旅游亦相当盛行,广东四会六祖寺禅修中心和北京市怀柔区甘涧禅修中心是国内知名的禅修中心。相比上述地区或城市,河南省的禅修旅游才刚刚开始,目前主要以登封少林寺周边为主,由于少林寺的商业氛围浓厚,禅修旅游的规模不大,效果也不太理想。但河南省发展禅修旅游的资源优势得天独厚,如果将修身养性的禅修与休闲旅

游结合起来,深度开发以禅修、静心、休闲、减压为主题的禅修旅游特色产品,让游客通过坐禅、听经、食素来了解禅宗知识、舒展身心,在山水间体验心灵旅行,则会对游客认识生命有相当裨益。在各地都以娱乐化为标准包装、发展佛教文化旅游的背景下,河南如果能另辟蹊径,走以禅意之境为主题、以心灵关怀为重要元素、以禅修为重要手段的佛教文化旅游发展道路,那么未来河南佛教文化旅游在文化内涵上将会有巨大的提升。

第五,实现国内外互联互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地处内陆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将极大改善交通条件,促进东部旅游客源进入中西部旅游市场,同时也将显著繁荣周边国家与中国边境省份之间的边境旅游。国家旅游局预计,“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8500 万人次来华旅游,拉动旅游消费约 1100 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成为中国入境游的重要客源国。对于河南省旅游业的发展而言,“一带一路”给予了我们走出去的巨大机遇,走出去不仅应凸显河南作为华夏文明传承地的历史地位,更应凸显河南作为汉传佛教起源地的价值。从登封天下之中的少林寺,到洛阳释源祖庭的白马寺,再到开封宋朝皇家寺庙大相国寺,河南应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借助佛教与东南亚和日本等国的天然联系,加强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旅游往来。对此,河南首先应完善郑州、洛阳、开封等城市的佛教活动场所建设,展示河南文化软实力。其次要充分发挥宗教团体的作用。河南省佛教协会应不断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夯实宗教团体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制度基础,充分发挥省佛教协会在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主渠道作用,着力打造世界级佛教用品展、佛教艺术展等佛教会展品牌。再次,政府应给予政策支持,扶持各种协会办好

展会。引导宗教界与国外佛教圣地、学院沟通交流,提升河南佛教的影响力。此外,还应加强佛教外语人才培养,搭建省佛学院与高等学校合作办学平台,培养宗教外语人才,提高僧众的综合素质,为对外交往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马进福. 我国的宗教旅游资源及深度开发[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7(1): 107.
- [2] 颜亚玉. 宗教旅游论析[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3): 69.
- [3] 赵伯乐. 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1): 42.
- [4] 明世法. 社会学视角下的宗教旅游开发与共赢理路——以中国佛教旅游开发为例[J]. 云南社会科学, 2008(6): 88.
- [5] 彭惠军. 佛教寺庙旅游者类型研究——基于观察法的实证分析[J]. 旅游科学, 2012(2): 50.
- [6] 李湘豫. 基于 GIS 分析的河南佛教塔寺文化旅游地域分异研究[J]. 经济地理, 2012(12): 176.
- [7] 王海. 河南嵩山少林寺旅游发展模式研究[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09.
- [8] 李湘豫. 河南佛教文化体验式旅游 ASEB 分析[J]. 地域开发与研究, 2011(4): 98.
- [9] 冯宗宪. 中国向欧亚大陆延伸的战略动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线路划分和功能详解[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4(4): 79.
- [10] 许建英.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野下新疆定位与核心区建设[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 61.
- [11] 王灿. 论中国文化产品的深度符号化、系列化——以少林影视作品开发为例[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1): 32.



引用格式: 聂伟. 基于会展业的郑州城市文化传播——以上合会为例[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5): 48-53.

中图分类号: G12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08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5-0048-06

基于会展业的郑州城市文化传播

——以上合会为例

Urban culture communication of Zhengzhou convection and exhibition industry

—Taking the Council of Heads of Governmen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 Members States for example

聂伟

NIE Wei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政法与传媒系, 河南 郑州 450007

摘要:近年来郑州会展业的快速发展为郑州城市文化带来了新的传播机遇。2015年12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14次会议在郑州的成功召开,开启了郑州城市文化对外传播的新篇章。上合会在郑州召开是郑州城市文化建设的“成人礼”,其主旨契合郑州“国际商都”的城市主题文化,是郑州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正因为上合会对郑州城市品牌塑造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上合会在郑州召开前夕和会议期间,郑州市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媒体和社会公众都积极借力这一空前的国际盛会,以形象宣传片、城市微电影、邮政明信片、原创歌曲MV、上合会里的中原文化氛围等各种形式,积极传播郑州城市文化。解析这一借助大型国际会展进行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发现其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不足是:宏观上缺乏整体规划,深度和广度仍然有待提升。郑州应充分利用举办各类会展活动的机会,通过完善传播规划、甄选传播内容、拓展传播渠道、改进传播方式,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充分展示中原古老文明的优秀成果和现代文明创新的成就,并将其打造成为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从而真正“让世界了解郑州,让郑州了解世界”。

关键词:
 会展业;
 上合会;
 城市文化;
 新媒体

收稿日期: 2017-05-16

基金项目: 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课题(162400410575); 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2016GGJS-223); 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2016-04)

作者简介: 聂伟(1982—), 女, 河南省永城市人, 中原工学院副教授,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 文化传播、新媒体应用。

2013年,我国面向国际社会倡导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得到沿线国家与地区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既承载着区域间经贸往来的重任,又是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人文合作和文明互融的桥梁和纽带。郑州作为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国家中心城市,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更应注重城市文化的弘扬和传播,实现文化建设与经济互惠共赢。目前,郑州面向国际、引领中西部的会展中心城市格局正逐步形成。“十二五”期间,郑州共举办展会近千个,参会客商约1330万人次。据统计,郑州2016年举办的经贸类展会数量与深圳并列,位居全国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广州。^[1]文化传播是指发生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人们精神追求、行为模式的交流与互动过程,它既包括特定族群、社会内部的交流与互动,也包括不同族群、社会之间发生的文化互动。^[2]文化传播的实现依赖特定的时空条件,而大型国际会展作为世人瞩目、资源密集的文化平台,凭借其强大的传播功能,给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载体和平台。郑州会展业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空间也为郑州城市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绝佳机遇。

2015年12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以下简称上合会)第14次会议在郑州召开,给郑州城市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成为郑州城市品牌建设的拐点性事件。本文拟通过上合会对于郑州城市文化传播价值的解读,回顾上合会期间郑州城市文化传播的具体实践,给出进一步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郑州城市文化对外传播新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一、上合会对于郑州城市文化传播的价值

第14次上合会的召开,旨在全面提升上合

组织成员国各领域合作水平,深化中国同有关国家之关系,对于承办地而言,它为郑州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在为郑州提供发展契机的同时更为郑州城市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大的舞台,使郑州城市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得以发展创新。

1. 上合会是郑州城市文化建设的“成人礼”

成人礼,是指少男少女告别青葱岁月、宣告长大成人的人生礼仪^[3]。经历了成人礼也就意味着少年即将告别冲动、急躁和一味的模仿,逐渐走向沉着和从容,形成自我的个性和风格。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其文化建设与发展初期往往伴随着简单粗放的复制模仿,虽发展迅猛却缺乏个性与特色。只有当城市有了足够的积累和沉淀,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创新从而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后,才标志着其已步入成熟期。

改革开放以来,郑州在西风东渐过程中不断复制和吸收外来的技术与经验,城市经济和管理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郑州依托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国家公路、铁路交通枢纽地位,大力发展交通事业,国际航空港、米字型高铁网络、中原国际陆港的建设,郑-欧班列和数十条国际货运航线的开通,国际商贸物流中心地位明显提升,一个现代化的国际综合性交通枢纽呼之欲出。基于此,郑州货畅其流、买卖全球的“国际商都”城市特色日趋显现。对于向来只在国际经济重镇举办的上合会,能够在郑州召开正是对郑州城市发展定位和管理能力的认可,必将成为郑州从青涩懵懂走向成熟从容的里程碑。

2. 上合会的主旨契合郑州城市主题文化

城市主题文化展现着城市的个性和特质,是城市定位和发展的基础。世界知名城市无不以城市主题文化而闻名,如“音乐之都”维也纳、“浪漫之都”巴黎,我国的西安也以“东方神

韵”享誉海内外^[4]。多年来,郑州一直在探索和构建城市主题文化的道路上不懈努力,也曾多次提出过城市的发展定位,如“绿城”“轻纺城”“东方芝加哥”“动漫之都”等。然而,这些定位都只刻画了郑州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段历史或一个侧面,不能精准反映城市文化的核心。随着郑州对外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发展,这些定位已经不能聚合并引领郑州城市文化的发展。城市主题文化的缺失,也导致郑州城市文化的建设和传播没了“主心骨”,传播诉求趋于分散,传播行为无的放矢,难以形成合力。

郑州,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交通优势得天独厚,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适时地提炼出“国际商都”这一最能体现自身特质的文化主题,用以指导郑州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并以打造“国际商都”作为城市形象定位,可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而上合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地域范围、发展理念上高度契合,都注重国际间政治、经贸和人文方面的合作。因此,上合会在郑州召开对于郑州传播其“国际商都”城市主题文化是个难得的机遇。

3. 上合会重要的跨文化传播平台

众所周知,国际展会在塑造城市形象、传播地域文化方面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如上海先后承办的2001年APEC会议和2010年世博会,让上海为世界所瞩目,大大提升了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际展会本身就是一个媒体,是城市形象和地域文化的输出窗口。

第14次上合会是郑州历史上举办的最高规格的国际会议,既有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政府首脑和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到会,同时也吸引了来自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哈萨克斯坦国际通讯社等国外媒体,以及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央媒和国内地方媒体的数百名记者参与会议的全程报道。^[5]新华社播发长文为郑州的发展点赞,

外国记者用镜头如实向世界展示郑州的优势和特色,特别是以《大河报》、河南电视台等为代表的河南本地媒体凭借地缘优势,投入强大的报道团队,采用纸媒、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开展全媒体传播,同时创新性地引入中英文双语新闻发布,充分利用这一国际会议带来的集聚拉动效应和全球关注度,对郑州城市的现代文化、传统文化和人文文化进行了客观而深入的报道,这对郑州乃至河南对外形象的重塑和优化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上合会以其媒体关注度高、受众覆盖面广、传播影响力大等优势成为郑州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

二、面向上合会的郑州城市文化传播实践

正因为上合会对郑州城市品牌塑造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上合会在郑州召开前夕和会议期间,郑州市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媒体和社会公众都积极借力这一空前的国际盛会,以各种形式积极传播郑州城市文化。

1. 形象宣传片:世界,由此东望

2015年8月,上合会在郑州召开前夕,一部由河南本土文化公司摄制的河南形象宣传片《世界,由此东望》在“世界十字路口”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高调亮相,以每天滚动播放80次的频率连续展播一周时间,为河南赚足了世界的目光。

时长60秒的宣传片以凸显中原特色的“中、和、粮、商”为主线,龙门石窟、太极拳、豫剧、汴绣、清明上河图等河南名片,以及少林功夫、嵩岳寺塔、二七塔、观星台、航空港、烩面等郑州元素悉数出场。创作者在捕捉真实的同时,巧妙自如地选取和拼接镜头素材,并辅以恰如其分的背景音乐,将河南和谐共融的生活气息与有容乃大的人文情怀生动真实地传递给世

界。宣传片结尾的标题字幕“世界,由此东望”,更是彰显了河南和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敢为天下先的恢弘气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宣传片中挥毫泼墨书写的“商”字,充分展现了郑州城市的主题文化。片中重点展示的郑州航空港、保税物流区和高铁等影像镜头,意在向世界宣告郑州敞开心怀拥抱世界,全力打造国际商都的优势、魄力和决心。

2. 城市微电影:讲述好郑州故事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来自全球不同文化背景的数以十亿计的互联网受众赋予了微电影跨文化传播以明显的优势。注重生活化叙事的城市微电影,淡化了城市的宣传色彩,逐渐引领起城市文化传播的新风向。

由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组织拍摄的《爱上郑州》系列微电影是宣传郑州城市文化的得力之作。该系列微电影以发生在郑州的真人真事为创作蓝本,用小故事来呈现城市大爱,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的成功典范。其一,微电影是国内外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微电影拥有独特的故事化叙事结构、丰富多样的视听语言和灵活便捷的观看方式,它从一诞生就深受海内外受众的喜爱。早在2006年“浪漫之都”巴黎就推出了《巴黎,我爱你》系列微电影,用18个小故事讲述巴黎这座城市的爱情、亲情、友情和人性,试图将爱的神话与巴黎的神话结合起来。其二,用国际表达讲好郑州故事。《爱上郑州》系列微电影在国内首次邀请国际微电影大师担任导演,从外国人的视角、以国外表达习惯、运用国际通用语言客观地反映郑州,有效规避了“以我为主”传统跨文化传播模式所裹挟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其三,以平民化视角讲述鲜活生动的郑州故事。《爱上郑州》系列微电影避免了刻意的装扮和宏大的叙事,以普通市民的个体故事来展现郑

州的整体形象,跨越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鸿沟,于真实、细腻中向世界传递出郑州城市的温情和大爱。

3. 邮政明信片:把美丽郑州寄出去

2015年12月,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联合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郑州市分公司等企业共同发起了“把美丽郑州寄出去”城市主题外宣活动,一张张印制着郑州城市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地域文化的邮政明信片化身城市代言者,成为传播和弘扬郑州特色文化的城市名片。这次活动深入到郑州市内的高校、社区、公园、部队、商圈和景区,邀请市民免费领取城市明信片并向外投递,呼吁大家争当郑州城市文化对外传播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开启了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民互动的城市外宣新模式。同时上合会在郑州召开期间,这套明信片也得以在国际舞台上一展风采。

“把美丽郑州寄出去”活动采用明信片这一传统媒介作为传播载体,选取嵩山、黄帝故里、少林寺、河南省博物院、二七纪念塔、郑东新区等城市标志性元素作为传播内容,并使用商城文物——杜岭方鼎作为邮资图,传达了郑州城市的淳朴与厚重、热情与活力。

4. 原创歌曲MV:唱响郑州最强音

上合会在郑州召开期间,在全国各大网络平台上广为传播的名为《郑州欢迎你》的原创歌曲MV,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郑州欢迎你》以热情欢快的音符向世界追忆着郑州悠久的历史,述说着繁荣郑州的现代文明,期许着更为美好的郑州未来。这是郑州报业集团与中原网为郑州上合会特意准备的献礼作品,该MV一经推出即受到网友们的热捧,短短数天时间内在各视频平台上的总点击量就已突破千万。该歌曲陆续在郑州各大户外屏幕亮相,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瞬间刷爆,各大新闻媒体踊跃转载,网友们纷纷点赞、转发和评论,《郑州欢

迎你》已然成为郑州上合会期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音乐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它超乎国家、民族和文化,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和感染力。《郑州欢迎你》歌词朴实真诚,旋律优美明快,充分表达了郑州人民喜迎上合会的喜悦心情和对上合会客人的欢迎之意。MV选景郑州CBD、国际会展中心等上合会场馆,以及嵩山少林、中原福塔等地标景观,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郑州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气息。歌曲中的河南方言说唱部分,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进一步强化了市民对郑州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5. 上合会里的中原文化:让郑州站在全球聚光灯下

在外事活动中,文化是很好的纽带,往往成为活动各方加深理解、增进互信的催化剂。为了让与会的国际友人共享郑州现代文明成果,全方位体验底蕴深厚的中原文化,上合会议组织方可谓煞费苦心。

第14次上合会的举办地郑东新区是河南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样板、我国中部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缩影。在会议休息期间,李克强总理陪同各国政要漫步如意湖畔,亲身感受这座现代化新城的迷人魅力。在会议新闻中心悬挂有郑东新区、少林寺、嵩山、云台山等中原地标的照片,便于借助记者们的镜头将美丽河南传播出去。在上合会欢迎晚宴上,郑州烩面、焦作铁棍山药、开封吊炉烧饼、南阳黄牛排、登封芥菜丝、杞县紫薯……这些极具中原特色的传统美食让参会嘉宾真切感受到了“舌尖上的河南”。而在晚宴后的文艺演出中闪亮登场的河南两大特色文化品牌——豫剧《花木兰》和武术《少林功夫》,则又为客人奉上了一场赏心悦目的文化视觉盛宴。在上合会议结束后,政要们饶有兴致地来到千年古刹少林寺,感受禅宗文化,深切体会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

三、基于会展业的郑州城市文化传播对策建议

上合会大大促进了郑州城市文化传播,这是借助大型国际会展进行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检视其在文化传播方面的不足,主要是宏观上缺乏整体规划,深度和广度仍然有待提升。

1. 传播规划

作为“中部会展之都”,郑州正在向全力打造国家区域性会展中心城市的新目标迈进。2016年8月底,郑州市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国家区域性会展中心城市建设意见》指出,到2020年郑州市可供展览面积将达到50万平方米以上,年规模以上展览数量350次,平均每天1个展会。^[6]郑州应以此为契机,开启国家区域性会展中心城市建设的新篇章。为此,首先,应拟定郑州城市文化传播的长远规划,将会展业发展与城市文化传播融会贯通,从而充分挖掘会展的文化传播价值,扩大文化传播效果。其次,应做好充分调研,学习先进地区的做法与经验。设立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为文化传播提供专业的分析和指导,同时加强与国内外相关方面的交流,学习其先进经验。再次,应针对大型会展的举办,做好文化推广的组织、统筹和相关预案。结合会展的特定主题,就城市的基础设施扩建、媒体宣传推广、工作人员文化素养提升等方面制定具体方案,挖掘和培养具有一定文化推广能力的文化使者,形成一整套与大型国际会展相匹配的郑州城市文化传播方案。

2. 传播内容

传播内容是文化传播的核心要素,不同城市地区文化传播的内容不同,即使对于同一个城市,面对不同的传播对象,结合不同的会展主题,其具体要求也不大相同。郑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文化成果丰硕,文化传播内容需要做系统的梳理,提炼

出郑州城市文化传播的核心要义。其一,应利用大型国际会展的机会,认真梳理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从方言、戏曲、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提炼契合郑州城市文化的精神符号,进行包装和传播;其二,应树立感官品牌意识,充分挖掘郑州城市文化内涵,多角度、多形式地开展文化活动,从不同领域展示郑州城市文化,力争较为全面地呈现郑州城市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三,应对中原文化进行凝练,结合时代特色设计出属于郑州市的吉祥物、标志等文化符号。

3. 传播渠道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播媒介越来越多,每一种新型媒介的产生都会开创人们认识世界的新方式,扩大传播效果。郑州城市文化要想得到广泛传播,就必须根据大型国际会展的一般规律,通过不同传播媒介全方位开发,联动营销,发挥多种媒介组合传播的效能,达到文化广泛而深远传播的目的。

其一,应借助新媒体社交平台增强传播的互动性。可拍摄契合会展主题与郑州城市文化主题的形象短片或者微视频,并通过官网、优酷土豆等视频网站或者 PC、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传播,同时也可以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社交平台传播,以增强其互动性,从而实现城市文化的裂变式传播,提升传播效果。

其二,应利用各种新型媒体形态扩大传播范围。会展期间可以利用城市彩屏、楼宇电视、车载移动电视等新型媒体渗透式地传播城市文化,以满足受众碎片化信息消费的需要,进而赢得受众的认可和喜爱。

其三,应重视传统媒体,增强传播权威性。会展期间可在传统媒体上开设城市文化传播相关栏目,吸引特定受众,增强传播的权威性。

其四,应增加线下活动,提高公众参与度。可选择富有地域特色或能体现民族风情的文化

热点区域设立文化体验项目,像豫剧、武术、食品制作等均可以让人学习体验,而对于不便于实际体验的也可通过 VR 技术等展现,真正实现对城市文化可听、可视、可感、可触等多维度的立体化传播,从而拉近受众与郑州城市文化之间的心理距离。

四、结语

文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会展业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大型国际会展不仅是郑州通往世界的窗口,更是郑州城市形象塑造和城市文化传播的平台。因此抓住会展机遇对推进郑州城市文化传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应通过构建完善的传播策略,充分展示中原古老文明的优秀成果和现代文明创新成就,并将其打造成为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以增强中原文化的吸引力,提升河南外在形象,“让世界了解郑州,让郑州了解世界”。

参考文献:

- [1] 李林.《2016 中国展览统计数据报告》发布 郑州“会展”首进前十[N]. 河南日报,2017-04-30(03).
- [2] 王国安,要英.汉语国际推广与中国文化[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28.
- [3] 杨剑.期待中国城市的“成人礼”[N]. 文汇报,2010-02-24(05).
- [4] 聂伟.新媒体语境下城市文化传播方式创新研究——以郑州为例[J],新闻知识,2015(1):44.
- [5] 中原网.上合在郑州[EB/OL]. (2015-12-19) [2017-04-19]. http://special.zynews.cn/node_39735.html.
- [6] 成燕.郑州拟5年内建成国家区域性会展中心[N]. 郑州日报,2016-08-26(01).



引用格式: 闻英, 宋银磊. 网络消费中的社会信任危机——以“双十一”退货潮为例[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5): 54-60.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09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5-0054-07

网络消费中的社会信任危机

——以“双十一”退货潮为例

Social crisis of confidence of internet consumption

—Taking double eleven return tide for example

闻英, 宋银磊

WEN Ying, SONG Yin-Lei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电子商务的出现颠覆了原有的职业体系和个人生活的组织结构, 重新激起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无论富人阶层还是中产阶级乃至高校学生, 大多有网上购物的经历, 由于现阶段买卖双方成熟的认同机制还未真正建立、第三方物流组织与买方双“污名化”、电商平台交易规则及相关法规不完善等原因, 网络消费中信任危机事件频发, 极大影响了电子商务乃至现实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我们应当通过构建买卖双方认同机制、用适当的消费约束和高效有保障的服务质量消除物流“污名”、强化第三方平台对零售商失范行为的监督、完善他律环境, 全面构建网络消费的社会信任机制。

关键词:

网络消费;
社会信任;
退货潮

收稿日期: 2016-09-18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BSH009)

作者简介: 闻英(1966—), 女, 河南省汤阴县人, 郑州轻工业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应用社会学; 宋银磊(1993—), 男, 河南省周口市人, 郑州轻工业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应用社会学。

近年来,随着各大电商借助网络社交传媒等促销平台的大肆宣传,网络购物逐渐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重要形式,由网络购物所引发的社会信任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5年“双十一”期间,有关电商、物流、支付机构与消费者等各个主体之间的失信案例数量同比增长57.49%。^[1]网络购物过程中的虚假宣传、价格欺骗、恶意差评,以及由此诱发的退货潮,都是网络消费中信任危机的表现。隐藏在网络消费各环节中的信任危机若规范不当,就会导致流通在虚拟网络层面上的不信任心理延伸到现实社会,对社会的有序运行和稳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可见,构建网络消费信任,无论对电子商务的长久发展还是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网络消费中的信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国外学者对网络信任危机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也相对深入。学者们主要从风险维度、文化适应,以及消费者、第三方物流和网络零售商等视角对网络消费中的信任问题进行独立研究。例如, MKO Lee等^[2]通过实验发现,商家的可信度、环境因素、个人信任倾向共同影响消费者对网上购物的信任; A. Cases^[3]指出,网购产品的表现风险、时间风险、递送风险与经济风险等风险维度在远程购物中会越加突出,从而加剧信任危机; A. Vance^[4]则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指出不确定性回避行为会左右网购者对零售商和社会政策的信任,个体主义盛行的欧美国家有少量的不确定回避行为; D. Gefen等^[5]学者从网络购物与网购时间长短之间的关系层面指出,网购经验越丰富,购物者信任程度对网购行为的影响越弱。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网络消费中社会信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21世纪以来,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国内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

究才逐渐增多。当前,国内学者主要围绕网购消费信任度的影响因素、政策法规文本制定和网络消费信任变化趋势等主题对网络信任问题进行研究。例如,庞川等^[6]认为技术、个人、商业等因素影响网购消费的信任度;蔡军^[7]认为网络团购中的消费者信任因素、信任与信任导致的团购意愿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管益杰^[8]指出,网购中需注重消费者信任变化趋势和爆发信任危机后重建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李东进^[9]认为远程购物环境下相对宽松的退货政策有利于缓解消费者退货后的负面情绪,同时可以适当缓解网络消费中的信任危机。可见,既有研究更多的是将网络消费视为一种静态事件,而网络消费实质上是一种动态的实践过程,涉及不同参与主体的互动关系。鉴于此,本文拟以社会互动为视角,从买家与卖家、买家与物流、政策文本与政策执行三方面的互动关系出发,来探讨网络消费中的信任危机,以期有助于推动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本文运用定性研究方法,相关资料通过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和文献法获得。其中,参与式观察是作为局内人的观察,以探知网络消费者在退货过程中的心态变化、“双十一”前后快递在物品运输递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网络零售商在售前、售中和售后三阶段的态度变化趋势;半结构访谈是在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选取有代表性的网络消费者、快递人员和网络零售商等网购中不同身份群体的人开展访谈。本研究分别对“双十一”期间的网购消费者、快递人员和网店零售商等23名人员开展了半结构访谈。

二、退货潮中的网络消费信任危机

中国经济导报数据显示,2015年11月

11~15日,涉及网购环节中买卖双方、物流、电商平台四方主体的失信案例数量同比增加57.49%。这些失信行为中,最大的“毒瘤”是售假问题;涉及消费者失信的案件有1446例,其中50%为恶意差评,消费者提供虚假信息的占9.44%,甚至有消费者收货不付款、信用卡恶意透支,等等。^[10]

媒体与网民曝光最多的十类失信问题见图1。由图1可知,“双十一”涉嫌售假导致失信的比重最高,占22.96%;误导宣传、虚假广告、价格欺诈和质量不合格分别占18.14%、13.14%、11.37%和9.55%;虚假发货占5.67%。网络消费信任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 买家与卖家之间的信任危机

在网购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失范现象开始凸显,其中网络交易不诚信、网络欺诈等尤为引人关注。^[11]“双十一”期间各大电商极力挑起网民的消费欲望,网购数量与网购规模均快速增长,但社会转型期的网络购物平台和网络零售商呈粗放式增长之势,因而,网络零售商服务水平、服务态度与货品质量等良莠不齐,销售假货与售后态度恶劣者不胜枚举。此外,商家对促销期商品退货的限制较多,如商品拆过不退、化妆品与食品不退、预定产品不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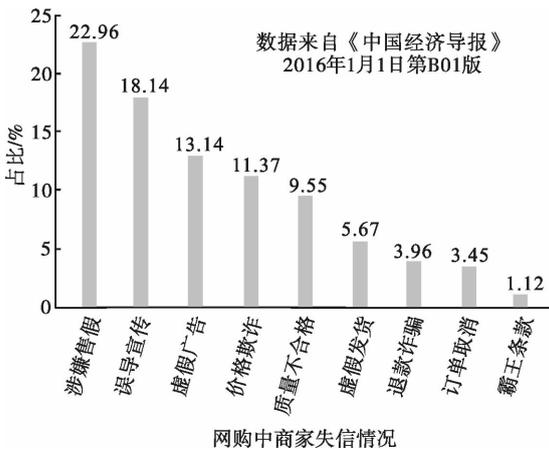


图1 媒体与网民曝光最多的十类失信问题

2015年“双十一”期间部分商品销售领域失信情况见图2。由图2可知,“双十一”期间电子产品领域失信比例最高,占35.28%;服装鞋袜与家电产品失信比例也居高不下,分别占23.97%和12.31%。除此之外,化妆品、食品饮料、母婴用品和家居用品领域的失信比例也都达到了5%。

除大数据统计显示历年“双十一”期间失信状况频发外,笔者通过对消费者GX20(字母代表被访谈者姓名首字母,数字则表示访谈的顺序,下同)的访谈也佐证了该现象。消费者GX23讲:“2016年‘双十一’的预售活动可把我坑坏了。我在11月10当天一直等到快24点,就是为了抢预售货品,结果在23点58分时还在和我聊天的客服,到‘双十一’凌晨竟然下线了,预售产品网页也打不开了。我感觉他们这是在骗取关注度和浏览量。”

信任是保证网络交易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也是网络交易的润滑剂,可促使交易双方的合作正常进行。^[12]网购过程中由于买家与卖家之间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等,部分不诚实商家更易利用虚假购物环境欺瞒购物者,使买家处于信息弱势地位。^[11]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买卖双方的对立情绪,导致了买家对卖家的不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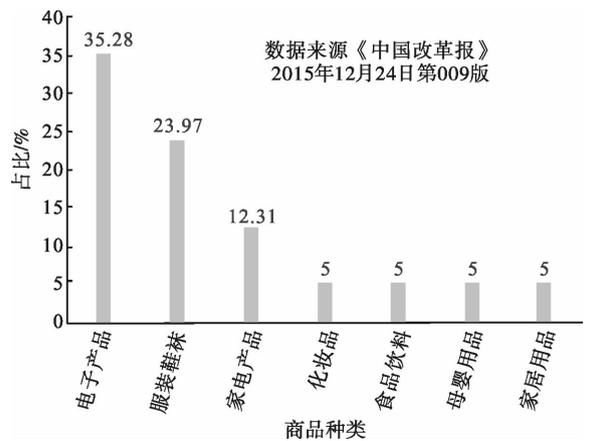


图2 2015年“双十一”期间部分商品销售领域失信情况

同时消费者的无顾忌下单行为也使卖家对买家产生不信任感而采取拒退、言语威胁等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第三方平台“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又为消费者上述行为提供了无责操作空间。电商 FLH5 讲:“‘双十一’期间,个别消费者利用网购‘冷静期’和‘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等售后条款盗换商品,我们很无奈,另外,过高的退货率将影响店铺在同类搜索引擎中的排名,因此,能不退就尽量不退。”而消费者 SYX3 讲:“我看同学在‘双十一’期间都是疯狂购物,还说反正可以无条件退货,先买过来,不行再退。他们都这样而且也可以借此机会试试更多的衣服,多划算啊,所以,我也打算买好多东西,至于要不要那就等寄过来后再慢慢挑选要哪些喽。”

许多网络消费者受此类群体影响,成为无顾忌下单随后大量退货的网络消费者,经济学家将这种行为称为“跟潮效应”。在“跟潮效应”影响下,部分电商对网购消费者下单的购买真实性会产生怀疑。

可见,网络消费的买卖双方信任构建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些取巧耍滑心理,这会有损交易双方的正常合作,进一步加深买卖双方的信任危机,若其长期存在,会不利于虚拟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2. 买家与物流之间的信任危机

众所周知,国内物流业是在电子商务井喷式发展的基础上才得到飞速发展与扩张的。但这种发展多停留在量的突破而非质的提升阶段,相对于 UPS 等全球顶尖物流服务业,国内民营物流业在技术、设备和资金等方面还存在着巨大差距,尤其是在人员管理和运营管理方面。因此,国内网购递送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货物人为毁坏甚至监守自盗现象,货物在配送过程中存在很大的损毁风险。

快递负责人 LPC10 讲:“X 高校圆通快递

负责人说,‘双十一’期间送货和退货比达到了 6:1,平时大约只是 9:1。这个快递点也刚成立没多久,‘双十一’高峰期送快递的人手都不够,上门取退货件也只能往后拖。”快递员 LZK16 也说:“哎,没法说,赶到‘双十一’虽说忙碌一个月超以前 3 个月干的,但是,还是很烦。这些取快递的无聊吗?买了好多东西取的时候说我们送快递的干活不积极,快递送得慢,还投诉快递员服务态度不好,然后没过几天又给快递公司打电话说快递要退,还让上门揽件。这一个月虽说挣了不少钱,但也受了不少气。”

传统短缺经济时代,欲望常常受到道德攻击,被认为是邪恶和堕落的根源。随着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欲望急速膨胀。“双十一”期间,各大电商的大规模造势诱使很多消费者过度集中购物,出现非常严重的非理性购物倾向,从而将需求与欲望两个概念相混淆,出现“节前买一大堆,节后退一小堆”的现象,这给线下快递服务造成了巨大压力。快递在节后的超负荷运行更易使本就刚刚起步的快递行业“忙中出错”,错发、少发、多发等问题层出不穷,从而加剧了逆向物流化现象。消费者 WH1 讲:“‘双十一’期间买了一件衣服,过去近一个月了衣服还没有到,昨天已经申请退款,今天衣服就到了。这让我怎么办?现在看见这件衣服心里都堵得慌。”

国内第三方快递业不成熟的管理制度、一线快递人员的高流动性与相对较低的素质等问题,或多或少会使消费者在网络购物中获得的满足感下降,从而让消费者网购产生不信任感。

3. 政策文本与政策执行之间的信任危机

网购市场的健康发展,既需要法律法规和长效监管,也离不开行业自律。

2010 年至今,针对电子商务领域存在的问题,我国先后出台、完善了《第三方电子商务交

易平台服务规范》(201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4)、《网络交易管理办法》(2014)等法规,分别从消费者、电商和第三方物流三个方面制定了相应法规。这些法规,首先,鼓励平台经营者设立“冷静期”制度,允许消费者在“冷静期”内无理由取消订单,但生鲜产品、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除外。除特殊商品外,网购商品在到货之日起七日内无理由退换货,将电商的自律行为上升至法律层面。其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如有欺诈行为,应赔偿消费者3倍的消费损失。最后,对第三方平台准入机制与权利义务作了规定。这些法规对网络购物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由于法律文本规定过于模糊,对于“不宜退换商品”的界定缺乏细则,且对适宜退换的商品也很难穷尽,使消费者在“冷静期”和“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期间权益仍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消费者 WDT17 说:“今年‘双十一’期间在网上给女朋友买了些化妆品,拆开明显知道是假的,可是商家硬说化妆品是真的,还以化妆品是预售品、为‘不宜退货商品’,销售后概不退货为由,就是不退货。”

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作了一系列规定,但从网店零售角度来看,个人的违法成本依然很低,即使有消费者得到了赔偿,也仅仅是个案。此外,《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对零售商和网络交易平台的规定也较宽泛。网络销售商 CZZ20 就讲:“不像实体店需要各种手续那么麻烦,现在开个网店非常容易啊,只要你想开就可以申请,审核什么的太简单了。而且现在管得不是太严,对资格审查不严,只要不出大问题,淘宝之类的平台也不会管,虽然有一些政策约束网络零售商,但是执行力度不是很严。”

由于网购平台没有建立标准的准入机制,门槛较低,网络零售商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

也参差不齐。较宽松的限制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大众创业,但不利于广大消费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权利与义务角度来看,《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第28条规定:“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消费纠纷和解和消费维权自律制度。”该条法规只是笼统地规定网购平台应当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而对于平台未履行协助义务的处置办法,该条文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12]这种不健全的规则必将导致消费者遇到问题时投诉无门。

另外,相关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存在较多问题,实际执行困难与处罚和赔偿不到位等现象也降低了网购消费者对网购的信任度。

三、网络消费社会信任的构建路径

退货是逆转最初决定的方式,消费者通过将不满意的商品退给网店零售商来消除购买失误带来的损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网购消费者因买到不满意产品而产生的后悔情绪。^[6]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全面构建网络消费社会信任。

第一,构建买卖双方认同机制。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曾断言:“在世界系统范围内的消费总是对认同的消费。”^{[13]104}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在各式网店并存的情况下,网络消费者选择哪家网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对其认同决定的,而这种认同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信任感的产生。如果零售商将真诚与信任贯穿于售前、售中和售后三个阶段的服务工作中,就可以获得网络消费者的认同。信任危机产生的根源不仅有交易双方的利益冲突,还有情感间的冲突。因此,零售商通过严格自律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水平,不仅可以缓解网络消费中的信任危机,也可以为其带来“二次盈利”的机会。当然,买家也要严格自律,不应滥用法规和运费险等条款肆意退货。通过构建买卖双方认同机

制,不断提升双方的认同感,会逐渐消除双方的信任危机。

第二,物流去“污名”化。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水平越高,人们消费选择的范围也就越大。^{[13]65}近几年来,我国消费者消费选择的范围和自由度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兴起而迅猛扩大,这一方面反应了我国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要求与其配套的社会组织和规则不断完善,否则就会出现“污名”。当前,与我国网购市场相配套的物流业大多集中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偏远贫穷地区物流业发展较落后,物流配送用时较长,物流费用较高,退货也不方便,这大大降低了偏远地区人们对网购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因此,物流发展不应仅仅是数量上的突飞猛进,而应该是管理、技术和配送速度等全方位的均衡发展。与此同时,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许多消费者由于收入达到“生存过剩”而引起理性消费退化,出现消费“幼儿化”倾向,这也加重了物流业的节日负担,影响物流业的口碑。因此,适当的消费约束和高效有保障的服务质量,是消除物流“污名”、构建网络消费信任的重要路径。

第三,强化第三方平台对零售商失范行为的监督。如果将第三方平台如淘宝、京东等看成一个由消费者选择的“产品”的话,那么它就有其生命周期。产品的主观生命周期大体会经历三个阶段:“惊奇”状态、“入静”状态和“中毒”状态。^{[13]84}作为“产品”的第三方平台若想较好地保持消费者的“惊奇”状态、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就应通过合同等方式约束网店经营者的行为,要求和督促经营者建立信誉制度,以利消费者监督和投诉。此外,第三方平台还应与更多的保险公司合作,提高退货运费险的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以降低退货率。若退货现象一直居高不下,信任危机将会快速将消费者对第三方平台这一“产品”的主观生命周期引入

“入静”状态,从而进一步加剧网络消费的信任危机。

第四,政府应完善他律环境,给消费者以足够的寻求补偿的能力。要想提高网购中的社会信任,消除网络消费中的信任危机,仅靠第三方平台、物流和买卖双方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现有的法规弹性较大、不够细化,给很多争议留下了空间。因此,在构建网络消费社会信任的过程中,细化地方法规就显得非常必要。首先,政府应通过制定法规建立切实可行的网络市场监控体系,提升违法经营的预期成本,使其违法经营的代价超过其合法经营的收益,防止“恶币驱逐良币”现象出现。其次,政府应建立违法经营损失赔偿机制,为消费者维权大开方便之门,提升消费者寻求补偿的能力。总之,应从法规层面给予网络消费者信心,增强其对网络购物的信任感。

四、结语

目前,节日消费已成为一些人情感宣泄的一种方式^{[13]79}。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购物的兴盛使情感宣泄的社会空间急速扩大。可以说,淘宝、京东等第三方平台及其网店是最典型的商品空间符号。网店空间是一个诱惑天堂、一个布满了欲望符号的世界,电商、网络零售商和物流业三方通过一系列的流程实现商品从感官图片到实物的转换,这使电商和物流获得了一定的文化意义,也使电商和零售商所搭建的这个商品平台符号化。在这个商品平台上,消费者可以自由地浏览,不受任何限制,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而这些商品也会以“霸屏”的形式不自觉地诱惑我们“自由”地购买。特别是在“双十一”这个特殊的日子,人们强烈的情感宣泄欲加上各大电商打折、降价、酬谢等促销手段,极易使消费者迷失自己而出现非理性购物。然而,由于现阶段买卖双方成熟的认同

机制还未真正建立、第三方物流组织与买方双“污名化”、电商平台交易规则不完善,以及政府相关政策欠完善等原因,网络消费中信任危机事件频发。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曾指出,人的行动系统是受价值和规范系统支配的。网购这种非面对面的消费,越出了人们固有的价值和规范系统,使处于此过程中的个体、组织和群体都失去了行为准则,于是失范行为屡禁不止,信任危机频频出现。因此,要降低节后退货率,就要消除物流“污名化”,强化第三方平台对零售商失范行为的监督,构建网民、物流、零售商和第三方平台之间的信任机制,更重要的是要尽快建立适用于虚拟网络消费的深层规则,即社会价值和规范系统,并由它来支配人们的网络领域行为。

参考文献:

- [1] 中国改革报社,国家信息中心. 2015年“双十一”综合信用评价报告[N]. 中国改革报, 2015-12-24(009).
- [2] LEE MKO, TURBAN E. A trust model for consumer internet shopp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2001(1):75
- [3] CASES A. Perceived risk and risk - reduction strategies in internet shopping [J]. *Distribution and Consumer Research*, 2002(4):375.
- [4] VANCE A. , ELIE-DIT-COSAQUE C, STRAUB D W. Examining trus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tifacts: The effects of system quality and cultur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08(4):73.
- [5] GEFEN D, BENBASAT I, PAVLOU P. A research agenda for trust in online environment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08(4):275.
- [6] 庞川,陈忠民,罗瑞文. 消费者网络信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2004(6):143.
- [7] 蔡军. 网络团购中消费者信任影响因素及其实证研究[D]. 镇江:江苏科技大学,2013.
- [8] 管益杰,陶慧杰,王洲兰,等. 网络购物中的信任[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8):1205.
- [9] 李东进,吴波,李妍. 远程购物环境下退货对够后后悔影响研究[J]. *市场营销*, 2013(5):77.
- [10] 马芸菲. “双十一”信用评价报告:售假成头号“毒瘤” 跨境电商受关注[N]. *中国经济导报*, 2016-01-01(B01).
- [11] 吴存海. “冷静期”可无理由退货 网购有了“后悔药”[N]. *中国商报*, 2011-05-03(A02).
- [12] 李燕京. 本报联合中国消费网、3G门户网、新浪财经调查显示——近半消费者网络购物退货不成功[N]. *中国消费者报*, 2014-03-14(D05).
- [13] 乔纳森·弗里德曼. 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引用格式:徐京波,李雅琪.农村留守老人基督教皈信的动机、过程与影响——以豫北S村为例[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5):61-65.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10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5-0061-05

农村留守老人基督教皈信的动机、过程与影响

——以豫北S村为例

The motive, process and influence of the old people in the rural areas to believe in Christianity

—Taking S village in North of He'nan for example

徐京波, 李雅琪

XU Jing-bo, LI Ya-qi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冲击了农村家庭的完整性,留守家庭、隔代家庭、空巢家庭越来越多,由于社会支持体系缺失,许多农村留守老人走上了信仰基督教之路。对豫北S村留守老人皈信基督教情况的实证分析发现,疾病医治、情感慰藉、社会互助是农村留守老人皈信的主要动机。基督教皈信是一个不断渗透的过程,主要包括前期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广泛传播、中期以特定方式拉拢信徒、后期以定期聚会巩固基督教信仰三个阶段。农村留守老人皈信基督教对村民的行为方式和家庭关系既带来积极影响又带来负面作用。农村基督教信仰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渗透的过程,我们应对其进行动态剖析,从而真正发现基督教信仰背后的深层社会根源,以合理引导农村人口信仰的发展。

关键词:

农村留守老人;
基督教皈信;
社会支持体系;
基层政权建设

收稿日期:2017-06-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CSH027)

作者简介:徐京波(1983—),男,山东省平度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治理。

2014年8月5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纪念会暨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将在上海举行。据中外学界都比较认可的数据,目前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在2300万~4000万人之间,约占中国总人口数量的1.7~2.9%,其中80%在农村。^[1]农村的基督教群体呈现出“三多一低”特征,即妇女多、老人多、病人多,文化水平低。^[2]当前,农村留守老人信教人数正呈现逐渐增长之势,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村留守老人信教的动机是什么?入教过程又经历了哪些阶段?皈信基督教对农村留守老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当前,围绕相关问题学界已经开展了诸多探讨。但是现有研究多将农村基督教信仰作为一个静态的整体事件:多关注基督教徒的自身原因,而忽视了个体之外的社会环境;多关注农村基督教的传播机制,而忽视了农村基督教信仰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拟以豫北S村为例,从农村基督教信仰的动态过程出发,基于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探讨农村留守老人皈信基督教的动机、过程与基督教对其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

一、S村基督教的发展情况

基督教于1883年传入河南,大约在1983年开始在S村传播,但是传播范围较小,发展信徒仅40人左右,且90%是老年人。起初没有正式的教堂,也没有在政府机构注册登记,定期会有一两个传教士向信徒讲解圣经,因为聚会的人数少,并没有引起政府部门的过多关注。

2010年S村基督教徒聚会地点改至当地人民政府西侧,并在2011年完成登记注册——基督教堂公司。教堂唱诗班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基督教徒数量也不断增加,每次做礼拜都有将近200人,教堂的资金也靠信众的捐献逐渐

充裕起来,并于2011年建造了新教堂。

同时,S村基督教的组织规章也逐渐建立并实施起来。自教堂登记注册之日起,S村基督教传教人员就开始成立各种小组,有唱诗组、传道组等对基督教内部进行管理。宗教管理人员会每月去城里的宗教管理处开会,熟悉政策,以理清当月讲道的内容和方向,布置当月的任务,带领讲道人员接受培训。有些信徒觉得外来的传教徒更会讲道,有条件的教徒会选择去城市听道。村里个别对基督教感兴趣的学生甚至会选择相关专业,极个别的学生甚至有出国学习相关专业、学成之后再回村讲道的意愿。

可见,从1983年开始,S村基督教的发展呈现出了信教人数不断增多、活动空间不断扩展、组织越来越严密、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趋势。

二、农村留守老人皈信基督教的动机

农村留守老人皈信基督教的动机比较复杂,总的来看,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疾病医治

大多数农村留守老人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生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认为信教对自己对家庭会有好处,信了基督可以上天堂,虔诚地祷告可以使家人平安,免除疾病的痛苦,实现自己的愿望。S村的很多信徒是因为自身或家人有疾病才皈信基督教的,调查中,有的信徒就举出自身的例子来说明:“几年前自己的大儿子生病,怎么看都看不到好。邻居(基督教信徒)就过来跟我说耶稣的好处,能让我儿子免受痛苦。于是就跟着邻居做礼拜,祈祷儿子赶快好。没过多久儿子的病竟然痊愈了。从这以后就彻底服了,每周都去教堂做礼拜。”(访谈资料20160324-L₁)一些信教的留守老人坚信自身或家人是被耶稣拯救的人,因此要从自身做起,歌颂耶稣并归于

他门下。这种功利性信仰动机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关,比如,在遇到大事时常常会祭拜民间诸神或寻求巫医帮助。^[3]

2. 情感慰藉

由于子女经常外出打工,农村留守老人的日常生活得不到很好的照顾,家庭情感缺失严重,特别是单身留守老人极易被忽略。通过调查发现,S村留守老人感觉人际关系冷漠,与邻里没有共同语言,习惯待在家里,生活单调,需要独自面对生活中的孤独无助;而教堂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诉说心声的地方。农村留守老人正是出于情感慰藉需求和对安全感的需求,才皈信基督教。在皈信基督教期间,他们可以跟信徒们一起聊天,可以认识很多朋友,可以在情感上得到一些慰藉,在物质上得到一定的帮助。比如,访谈中有的老人就说:“自己信教时间不长,当初是觉得自己在家没人说话,信教之后能和更多的人在一起交流。”(访谈资料 20160325 - Y₂)

3. 社会互助

中国传统乡村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农民世代生活在一小片土地上,宗族邻里观念很强,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传统乡村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即一家有事半个村庄的人都会去帮忙。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许多农民外出打工,甚至举家迁移,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力离开家乡。这改变了乡村社会结构,使宗族观念淡薄、邻里关系疏远,农村留守老人的原有社会支持网络被切断。而基督教教会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种空缺,越来越多的农村留守老人选择了加入基督教教会。比如,在访谈中,有的老人就说:“我儿子媳妇都出去打工了,去年把孙子也接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我年纪也大了,地里还种着庄稼,农忙时一个人忙不过来,也没啥钱雇人帮忙,我家旁边就是教会,以前我没信教的时候,有时候礼拜天也

去教会看看他们做礼拜,后来他们就劝我也信教,忙时还有人能帮点忙,我就信了教。”(访谈资料 20160326 - X₃)

三、农村留守老人皈信基督教的过程

农村留守老人皈信基督教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皈信前期:基督教在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广泛传播

(1) 在家庭成员间的传播

家庭是农村社会最基本的单位,长辈的宗教观是年轻一代宗教信仰形成的最重要诱因之一。^[4]据当地人讲,基督教最初在当地的传播没有现在这么快,信徒大多也是贫困人家,之所以信教无非也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寻找个精神寄托,能坚持活下去,但后来家庭传播成了基督教日渐扩展的重要途径。

家庭信仰的传承既受父辈的影响也受祖辈的影响,其中又以祖辈对孙辈的影响为最大。这是因为,基督教传播的形式、内容吸引了农村留守老人,她们在参加聚会的时候总是会顺便把家里需要照看的孩子也带上,孩子耳濡目染就成为潜在的教徒。

(2) 在亲戚、邻里、朋友间的传播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指出,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的远近来划分亲疏。^[5]这种以血缘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也为基督教传播所利用。在农村,户与户之间推门而进,比城市邻里显得更为亲切,基督教传播速度也更快。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不少人都是在亲戚或邻里之间串门的时候传教的。

传统社会以亲情为重,“远亲不如近邻”的思想仍被农村人所看重,邻里亲朋对一个人的影响仅次于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正是看到这

一点,传道者一般都是从熟人入手,基于血缘、地缘等联系为基督教招揽信徒。

2. 皈信中期:以特定方式拉拢信徒

(1) 宗教仪式

宗教仪式是教会对信徒要求的基本信仰表达方式,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宗教仪式让信徒更加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宗教仪式通过向信徒灌输宗教知识,不断改变信徒对自身行为的认知和价值判断,使之更加符合基督教的发展预期。

基督教的教义告知信徒,人一生下来就自带原罪,只有向上帝忏悔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才能真正皈信基督教,以获得救赎。为了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人教仪式,笔者采取自愿入教的方式进行了亲身体验。教堂的人员很快帮笔者找到一名信仰耶稣多年的老信徒带笔者去内间做忏悔。

祷告仪式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结束时老信徒告知笔者这是一种神圣的仪式,让信徒感受到主的存在。经过这样的忏悔,信徒才能正式加入基督教。这种仪式之后,信徒的自觉性会大大提高,他们会有一种传承的责任,也会对外界高调地说自己已经受过洗礼。其实,这是人借由这种仪式感来给自己一种强烈的暗示:必须要认真地去对待这件事情。

(2) 宗教音乐

音乐是一种富有情感、体现人类最初精神活动的产物,也是反映人类现实生活的一门艺术。宗教音乐多是用朗朗上口的旋律直达人的内心,传达宗教特色,反映宗教理念。基督教的圣歌也是该教传播的另一种方式。

宗教音乐可以唤起人们对宗教的好感,潜移默化地吸引信教群众,紧抓留守老人的内心,用最直白的话语配上悦耳的旋律一遍遍给他们洗脑,用歌曲的形式表达出他们内心的渴望,让信徒深信宗教和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是最关心他们切身生活的组织形式,让他们对于今后

的日子充满期待。

3. 皈信后期:以定期聚会巩固基督教信仰

在正式确定皈信基督教后,教堂中的传教士会通过聚会定期向教徒讲述圣经里的故事,传达行为准则,要求信徒自律,做一个大家喜欢的人,尤其要让周围的人看到自己的改变,展现相信耶稣的好,是耶稣引导他们走上了救赎之路。

在周末的教堂聚会中,信徒们会聚集在教堂以唱诗、讲道、祷告为主要形式进行宗教活动。信徒也很喜欢通过这种简单的、容易理解的讲道方式去接受一些新事物,学习圣经里的内容。平时,农村基督信徒会选择在晚饭后去其他信徒家中一起祷告唱诗,相互交流,切磋自己对于教义的理解,为自己或同伴祈祷。

基督教也有自己的节日,如圣诞节、春节等。节日活动一般是组织信徒表演节目,分发水果并做午饭,以联络感情,增加信徒间的凝聚力。

四、基督教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影响

基督教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影响,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两点。

1. 对行为方式的影响

当地信仰基督教的老人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经济收入不高,且多面临疾病、孤独等困扰,这些相似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不幸遭遇,使得信教者在精神上能够趋同,表现出强烈的相互认同感。要恪守基督教的规则教条,信徒的行为方式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在访谈中,许多农村留守老人表示自己在信教之后,各方面的变化都比较大,既有人际交往方式、交往观念上的变化,也有自己生活方面、心情方面的变化。信徒普遍认为自己信教后归属感、幸福感有所增强,生活得更加充实。甚至之前有不孝敬父母的人也会听从教义的要求而更加尊重

老人。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基督教在对村民行为进行约束的同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近年来,发生在各地的一些非法行为就与基督教徒有某种关联,他们有的会含沙射影地将不信教的人称作魔鬼,有的甚至在夜间偷放非信教村民的农用蓄水。

2. 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基督教对信徒家庭成员有很大影响,其约束功能对信徒的行为有一定的校正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尤其是对孩子。对于孩子来说,模仿是其社会化的重要路径,其学习能力、行为能力也与此有极大关联。当家长表示出对基督教的狂热时,家长就成为示范者,孩子会模仿其行为,经过多次强化,孩子可能也会相信基督教,并认为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祷告去化解。对于家庭成员的不同信仰,虔诚的基督徒会隔三差五跟对方闹事,要求对方皈依基督教。日常生活也是矛盾重重,如贴对联时常常和家庭成员闹不和,有的甚至会私自将家中的钱物捐赠出去。不仅如此,基督徒每天清晨和晚间都要祷告,这会打乱伴侣的生活规律,极易引发家庭内部矛盾。另外,每周都去教堂做礼拜也会耽误家庭的日常事务,诱发家庭矛盾。

五、结语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农村留守老

人皈依基督教的动机与农村社会支持体系的瓦解存在密切关系。特别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家庭结构受到冲击,出现了农村家庭离散化现象,由此导致农村留守老人在医疗、情感、互助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当然,农村基督教信仰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渗透的过程,每一过程都迎合了农村留守老人的现实生活需求,我们应对其进行动态剖析,从而真正发现基督教信仰背后的深层社会根源,以合理引导农村人口信仰的发展。另外,政府、社会和村级组织也应关注农村留守老人的社会支持问题,构建农村留守老人关爱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 [1] 姜泓冰. 盘点: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在2300万至4000万之间[N]. 人民日报,2014-08-06(11).
- [2] 刘双. 近十年来国内农村基督教研究综述[J]. 赤子(上中旬),2015(14):95.
- [3] 陈立伟.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信仰问题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2009.
- [4]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江苏研究基地. 新社会阶层宗教信仰的当代价值[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4):49.
- [5]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5.



引用格式:江南,刘远山.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著作权若干问题探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5):66-70,102.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1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5-0066-06

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著作权 若干问题探析

Exploring the copyright of film and TV works adapted from network popular novels

江南, 刘远山

JIANG Nan, LIU Yuan-shan

海南大学 法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近年来,由网络畅销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数量急速增长,掀起了阵阵收视热潮,如由《半月传》《何以笙箫默》《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即是如此。然而,网络畅销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电影及相关续集,其影视作品著作权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争议,如由改编权导致的权限冲突、由合同引起的权利纠纷、由许可期限引发的版权争议等。由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其著作权问题的解决路径在于:完善编剧署名权归属问题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合同中版权许可的使用期限与权利行使的范围;引入授权期合同,减少合约双方的不确定性风险;加大著作权法律法规宣传,提升相关法律责任主体对著作权保护的律意识。

关键词:
著作权;
网络畅销小说;
改编影视作品;
权限冲突

收稿日期:2017-08-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FX103)

作者简介:江南(1994—),女,江西省赣州市人,海南大学教师,海南大学南海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和知识产权法;刘远山(1963—),男,湖北省天门市人,海南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影视作品著作权法和民商法。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为一大批网络作家提供了创作平台。近年来,传统文学作品和现当代小说翻拍为影视剧已经让人们产生了审美疲劳,影视作品改编创新匮乏,影视创作进入疲软期。网络小说尤其是高人气网络小说题材丰富,在开拍前就已经拥有大量粉丝和很高的关注度,这为将其改编为影视作品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改编后影视作品的票房大增,更加刺激了影视制作者热衷网络畅销小说的改编。然而影视作品不同于一般的音乐作品或文字作品,它往往涉及多方创作主体,致使著作权纠纷屡屡出现,如《何以笙箫默》《芈月传》等改编后的版权问题。在网络畅销小说改编影视作品逐渐增多、相关著作权纠纷屡屡出现的大背景下,本文拟通过对当前多方争议的一些个案尝试性分析,以期为该类问题的解决寻找可资参考的路径建议。

一、网络畅销小说改编影视作品的含义与性质

2002年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11项将影视作品界定为“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而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是指以网络畅销小说为基础作品摄制而成的影视作品,它需要很多人的参与,如编剧、制片人、导演、演员、词曲创作人员、动画设计人员等。可见,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既是演绎作品又是合作作品。

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具有演绎作品的相关属性。所谓演绎作品,是指在不改变原有作品的基础表达的情况下,对其形式或用途进行独创性的改变而形成的作品。^[1]通常是由改编、翻译、整理原作品等方式重新创作而成,体现自身思想与主观意图的作品。影视改

编作品是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电影摄制方法创作的一种作品。^[2]大多数影视作品往往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成剧本进而摄制的,而由网络畅销小说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是以该网络畅销小说为基础,经改编成为剧本再进行拍摄制作所形成的演绎作品。因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具有演绎作品的属性,该影视作品的创作人对于尚在保护期内的网络畅销小说进行改编再创作,应当得到小说作者的事先同意,并支付相应报酬,不得恶意篡改基础作品,同时小说作者仍然享有署名权。

另外,由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也具有合作作品的相关属性。所谓合作作品,即两个以上的人根据合作协议创作的作品,其构成要件包括:(1)主体要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2)主观要件:合作作者之间具有共同创作的合意;(3)客观要件:共同创作行为;(4)客体要件:合意和共同创作行为指向同一个作品。^[3]由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的创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由不同类型的创作人员共同创作完成,包括编剧制作剧本,导演分析制作分镜头剧本,演员表演,以及拍摄、剪辑、后期制作等一系列创作过程,其每一步都至关重要,都反映了参与创作人员共同创作的合意。同时其合意和共同创作行为也必然指向同一作品,即改编的影视作品。因此,由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在具体摄制过程中也要符合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合作作品的相关规定。

二、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著作权问题的个案刍议

1. 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署名权问题分析——以作家蒋胜男小说《芈月传》改编影视剧署名权纠纷为例

《芈月传》开播以来,屡屡创下收视新高,但《芈月传》编剧署名权纠纷也备受关注。原

小说作者、影视剧《芈月传》编剧之一蒋胜男,诉称其署名权被侵害,理由是电视剧《芈月传》是在其原创小说《芈月传》的基础上改编的,改编过程基本是其一人独立完成的,期间王小平只是作为导演方提出过若干建议,而电视剧《芈月传》部分海报并没有署名蒋胜男编剧身份,甚至直接将王小平署名为总编剧。但是出品方对此提出异议,称蒋胜男虽与其签订合同约定,但如果蒋胜男提交的剧本达不到要求,出品方可以委托其他人修改剧本。后因为蒋胜男提交的剧本未达到相关要求,出品方才另聘王小平担任电视剧《芈月传》总编剧,最终剧本在原蒋胜男提供的剧本上作了重大修改,电视剧《芈月传》没有侵害蒋胜男的署名权。在此纠纷中,争论焦点在于署名权的归属问题。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署名权是以作品为载体的,没有作品,就没有著作权法上的署名权侵害。编剧作为影视作品剧本的作者依法享有在影视作品上的署名权,即编剧在影视作品上署名是其法定权利,有权排除他人行使其署名权的权利。通常情况下,直接创作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智力成果的劳动者应当享有署名权。但如若仅仅是提供辅助性工作,如提供意见、赞助物资等,这并不属于创作,不能享有署名权。在合作剧本时,往往涉及署名顺序的问题,在共同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只要对剧本形成付出了直接的智力劳动,参与了创作,就具有署名权。在此案中,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海报上是否要为编剧署名,双方合同也未约定,出品方已在电视剧《芈月传》片头载明蒋胜男为原创编辑,因此电视剧《芈月传》部分海报未署名蒋胜男编剧身份并不构成侵权。至于署名的先后顺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有约定的按约定确定署名顺序;没约定的,可以根据作品创作时付出的

劳动多少、作者姓氏笔划等确定署名顺序。在该纠纷中,关键点在于王小平是否为《芈月传》剧本创作付出了直接的智力劳动,并且其是否付出了比原著小说作者蒋胜男更多甚至是主要的劳动。而相关证据也证明王小平确实具有署名权,成为总编剧也不为过,蒋胜男的署名权并未受到侵害。

2. 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改编权问题分析——以作家顾漫小说《何以笙箫默》改编影视剧版权纠纷为例

2014年12月,乐视影业宣布由网络畅销小说《何以笙箫默》改编的电影版《何以笙箫默》于2015年上映。但原著作者顾漫随后发出声明,称其与乐视影业签订的电影版权合同期限为3年,在2014年9月10日已到期,到期后她改为与光线影业签订该小说的电影版权合同。乐视影业表示,该电影剧本是在合同期限内完成的改编,依法享有剧本著作权。同时该电影剧本也在2014年8月20日取得了《摄制电影许可证》,合法享有电影拍摄权。但光线传媒并未有放弃电影版权之意,光线影业表示,与顾漫签订的是电影改编权和制作权,由顾漫亲自担任编剧,期限为3年,而且正在全力筹备剧本中。可以看出,乐视影业凭借《摄制电影许可证》拍摄了电影,光线传媒因拥有原小说电影版权而无意让步,因此造成僵局。在此纠纷中,关键在于原小说《何以笙箫默》与改编后之电影《何以笙箫默》剧本的著作权权属关系的确定。

改编权所控制的是许可他人实施的、在保留原作品基本表达的基础上改变原作品创作出新作品的行为。^[4] 影视剧本可以由剧本创作或剧本改编而产生。剧本创作是一个从零开始的艰辛的原创性劳动过程,作者要付出很多精力进行构思、收集素材。而剧本改编是以原有作品为基础,重新进行改编创作成影视剧本,这也

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过程。改编后的剧本与原著在表现手段和叙事方法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改编后的剧本具有独立的著作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2条规定,改编已有作品创作的新作品,其著作权归改编人所有。在此纠纷中,乐视影业在双方签订的电影版权合同期内完成了剧本的改编,应合法享有剧本完整著作权。至于其授权期限是否在约束改编权的同时也约束了摄制权,要看顾漫与乐视影业签订的《授权协议书》是如何规定的。由于现今国内制作影视剧尚存在多方面限制,而从购买版权到影视项目开始运作再到拍摄完成则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在合同有效期内未必能完成整个制作。因此,版权人在与影视公司签约时应考虑到这些情况。如果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于授权期内影视公司仍享有继续根据完成的剧本摄制完成影视作品及相关权利,不受本协议期限限制条款约束的情况下,则其授权期限内不能约束摄制权。

3. 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发行权问题分析——以作家辛夷坞小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改编影视剧入市纠纷为例

由作家辛夷坞小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改编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票房大卖,图书《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随之热销,编剧李樯也出版了其同名剧本作品《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原小说作者辛夷坞表示,在签合同同时,其只是对原著小说的电影改编权进行了授权,并没有约定改编剧本能否出版,改编剧本的再出版侵犯了其著作权。李樯作品出版方磨铁图书公司表示,李樯《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一书的出版是得到了《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电影的制片方公司的授权,在出书过程中也曾与辛夷坞多次协商出版改编剧本的细节问题,李樯出版改编剧本授权清晰,不存在侵权嫌疑。在此纠纷中,主要的关键点在

于改编作品著作权人与改编作品出版主体的权利义务问题。

未经原著作权人许可,演绎人将其演绎作品发表并公开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则必然对原作品著作权人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2条规定,编剧李樯改编了已有作品,产生了新的独创性作品,具有该改编后剧本的著作权主体资格,但是其在行使权利时不能侵犯原作品辛夷坞小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著作权,应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35条规定,该剧本出版商虽然有出版改编作品的主体资格,但其出版应当得到改编作品著作权人和原作品著作权人的双重许可,并要支付一定的报酬。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7条规定,“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在此纠纷中,如果真如辛夷坞方面所言,在签合同同时,只是对原著小说的电影改编权进行了授权,并没有约定改编剧本能否出版,同时剧本出版方没有证据证明其具有原著小说作者辛夷坞授予出版剧本的权利,那么剧本出版方则存在侵权行为。

三、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著作权争议问题的解决路径

1. 完善编剧署名权归属问题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网络小说作者在连载小说时一般用笔名,真实姓名较为模糊,同时我国版权登记与交易公示不具有强制性,版权归属相关法律法规较为笼统,不够明确具体,在具体实施上仍存在很多问题。完善著作权法相关规定,除已有署名权的规定外,法律还应当明确编剧署名位置、署名顺序、署名数量等具体规定,同时应准确判定剧本写作付出劳动百分比

数的量化标准。鉴于现行法律对编剧署名权规定尚不明确,编剧可以在与影视公司签订合同时预先约定,同时明确提出对著作权内容转让或许可的具体事项,如署名权是否明确等,在签订合同时提前规避署名权归属不明确事宜,在发生纠纷时依合同主张救济。

2. 明确合同中版权许可的使用期限与权利行使的范围

由于目前影视作品制作周期长,在制作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各方面的问题,很多影视作品并不能在版权许可期限内完成,常有续约或项目搁浅等情况。对此,影视公司与网络小说作者签订版权授权合同时,应对版权续约条款进行细化,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议。例如,双方可以约定影视公司在版权许可到期后一个月内取得摄制影视作品许可证的,影视公司享有优先续约许可权,并明确续约优先期内的支付标准等细节问题;或者约定影视公司在版权许可期限届满前一个月与原著小说作者对版权续约问题进行谈判,若谈判未达成,影视公司不得在此期间进行影视作品摄制工作。这样,既能使对方在作品版权期限届满前做好有效规划,又可避免项目延期或版权到期被转卖的风险。在签订合同时,应明确许可或转让著作权的范围,细化著作权具体内容,如在授权期限内,影视公司根据小说改编的剧本因故未能完成拍摄时,影视公司仍可根据完成的改编剧本拍摄制作完成该影视作品及衍生权利等类似条款。

3. 引入授权期合同,减少合约双方的不确定性风险

授权期合同标的是指在合同期限内享有优先签订版权授权协议权而不是直接购买电影摄制权。授权期合同能使公司享有以二至四成的版权费与作者签订许可优先权,进行前期筹备,若项目顺利则签订正式合同,支付全额费用。^[6]这样,即使项目筹备失败,影视公司也不会损失

过高,能有效避免过大的资金压力和较大的项目风险。对于小说作者而言,授权期合同指向的是作品版权的优先获得权,并不影响版权的实际归属,小说作者财产权的自由得以保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影视公司违背网络小说作者意愿进行剧本创作。

4. 加大著作权法律法规宣传,提升相关法律责任主体对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意识

编剧应提高法律意识,掌握基本的著作权法律法规,与专业的法律团队建立联系,在签订合同前,仔细核对合同条款,由专业人员对合同进行审核,以严谨的态度对合同进行事前风险防范,以坚决的态度进行事后维权。影视公司应尊重编剧,增强平等合作意识,在剧本创作环节严格把关,将法律风险降到最低。建议成立影视编剧协会,来帮助编剧共同维权。其必要性在于,大多数编剧都是经济实力薄弱的个人,没有与大公司“叫板”的资格,成立编剧协会可以增加这个群体的力量。^[7]在合同签订前,协会可与影视公司、编剧等进行深入沟通,为合作双方提供较为完善的合同,指出潜在的风险并给予分析。在合同执行过程出现纠纷时,协会应适当介入调解。相关行政部门应严格影视作品立项审批制度,在审查样片时应严格落实相关文件,切实保护编剧著作权。应建立仲裁、调解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以减轻版权纠纷侵权的司法成本,节约时间,快速解决著作权争议。应培养从事小说改编影视作品著作权争议调解的专业人才,使其能掌握并灵活运用专业法律知识,尤其是著作权法、知识产权法,熟悉网络文学的特征,切实维护双方合法权益。

四、结语

由网络畅销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既是一种演绎作品,又是一种合作作品,其与传统的文

(下转第102页)



引用格式:王继风.论我国档案法规体系的完善[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5):71-75.

中图分类号:DF31;G27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5-0071-05

论我国档案法规体系的完善

On improvement of the archives laws system in China

王继风

WANG Ji-feng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文传系,河南 巩义 451200

摘要:我国现行的档案法规体系是以《档案法》为主体,以宪法、档案法律、档案行政法规、档案部门规章与档案地方性法规为形式的档案规范性文件所构成的法规体系。当前我国档案法规体系存在着档案法规制定效率不够高、系统性不强、立法技术不够先进等缺陷。完善我国现有的档案法规体系,应明确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档案法规立法指导思想,加快档案立法进度,避免出现立法盲点,同时加大对现行档案法规立、改、废的力度,使我国档案法规体系成为一个等级分明、逻辑严谨、层次清楚、协调统一的整体。

关键词:

档案法规体系;
电子数据档案;
档案立法技术

收稿日期:2016-06-13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BJY030)

作者简介:王继风(1963—),男,河南省光山县人,郑州成功财经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法、民事诉讼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档案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国的《档案法》是1987年制定并颁布的,虽然1996年进行了修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至今已20余载,体系不尽科学、法规不太配套、技术不够先进等缺陷越来越明显,建立完善的中国档案法规体系已是大势所趋。鉴于此,本文拟在检视我国现有档案法规体系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档案法规体系存在的缺陷,并就完善我国档案法规体系提出相关建议,希望通过广大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达到依法保护档案财富、依法保障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以及依法惩戒破坏档案和干扰档案效率行为的目的,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我国现行档案法规体系的主要内容

我国现行的档案法规体系是由以《档案法》为主体,以宪法、档案法律、档案行政法规、档案部门规章与档案地方性法规为形式的档案规范性文件所构成的法规体系。

1. 宪法

1982年全国人大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没有直接的档案方面的法律条款,但其作为母法,对档案法规的立法具有指导作用,所有的档案立法必须在《宪法》的原则下进行,且不得有违背《宪法》的相应规定。

2. 档案法律

我国现行的形式档案法律只有一部,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于1987年制定并于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作为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适用的法律,其在档案管理领域的地位和效力仅次于《宪法》。除此之外,在其他法律中还存在着诸多与此相配套的涉及到档

案的法律条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29条规定,“抢夺、窃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违反档案法的规定,擅自出卖、转让国家所有的档案,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有前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等。

3. 档案行政法规

档案行政法规是指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据宪法和法律有关精神,根据档案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制定或由其批准公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各种档案规范性文件,其形式是条例、规定、办法,如1999年5月5日国务院及时批准修改的《档案法实施办法》《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和布局方案》等。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低于《宪法》与法律。

4. 档案行政规章

档案行政规章既包括由国家档案局依据档案法律、档案行政法规制定的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包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副省级计划单列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档案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的档案效率规范性文件。这些档案行政规章在一定程度上为执行、解释、说明档案法律、档案行政法规,以及党和政府关于档案效率的方针政策等,提供了便于操作的行为规范,如《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我国档案试行办法》《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电子公文归档治理暂行办法》《档案行政许可程序规定》《电影艺术档案治理规定》《艺术档案治理办法》等。

5. 档案地方性法规

档案地方性法规是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

法律和本地区的客观情况,制定发布并在本地区适用的有关档案工作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如《河南省档案治理条例》《内蒙古档案治理条例》《北京市档案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档案与文件收集利用条例》等。^[1]据统计,目前我国有近60个档案地方性法规。^[2]

二、我国现行档案法规体系存在的缺陷

自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颁布以来,我国的档案法规体系虽初具规模但不够完善,既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也不能满足档案事业飞速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不能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3]我国现行档案法规体系存在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档案法规的制定效率不够高

我国档案法规的制定效率较低,不少档案法规有空白点,无法可依的现象时有发生。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

其一,不能应对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档案工作出现的新问题,如国有企业重组中出现企业产权的拍卖、变卖、租赁、承包、兼并、分立、合作、改制、破产等行为时,档案如何归档处理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颁布与此相适应的档案法规规章,仅仅靠现有的《档案法》不足以应对这类复杂的情况,档案应有的作用难以发挥,档案文化财富的保护也面临诸多挑战。

其二,贴近现实、适用具体情况的档案法规数量较少。例如,对于新型电子数据档案,虽然现有法律有所涉及,但对如何解决在电子数据文件治理中导入档案控制、电子数据文件的原始性和档案证据价值的法律认可等问题,都缺乏明确的规范。自2004年以来,国家档案局虽

先后总结探究了“徽式模式”“顺德模式”“深圳模式”“浦东模式”和上海闵行区档案资源整合等地方档案工作先进经验^[4],但这些都是地方性的行政做法,尚未形成法规,更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

其三,对于档案的开发利用也缺乏明确规范。我国的档案法律、规章多制定于计划经济年代,受制于当时历史、社会环境,公民档案知情权的保障意识缺乏,人事档案缺乏应有的监督,如《干部档案效率条例》第31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这样的规定显然是与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相悖的。

2. 档案法规体系的系统性不够强

档案法规既然是一个系统,彼此之间就应该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但从现有情况来看,我国的档案法规体系还存在着系统性不强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档案法规内容之间冲突。这主要表现为制定颁布后的《档案法》与档案新旧法律规章之间及不同部门制定的新旧档案法规不统一、不协调。^[5]虽然国家档案局曾多次主动废止了与现行档案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行政法规,但是档案法规之间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是档案治理方法之间冲突。这主要表现为专门档案的治理方法与普通档案的治理方法存在冲突。专门档案的治理办法由专业主管机关提出后,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之共同研讨制定。然而,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制定专门档案的治理方法时没有统一的标准,致使专门档案的治理方法与普通档案的治理方法存在冲突、重复、体例不一等诸多问题。

三是新旧档案治理方法定位之间冲突。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日益普及的态势下,立法机

关、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军事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采用电子数据技术处理信息已成为常态,这给传统的档案治理注入了新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我国目前还缺少对这些新的档案治理方法的宏观计划,各地对这些新的档案治理方法的认识不一致,在实践上也大相径庭。

3. 档案法规体系的立法技术不够先进

档案法规体系的立法技术是对档案法规体系在立法活动过程中所应体现和遵循的有关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和补充的技能技巧规则的总称,其核心内容为立法结构技术和立法语言技术。档案立法结构技术是指档案类的法规按照一定的目的、规则、逻辑关系组成的严密整体及其构造关系间的表达形式,档案立法语言技术是指档案立法中的语言规范、逻辑、词汇和标点符号等。当前我国档案立法技术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档案法规的名称不够规范。我国现行的档案法规使用的名称有法规、条例、决定、通则、细则、规定、办法、通知等,甚至同类名称的表达也多种多样,如对规定的表达就有暂行规定、若干规定等。这种表达很难从文字上判断出档案规范性文件立法主体的效力等级。例如,有的档案规范性文件的名称相同,而立法主体或效力等级却不同;有的档案规范性文件的立法主体相同、效力等级相同,而名称却有很大不同。这既造成了档案法规的适用艰难,又影响了档案法规内在体系的协调统一和今后的科学发展。

二是档案法规的内容表达不够明确。这主要表现在应该规定却没有规定的部分,如立法的依据、宗旨、原则、范围、主体、效力、时间等,有的档案规范性文件虽然有所涉及,但缺乏统一的标准,相互之间的差异很大。

三是档案法规的系统性不够统一。目前,

我国制定档案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机关有多家,形式多样,生效、失效时间不尽统一,而且档案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内容、程序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冲突,不够协调统一。

三、我国现行档案法规体系的完善路径刍议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面对我国现行档案法规体系存在的缺陷,我们应该在坚持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并适度超前、“以开放为原则、以不开放为例外”、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同位法之间互相衔接等原则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现行档案法规体系。

1. 明确档案法规立法的指导思想,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我国现行的档案法规体系是以1987年制定的《档案法》为核心的。彼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比较大,在生产、分配、消费等领域,政府计划安排的痕迹依然明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推进,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在《档案法》的制定上,表现为档案的行政管理权力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对称,忽视档案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这种弊端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尊重权利、制约权力的要求不相适应,也与当下我国档案管理工作的实际相脱离。因此,《档案法》的修订必须面对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以“为民所用、为民服务”“以开放为原则、不开放为例外”作为档案立法的指导思想^[7],改变档案立法不够快捷、不够系统、不够科学的状况,实现《档案法》与《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法》《合同法》《物权法》《刑法》等专门法之间的合理衔接。

2. 加快档案立法进度,避免出现立法盲点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协调推进,以及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电子签名法、电子文档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等法律规范应在档案法规体系里得到充分体现。因此,未来档案法规体系应当将电子数据文件的概念、地位、性质、形式、开放期限,电子数据文件认证服务机构的职责、电子数据文件与纸质文件的对接等纳入规范。当前,个人信息、个人资料、个人电子数据的公开与保护的范 围、原则、权利、义务、赔偿与救济,以及档案的征购、收购、公布与利用等诸多问题仍处于法律的真空地 带,这极易造成公权力侵入、干涉公民个人信息的获取,也容易侵害公民的私人权利,损害档案机关的利益,阻碍档案事业的发展。这就需要制定个人数据信息保护法,以填补上述立法上的空白,促进档案法规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3. 动员社会相关力量,加大对现行档案法规体系的立、改、废力度

由于我国档案法规体系时间跨度大、立法主体多、规范文件多,也由于档案立法本身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再加上我国档案立法调整对象众多,内容广泛,关系复杂,既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及其相互间关系的档案,也有地区、部门及其相互间关系的档案,要使之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仅靠国家层面的立法是远远不够的。这既需要充分调动地方立法主体的积极性,也需要专家、学者、相关专业人员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依照《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等的相关规定,按照国家统一的规格、标准,对现有的档案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进行立、改、废的清理,使现有的档案法规体系成为一个等级分明、逻辑严谨、层次清楚、协调统一的

整体。

四、结语

没有人能够左右变化,唯有因势而动。档案法规体系既要因时而立,更要因时而变。档案法规体系属行政法规体系,既有着行政法规的共性,也有着自身的特性。1996年我国《档案法》修订时,电子数据文件还没有大规模产生。然而,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电子数据文件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已经构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而与纸质档案不同的档案体系,在有些场合更多地取代了纸质档案。所以,我国档案法规体系的完善,应考虑到档案的立法原则、立法制度和行政行为等具体的特性,也应考虑到我国当下互联网、大数据运用的客观存在,不断消除档案法规体系存在的缺陷,从而构建适度快捷、科学协调、严格完整和程序规范的档案法规体系。

参考文献:

- [1] 何玲. 试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J]. 四川档案, 1998(5): 66.
- [2] 李伯富. 论我国档案法规体系的完善[J]. 档案学研究, 2005(6): 38.
- [3] 吴玲. 实现档案事业管理的法制化[J]. 浙江档案, 1998(1): 42.
- [4] 路思. 我国档案资源整合困境与解决对策研究[D]. 合肥: 安徽大学, 2015.
- [5] 辛俊岱. 完善档案法规体系的思考[J]. 档案学研究, 1998(2): 37.
- [6] 李伯富. 论我国档案法规体系的完善[J]. 档案学研究, 2005(6): 39.
- [7] 郭昊. 《档案法》修订之我见[J]. 云南档案, 2010(1): 48.



引用格式:张福平. 报刊编校中常见的文稿逻辑错误例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5):76-90.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1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5-0076-015

报刊编校中常见的文稿逻辑错误例析

Case analysis of common logical errors in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张福平

ZHANG Fu-ping

郑州轻工业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思维是表达的前提和基础,而逻辑是思维的形式与规律。有正确的逻辑才有正确的思维,有正确的思维才有正确的表达。所谓逻辑错误,是指人的思考与表达不符合思维形式、思维规律,导致认识出现混乱、偏差甚至误入歧途等错误。报刊编校中常见的文稿逻辑错误主要有不合事理、概念偏差、判断形式错误、推理与论证错误等。这些逻辑错误,如果单从语法上看往往问题不明显,有时各语法成分也齐全,但各成分之间的关联是错误的。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在编校中需理性分析,仔细判断,并运用相应的逻辑知识加以修改。唯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编校质量不断提高。

关键词:

编辑;
校对;
思维;
逻辑错误

收稿日期:2017-06-05

作者简介:张福平(1967—),女,河南省商丘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与传播。

思维是表达的前提和基础,而逻辑是思维的形式与规律,是对客观事物抽象与概括的反映。有正确的逻辑才有正确的思维,有正确的思维才有正确的表达。逻辑思维,又称抽象思维,作为人类认识的特征,是指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和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思维方法,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理性认识过程。逻辑思维要符合思维形式,还要遵循思维规律,即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以及辩证逻辑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坚持实践的观点、唯物主义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1]所谓逻辑错误,是指人的思考与表达不符合思维形式、思维规律,导致认识出现混乱、偏差甚至误入歧途等错误。回顾1995年以来河南省报刊编校质量检测中发现的问题,其中常见的文稿逻辑错误主要有不合事理、概念偏差、判断形式错误、推理与论证错误等。现就这几类常见的逻辑错误予以例析。

一、不合事理

所谓不合事理,是指句子表达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与事理情理相悖,或过于绝对,因有违真实性原则而不能使人信服。

[错例]台湾在人们渴望回归家庭成为趋势后,今年更被定为“国际家庭年”,而这股“回家”风潮也对与生活有关的各行业产生显著影响。(1993年出版的某报文章)

[评说]其问题是与客观事实不符。1989年召开的第44届联合国大会确定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因此“今年(1993年)”不可能“被定为‘国际家庭年’”。可改为“台湾人渴望回归家庭已成趋势,加之1994年被定为‘国际家庭年’,这股‘回家’风潮对与生活有关的各行业都产生了显著影响”。

[错例]该经济体的产值超过了世界生产

总值。

[评说]这显然与事理相悖。世界是一个整体,某经济体是其中的一部分,部分不可能大于整体。世界生产总值由各国生产总值组成,必然包含该句述说对象“该经济体的产值”。该句的问题在于违背常识、不合事理。

类似的,“该企业狠抓技术革新,今年比去年产量翻了一番,成本却下降了一倍”。“下降一倍”则成本为零,不合事理。可改为“该企业狠抓技术革新,今年比去年产量翻了一番,单位成本却减半”。

[错例]职业学校……尤其是学生管理不同于普通高校,在学习和生活纪律方面,要培养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为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形成良好的职业纪律和职业素养打下基础。

[评说]这是因表述不严谨而造成与事理情理相悖的病句。职业学校与普通高校的学生管理都需要让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二者的不同仅在于在这方面花费工夫的多少。可改为“职业学校……尤其是学生管理不同于普通高校,在学习和生活纪律方面,要花更多工夫使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为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形成良好的职业纪律和职业素养打下基础”。

类似的,“费永健出狱了……谢琴来到狱中向他求爱”。既然“费永健出狱了”,就不在“狱中”了,“谢琴向他求爱”不可能、也不必“来到狱中”进行。可改为“费永健出狱了……谢琴来到狱所门口向他求爱”。

[错例]她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三八”红旗手。

[评说]这是过于绝对的不合事理。可以说“(自什么时候以来)她年年被评为先进,诸如优秀教师、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三八’红旗手等”。

二、概念偏差

思维是人们运用概念来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过程。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是抽象地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2]16-17},是理解、代表和表达事物的工具。概念明确是判断恰当、推理有逻辑性的先决条件,概念准确是作出恰当判断和正确推理的必要条件。^{[3]21-22}

概念定义是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给某一概念下定义,就是用简明的语句概括地揭示对象的本质属性。下定义要求被定义概念的外延与定义概念的外延必须相等,不能用被定义的概念来说明——如果定义概念直接包含被定义概念,那就犯了同语反复的逻辑错误;如果定义概念间接包含被定义概念,那就犯了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2]35-40}叙述中对相关概念的阐释,也要求阐释的概念不能直接或间接包含被阐释的概念。

概念划分、列举、举例、限制和概括,是进一步明确概念的一些逻辑方法。其规则是:概念划分必须按同一标准、按属种包含层次进行(不能越级),种概念不相容、并与属概念外延相等;列举必须按同一标准、按属种包含层次进行,种概念不相容;举例要求事例概念必须是属概念的种概念,并具体说明事例概念的内涵;限制必须依据概念间的属种关系由外延大的过渡到外延小的,以能准确说明对象的实际情况为限度,极限是单独概念;概括必须依据概念间的属种关系由种到属逐级进行,到外延最大的概念为止,极限是类概念。^{[3]49-58}

概念之间的关系有相容的同一关系、属种关系、交叉关系和不相容的矛盾关系、对立关系,以及可以相容、也可以不相容的并列关系。^{[2]24-31}概念之间的关系不能混淆,否则表达就会发生错误。

所谓概念偏差,是指对词语所表达概念的

内涵和外延或概念之间的关系有误解而造成的表达错误。报刊编校中常见的文稿概念偏差问题主要有概念定义出错、概念含混、概念并列不当等。

[**错例**] 检察建议是提出进行纠正违法的建议。

[**评说**] 这是概念内涵界定错误的病句。《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在第1条明文规定了检察建议的概念:“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检察建议是指检察机关对确有错误的裁判,向同级原审法院提出纠正建议,通过法院系统内部的监督程序纠正相关错误的一种监督方式。原句可改为“检察建议是提出纠正错误裁判的建议”。

[**错例**] 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

[**评说**] 这是同语反复的毛病。不能用“中国传统文化”阐释“中国传统文化”。

类似的,“笔者以平衡计分卡理论为依据,通过确定循环经济绩效评价体系,形成以均衡、客观为出发点的进行循环经济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体系”。说“通过确定循环经济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循环经济绩效评价体系”,显然犯了同语反复的毛病。可改为“笔者以平衡计分卡理论为依据,通过确定循环经济绩效评价体系,形成以均衡、客观为出发点的循环经济绩效评价方案”。

再如,“采取实行机动车限行、强化机动车污染监控、全面淘汰黄标车、加快报废车辆回收拆解等措施,强化机动车污染管控措施”,“采取……措施”是手段,其目的就不能再是“措

施”了,后半句的中心语必须用其上位词才符合逻辑,可改为“采取实行机动车限行、强化机动车污染监控、全面淘汰黄标车、加快报废车辆回收拆解等措施,强化机动车污染管控工作”。

[错例]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观念有所滋长。

[评说]这是概念含混导致的病句。概念是词语的思想内容。如果对概念的内涵、外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并不清晰、明确,在概念选取与指陈时就可能出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属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种概念,二者不能合并使用,更不能将属概念变成种概念的修饰语。根据语境,可改为“非社会主义价值观有所滋长”。

[错例]百年不遇的灌水灾害给辽宁城乡农民兄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评说]这是不当地将小概念大用的病句。水灾给城乡造成损失,农民兄弟只是城乡人民的一部分,概念选取不当。可改为“百年不遇的灌水灾害给辽宁城乡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错例]他发表省级以上论文 100 余篇。

[评说]这是概念模糊导致的表达错误。可改为“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100 余篇”。

类似的,“他获得市级科研进步一等奖”,概念错误。可改为“他获得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错例]……与语义学、文化社会学、哲学、语用学等边缘学科相结合。

[评说]这是概念模糊导致列举不当的病句。概念列举就是把属概念包含的部分种概念揭示出来,以说明属概念的部分外延。^{[3]52}边缘

学科是从基础学科延伸出来的一种学科类别,而“哲学”这种经典学科显然不属于边缘学科范畴,不能作为边缘学科的种概念来列举。

类似的,“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憩园》《寒夜》”。这是列举中属种概念混杂的病例。《春天里的秋天》《憩园》是中篇小说,《寒夜》是长篇小说,不能混为一谈。可改为“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憩园》,长篇小说《寒夜》”。

再如,“明朝经济规模在当时可称世界第一,无论是铸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纺织、陶瓷、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享有盛誉”。这是将属概念放入另一类种概念中列举造成的病句。根据我国国民经济部门划分,建筑业和工业同属第二产业,而重工业是工业的种概念——重工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装备、动力和原材料的基础工业,包括钢铁工业、冶金工业、机械、能源(电力、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学、建筑材料等工业;与重工业相对,轻工业是指以提供生活消费品为主的工业,如食品、纺织、皮革、造纸、日用化工、文教艺术体育用品工业等——所以不能将“建筑”作为“重工业”的种概念来列举。说“铸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是概念错误。

[错例]本研究着眼于经学、佛学、道家、玄学和儒家思想在陶渊明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评说]这是不同范畴的概念不当并列、交叉概念不当并列导致的病句。概念并列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并列项是同性质或同类别的,如名词性词语与名词性词语并列、动词性词语与动词性词语并列、形容词性词语与形容词性词语并列;同性质或同类别的词语所代表的概念范围大小要一致,即大概念与大概念并列、小概念与小概念并列;概念范围大小相同的词语分类角度要一致,并列概念之间不能是交叉关系。

如果把不同层次的概念,或把具有交叉或种属关系的概念并列使用,就犯了概念并列不当的错误。该句的问题是:其一,“佛学、玄学和儒家思想”跟“道家”不是同一范畴的概念;其二,“经学”原本是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中国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特指阐释儒家经典字面意义及其所蕴含义理的学问,通称“十三经”,它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所以“经学”跟“儒家思想”是两个交叉概念;此外,在表述上还有个顺序不当的问题,从缘起上讲应依次为儒学、道学、玄学、佛学(魏晋时期玄学如日中天,当时的佛学还是依附于玄学来弘扬自家教义的)。故该句可改为“本研究着眼于儒学、道学、玄学和佛学在陶渊明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类似的,“古希腊的、文艺复兴的、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日本的文化等都在这里受到热捧”。这也是不同范畴的概念不当并列。可改为“古希腊的、近代欧洲文艺复兴的,以及现代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的文化等,都在这里受到热捧”。

[错例]他们认为做好学生会、社会、班级、学生党支部等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

[评说]这是不同层次概念不当并列导致的病句。“社会”可以跟“学校”并列,但跟“学生会、班级、学生党支部”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不宜夹杂其中、与之并列。可改为“他们认为做好学生会、班级、学生党支部等校内工作,并做好社会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

[错例]诗歌载道、文以载道、小说载道……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载道文体。

[评说]这是种属概念并列不当的病句。“文以载道”是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观点,由中唐时期的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经宋代理学家的阐释得以完善,意思是文章是为了说明道理的。“文”为“道”服务不但成为历代散文的

准则,而且成为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此病句语境中也多处说“文以载道”之“文”是“文学”,而“文学”与“诗歌”“小说”是包含关系,所以“文以载道”与“诗歌载道”“小说载道”不能并列。可改为“诗歌载道、散文载道、小说载道……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载道文体”。

类似的,“这些正在被个人电脑、公共场所触摸屏、手机、移动终端以及 iPad 等代替”。手机、iPad 等都是移动终端,不能将有种属关系的“移动终端”与“手机”“iPad”并列。可改为“这些正在被个人电脑、公共场所触摸屏,以及手机、iPad 等移动终端代替”。

再如,“法院立案后迅速着手调查,很快查明了案情及假电报的来龙去脉”。“案情”本身就包括“假电报的来龙去脉”,二者为种属关系,不能并列。可改为“法院立案后迅速着手调查,很快查明了假电报的来龙去脉和其他涉案情况”。

三、判断形式错误

判断是对事物表示肯定或否定的一种思维形式。恰当的判断是准确表达思想的一个重要条件,它是正确的内容与适当的形式相一致的产物。判断既要合乎事实,又要考虑全面,判断的前后对象要搭配,运用否定句不要引起混乱,不能自相矛盾,不能有歧义,还要讲究分寸。^{[4]33-35}报刊编校中常见的文稿判断形式错误,主要有简单判断结构项出错、多重否定失当、前后不自洽、关联词与复合判断前后件关系错乱等。

1. 简单判断结构项出错

编校中常见的简单判断结构项出错,主要有量项使用不当、关系判断的关系项不搭配、性质判断的主项与宾项联系错误等。

[错例]本书是一套很好的职业教育教材。

[评说]这是量项使用不当造成的判断错

误。“本书”是个体,而“一套”是集合量项,判断的主宾项单复数不一致。可改为“本书是一部很好的职业教育教材”。

[错例]自杀率占患者人群的4%~10.6%。

[评说]这是关系判断的关系项不搭配造成判断不成立的病句。在“占比”关系中,分别作为分子和分母的两关系项“自杀率”与“患者人群”不能发生类属关系,不能构成判断。可改为“患者自杀率为4%~10.6%”。

[错例]休息就是工作。

[评说]这是性质判断的宾项表达失误造成判断不成立的病句。可改为“休息就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类似的,“而‘獐’呢?是一种鹿,属野兽”。獐是獐,鹿是鹿,二者不是同一种动物。可改为“而‘獐’呢?是一种鹿科野兽”。

[错例]春菠菜是指于早春播种,春末夏初收获的一种栽培方式。

[评说]这是性质判断的主项与宾项无法联系造成判断不成立的病句。通过“是”把前后两部分联系起来的性质判断,主、宾两部分要有必然的联系。“春菠菜”显然不是“一种栽培方式”,联系错误。可改为“春菠菜早春播种,春末夏初收获”,或“春菠菜是指一种于早春播种、春末夏初收获的菠菜品种”。

类似的,“原籍是河南省舞阳县侯集乡余庄村人”。该句主项“原籍”是指某地方,而宾项是“……村人”,二者不具有种属关系或同一关系,不能构成判断。可改为“原籍是河南省舞阳县侯集乡余庄村”。

但是,基于修辞上的省略法或“是”的特殊用法,有些看似前后成分不能发生类属关系的主宾项,其搭配并非不当,如“那时候时髦的年轻人都是喇叭裤”,“我是两个孩子”。

2. 多重否定失当

重复否定是用多个重复的否定词来表达否

定的意思,其作用是加强语气。三重否定或反问式双重否定,最终是表示否定;而双重否定是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来表达肯定的语意。所谓多重否定失当,主要是指否定词的重复出现或多次出现造成表意失误、“避免”“防止”“杜绝”“忌”等否定意向的词语误用造成表达失误,以及将否定对象表述成肯定对象造成的表达失误等。

[错例]除了整体观照之外,还有一些著作和论文将生平作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评说]这是否定词重复出现所造成的否定失误。“除了”与“之外”都表否定,保留其一即可。可改为“除了整体观照,还有一些著作和论文将其生平作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或“除整体观照之外,还有一些著作和论文将其生平作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类似的,“这难免不停留于空洞的呼唤”。“难免”就是不容易避免,加上“不”再次否定,表意完全相反。可改为“这难免停留于空洞的呼唤”。

[错例]在孩子眼里,世界是奇妙无穷的,生活中无时无刻都充满着为什么。

[评说]这是否定意向的词语误用所造成的表达失误。“无时无刻”表达的是否定,与句意相反。可将“无时无刻”改为“时时刻刻”。

类似的,“在没有摆脱财务自由之前,现实中的人还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该病句也属于否定意向的词语误用所造成的表达失误。可将“摆脱”改为“获得”。

[错例]该企业更新了部分先进的医疗设备。

[评说]这是否定对象表述成肯定对象所造成的表达失误。用有去除意向的谓语“更新”接正向表述的宾语“先进的医疗设备”,意思相左。可改为“该企业更新了部分陈旧的医疗设备”,或“该企业换上了部分先进的医疗设备”。

3. 前后不自洽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同一时间、同一条件下,从同一方面,对同一事物,两个互相矛盾或互相反对的思想不能都是真的。也就是说,一个概念不能前面说是它,随后又说不是它;一个命题不能一边肯定某一对象,另一边又肯定一个与之相矛盾或相反的对象。思维和表述首尾一贯,这是形式逻辑中矛盾律的要求。自己否定自己,违反矛盾律要求而出现的逻辑错误,称为“自相矛盾”。^{[4]82}比如,在表达相同或类似意思,前后用的是相反或相对的词,相互抵触;把表示对立数量的词用在同一类事物上,前后的多、少不一致;把表示不同指向、不同程度、不同时间、不同语气的词放在一起,有时也会造成矛盾,不自洽。^[5]编校中常见的前后不自洽主要有意思自相矛盾,两面词前后不一致,以及数据、时间前后不自洽等。

[错例]当年林县人民修建的红旗渠,是以血肉之躯向巍巍大山挑战,189人血祭太行,战胜了不可违抗的大自然的雄壮结果啊。

[评说]这是表意自相矛盾导致的逻辑错误。该例句“战胜了不可违抗的大自然”自相矛盾,既然“战胜”了,那就说明大自然不是“不可违抗”的。

类似的,“以上是舞钢市森林公安局保护森林资源、打击涉林违法犯罪的缩影,它充分展示了该局保护生态环境的丰硕战果”。既然是“缩影”,就不能“充分展示……丰硕成果”,逻辑上不一致。

[错例]我们能不能培养出“四有”新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也是教育战线的根本任务。

[评说]这是最常见的“是否(能否、有无)……是……”两面词前后不一致的病句。有些词汇仅有一面的意思,或是正面的(如“好”“顺利”),或是反面的(如“坏”“不顺”),有些词汇

兼有正反两面的意思(如“是否”“多寡”),造句时如果把一面性的词语跟两面性的词语搭配,就会造成前后表意不对等。该句子前面用两面词的选择形式(肯定+否定),后面只用一面词的唯一形式(肯定),前后不一致。为使前后意思对应,可改为“培养出‘四有’新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也是教育战线的根本任务”。

[错例]我们要总结正反经验。

[评说]这是“二对一”的前后表意不一致,“经验”为正面的,此句没有给出反面的宾词。可改为“我们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错例]这对乱倒垃圾起到了一定作用。

[评说]这是前置介词结构与后续表达意思不一致造成的病句。理论上讲,“一定作用”既包含“整治作用”,也包含“推波助澜作用”,一般用作正向意义。这样,“一定作用”如果作双向意思解读,则原句是“一对二”的前后意思不对等;如果作单向正面解读,则原句是前负、后正的表意不一。原文意指垃圾治理,可改为“这对乱倒垃圾起到了一定整治作用”,或“这对整治乱倒垃圾起到了一定作用”。

[错例]香港的环保团体环保触觉调查发现,香港5份免费中文报纸发行量近300万份,推算出5天用纸量达2187吨,如果以1吨纸需要17棵树计算,便需砍伐3.7万棵树,1年则需要砍伐近200万棵树。

[评说]这是计算数据前后不自洽的逻辑错误。按句子前半部分给的数据计算,1年需要砍伐17棵每吨 $\times(2187\text{吨}/5\text{天})\times 365\text{天}=2\,714\,067$ 棵树,已超过200万棵,而句子最后说“近200万棵树”,显然不耦合——如果是每周用纸量达2187吨,则1年需要砍伐近200万棵树用于造纸。

[错例]白细胞减少与剂量有关,治疗开始

后3~12周出现,以10~30日最显著。

[评说]这是时间上前后不自洽的逻辑错误。“10~30日”不全在“3~12周”范围内,这两个时间区间至少有一个是错的。

4. 关联词及复合判断前后件关系错乱

复合判断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在意义上有密切联系的单句组合而成,其间通常用一些关联词语来连接。作为连接分句、标明关系的词语,关联词语多是用来标明抽象关系的,可以作为某类复合判断的特定形式标志。比如,“虽然……但是/却……”“尽管……还是/但是……”“……却/然而/但是……”表转折关系,“如果/倘若……就……”“要是……那么/就……”“即便/即使……也……”“倘若……便……”表假设关系,“一边……一边……”“一会儿……一会儿……”“既……又……”“又……又……”“一面……一面……”“有……有……”表并列关系,“不仅……而且……”“不光……也……”“不但……还……”表递进关系,“是……还是……”“要么……要么……”“或者……或者……”“与其……不如……”“宁可/宁愿……也不/决不……”表选择关系,“因为……所以……”“之所以……是因为……”“由于……因此……”表因果关系,“先……再……”“首先……接着……然后……再……又……”“先……然后……”“接着……最后……”“一……就……”表承接关系,“只要……就……”“只有……才……”“无论/不论/不管/任凭……都/还……”表条件关系。同一个句子,运用不同的关联词,表达的意思不一样,造句时究竟选用什么关联词,要根据表达的需要而定。常见的有单个词语的关联词,也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成、成套使用、表特定语法关系的关联词,其搭配是固定的,不能随意调换。关联词应分别置于复句的两个分句之中;两个分句用同一主语时,关联词语应在主语后边,主

语不同时,关联词语应在分句主语前面。该用关联词的地方不能缺少关联词,有一部分配对使用的关联词,可根据情况省略其中的前一个,如“不但……而且……”可省去“不但”,“虽然……但是”可省去“虽然”,但是一般不能省去后一个的“而且”和“但是”;如果只用前一个关联词语,而省去了后一个关联词语,句子间的关系就会不明确,句子的意思便表达不清。编校中常见的关联语及复合判断前后件关系错乱主要有关联词位置不当、关联词不配套、关联词残缺、关联词误加、关联不当等。

[错例]楚子越是使自己的事业和天地拓展得越开阔,就不会回到农村老家。

[评说]这是关联词未能分别置于复句的两个分句之中的病句。可改为“楚子越是使自己的事业和天地拓展得开阔,就越不会回到农村老家”。

[错例]这个王子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不只是那种有一点儿本事的投机者,而是一个旷世奇才。

[评说]这是关联词不配套造成关联不到位的病句。该句将不相容的选言判断关联词“不是……而是……”误为“不只是……而是……”,从而造成关联不当。可改为“这个王子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不是那种有一点儿本事的投机者,而是一个旷世奇才”。

类似的,“只要有功法为基础,内外合一,才能发挥出拳法的强大威力”。这是将表必要条件关系的关联词“只有……才能……”误为“只要有……才……”(“只要有……就……”表充要条件关系)造成的关联错误。可改为“只有以功法为基础,内外合一,才能发挥出拳法的强大威力”。注意,不能采用“只要有……就……”的关联形式,将必要条件改为充要条件是不对的。

[错例]我不仅在校内的语文竞赛中屡获

佳绩,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小学生作文比赛,曾获得第二名的殊荣。

[评说]这是关联词不兼备造成前后关系不明朗的例子。像“不仅……还(而且)……”这种配对使用的关联词,可根据情况省略其中的前一个“不但”,但不能省去后一个“还(而且)”;否则句子间的关系就会不明确。可将句子改为“我不仅在校内的语文竞赛中屡获佳绩,还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小学生作文比赛,曾获得第二名的殊荣”。

类似的,“虽然时间短,西服大王、省自强模范马震声答应了他们”。这是表转折的配对关联词“虽然……但是(可是)……”不当省略后一个造成的病句。可改为“虽然时间短,可西服大王、省自强模范马震声还是答应了他们”。

[错例]……所以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在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农村所占比重1993年降至41.1%。

[评说]这是多重复句内部关联词残缺造成层次关系表达不清的病句。可改为“……所以尽管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但在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农村所占比重1993年降至41.1%”。

[错例]只有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厂一定能在国企改革中作出较大贡献。

[评说]这是在简单判断中误加关联语致使句子不伦不类的例子。该句本为简单判断,因误加复合判断的关联词“只有”而不伦不类,可将“只有”去掉。

[错例]这不仅给中外学界探索秦始皇陵之谜注入了强劲动力。因此,也为秦始皇陵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评说]这是在递进关系中误加表因果关系的关联词致使表意错乱的例子。可改为“这不仅给中外学界探索秦始皇陵之谜注入了强劲

动力,也为秦始皇陵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类似的,“只有……。惟有如此,才能……”句式也属于此类错误。“惟有如此”与“只有……”语义重复,且使得“只有……才能……”的顺畅关联断裂,前面的内容变成了不完整的句子,所以可将“惟有如此”删除。

[错例]此次行动不仅保护了野生动物的安全,而且维护了辖区生态链的完整。

[评说]这是滥将两方面内容用“不仅……而且……”关联的表达错误。其实前后内容之间是承继关系,不是递进关系。可改为“此次行动保护了野生动物的安全,维护了辖区生态链的完整”。

[错例]任何理论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因为理论构建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要受到种种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限制;与此同时,现实却是千变万化的,没有一种理论能够穷尽现实。因此,任何理论都存在着应用限度,倡导联盟理论也不例外。

[评说]这是将递进关系误为转折关系所造成的病句。可改为“任何理论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因为理论构建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要受到种种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限制;与此同时,现实又是千变万化的,没有一种理论能够穷尽现实。因此,任何理论都存在着应用限度,倡导联盟理论也不例外”。

[错例]不能滑坡,更不能停顿。

[评说]这是递进关系前后颠倒所造成的病句。递进关系是一层进一层的,讲究先后次序,“滑坡”比“停顿”在表现程度上更进一步,要后说才对。可改为“不能停顿,更不能滑坡”。

[错例]随着中国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不断被媒体披露,越来越多的优质水源地在逐渐消失,人们对饮用水的关注度空前提升。

[评说]这是因果无据的判断错误。可改为“随着中国水污染的加重,越来越多的优质

水源地逐渐消失,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不断被媒体披露,人们对饮用水的关注度空前提升”,或“随着中国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不断被媒体披露,以及越来越多的优质水源地在逐渐消失,人们对饮用水的关注度空前提升”,或“随着中国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不断被媒体披露,越来越多的优质水源地在逐渐消失的消息逐渐被曝光,人们对饮用水的关注度空前提升”。

[错例]由于西医在近代的迅速崛起,中医学显得萧条和滞后。

[评说]这是将对比关系误为因果关系所造成的病句。可改为“相对于西医在近代的迅速崛起,中医学显得萧条和滞后”。

[错例]只要我们兵是精的,将是强的,我们就能创造出高速度。

[评说]这是将必要条件误为充要条件造成的病句。可改为“只有我们兵是精的,将是强的,我们才能创造出高速度”。

四、推理与论证错误

推理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推导出一个新的结论的思维过程。推理须遵循形式逻辑提供的一套形式结构。任何一个推理都是由已知判断、新的判断和一定的推理形式构成的。推理中的已知判断叫前提,根据前提推出新的判断叫结论。前提与结论的关系是理由与推断、原因与结果的关系。要确保推理有效,必须保证前提内容真实、推理形式正确。^{[3]144-148}

论证就是用一或一些真命题推导出另一真命题的思维过程。任何论证都是由论题、论据和论证方法三要素构成的。论题是要通过论证确定其真实性的判断,它所回答的是“论证什么”的问题;论据是用来确定论题真实性的判断,它是使论题成立并使人信服的理由或根据,它所回答的是“用什么来论证”的问题;论证方法是指论据与论题之间的联系方式,即

论证过程中所采用的推理形式,它所回答的是“怎样用论据论证论题”的问题。推理是一种重要的论证方法,它是结论的产婆。一个论证过程可以只包含一个推理,也可以包含一系列推理。论证必须遵守推理的规则,违背推理规则的论证就是诡辩,其结论是不真实、不正确的。^{[2]236-239}

思维是人类大脑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一种抽象概括活动。要正确地运用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与论证,必须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律进行,遵守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以及辩证逻辑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不犯逻辑错误,方能正确认识事物、准确表达思想。编校中常见的推理、论证错误主要有违反同一律、层次关系错乱、论证不足、内容重复等。

1. 违反同一律

在同一论断过程中,同一思想(概念、判断、推理)要保持一致,一以贯之,这是正确思维的基本条件。同一律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之一,它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和判断,不能在不同意义上使用概念和判断;要求同一立场和同一时空前提下,思维对象同一、概念同一、判断同一。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如果不是在原来意义上使用某个概念,而是把不同的概念混为一个概念或者改换同一概念的含义,不保持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确定和同一,就会犯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如果不是在原来意义上使用某个判断,而用另外的判断代替它,或者在论证某个论题时,中途改变讨论的对象或论述中心,就犯了转移论题或偷换论题的错误。^{[3]114-118}

编校中常见的违反同一律的错误,主要有所言对象、时空、立场、数据等前后不一致,论证

跑题、前后不照应等。

[错例]设任一对夫妇中之夫为A,妇小4岁为B……

[评说]这是同一论证中概念分类角度不同一的问题。“一对夫妇中之夫”跟“妇小4岁”不是在同一分类角度上的两个对象,述说中心中途改变,后者不再是在原来思维路径上的对象。可改为“设任一对夫妇中之夫为A,妇为B(妇小夫4岁)……”。

类似的,“从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斯大林模式,以及随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经历了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带给人们无尽的思索”。该句“从……到……”中“以及”连接的前后内容不是一条思维路径上的概念;后面讲“崛起与崩溃”,跟前面的“政策”“模式”也是不在一条思维路径上的内容对象,并且“崛起与崩溃”的过程是分阶段演进的,要有进一步的关联语方能更明确地表达言说意图。可改为“从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斯大林模式,再到随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经历了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等推行的政策,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崛起与崩溃的历史带给人们无尽的思索”。

[错例]该集团在管控总体思路的基础上,逐渐构建了系统的人力资源管控体系,实现了集团总部与下属子公司在人力资源战略协同和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的高效运作。……对于下属子公司我们制定了子公司工资管理办法,实行员工工资总量控制,给各子公司发放工资起到指导作用。

[评说]这是叙述人称前后不一致、未能保持概念的确定和同一导致的病句。该文阐述某公司集团化转型中人力资源管控体系构建的做法与经验,前文一直使用第三人称“该集团”,其分述中却改成了第一人称“我们”(这是常见的做软文广告时使用对象单位所提供的材料修

改不到位的表现),前后不一致。后句可改为“……该集团制定了子公司工资管理办法,对下属子公司实行员工工资总量控制,对各子公司发放工资起到了指导作用”。

[错例](《辣妈正传》中)元宝和明道争取孙俪,但孙俪没有选明道,元宝到底是怎么逼走明道完成逆袭的?

[评说]这是用现实人物姓名与影视角色姓名混杂在一起讲述影视角色关系的病句。其问题是未能保持思维对象、时空的确定和同一。可改为:“(《辣妈正传》中)元宝(张译饰)和鲍帅(明道饰)争取夏冰(孙俪饰),但夏冰没有选鲍帅,元宝到底是怎么逼走鲍帅完成逆袭的?”

[错例]我在出国之前,一直在县文化馆工作……在县文化局群艺馆就是歌舞演员。

[评说]这是所言处所前后不一致的问题。“文化馆”和“文化局群艺馆”并非一个概念,前后不一致。

[错例]洛、灇两河流经城中,伊、洛、灇、涧(即谷水)尽为所用,水源极其丰富。洛水以北主要靠谷水、灇水、涧水、泄城渠、漕渠供水。

[评说]这是同时陈述多个对象时其相互关系前后不一致的病句。句中“谷水”与“涧水”前面是同一事物,后面是两并列事物,前后不一致。

[错例]本次教育活动生动活泼,培养了幼儿的爱国主义情怀,使爱国的种子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

[评说]这是所言时态前后不一致的问题。既然后面说“使爱国的种子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一般现在时),那么前面就不可能是“培养了幼儿的爱国主义情怀”(完成时),前后时态不一致。可改为“本次教育活动生动活泼,旨在培养幼儿的爱国主义情怀,使爱国的种子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或“本次教育活动使爱国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灵中生根

发芽,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类似的,“媒体的分析解读越专业,它们就越有市场,也就进一步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越……就越……”是一般现在时,后面不应接“也就进一步创造了”这种完成时用语。可改为“媒体的分析解读越专业,它们就越有市场,也就越有可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再如,“布热斯基预测:1992年美国国债已达4万亿美元”。既然是预测,后面就不能“已达”。可改为“布热斯基预测:1992年美国国债将达4万亿美元”。

[错例]一个人也好,一个单位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知名度、毁誉度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他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贡献的大小。

[评说]这是对同一对象修饰感情色彩前后不一致造成的病句。可改为“一个人也好,一个单位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知名度、美誉度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取决于他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贡献的大小”。

[错例]这次行动遭到市场管委会和安阳市开发区个别领导的百般阻挠,并拿出“挡箭牌”与执法人员理论,300多商户也都关门溜号,此举让这次大规模的执法检查行动“卡壳”。

[评说]这是叙述对象来回跳跃造成思维主线不能一以贯之的例子。句子开头的动作主体是“这次执法检查行动”,“拿出‘挡箭牌’与执法人员理论”的应该是“市场管委会和安阳市开发区个别领导”,后面又出现“此举”作主语,思维对象来回跳跃,不确定。可改为“这次行动遭到市场管委会和安阳市开发区个别领导的百般阻挠,他们还拿出‘挡箭牌’与执法人员理论,300多商户也都关门溜号,致使这次大规模的执法检查行动‘卡壳’”。

类似的,“邵元克在戏曲上的天赋,如果加

以正确的引导和扶持,一定会有更加广阔的天地”。这也是思维对象不确定造成的病句,“邵元克在戏曲上的天赋”与“邵元克”混为一谈。可改为“邵元克在戏曲上很有天赋,如果得到正确的引导和扶持,一定会有更加广阔的天地”。

[错例]他最能刻画的就是变化发展的心理:从原先那个单纯善良、小心翼翼的石小猛,到后来凌厉老辣和无法愈合的伤痛,将一个让人又爱又恨又心疼的凤凰男形象表现得很惊艳。

[评说]这是叙述角度来回变换、思维主线不能一以贯之造成的病句。冒号前后内容、“从……到……”连接的前后内容均不在一条思维主线上。可改为“他最能表现与刻画的就是发展变化的人物及其心理:从石小猛原先的单纯善良、小心翼翼,到后来的凌厉老辣和无法愈合的伤痛,他都演绎得活灵活现,将一个让人又爱又恨又心疼的凤凰男形象表现得很惊艳”。

[错例]国内政府在管理中责任文化也受到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一书中就要求提高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公民道德素质,教育是基础,教育的主体包括家庭、学校、机关和社会各方面,其中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第一责任文化的重要地位。责任文化作为高职学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是区别于人才、学历、技术等传统要素的另一种社会存在形式,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又是高职院校长期发展中形成的重要无形资产。第二,有具体的实施措施。制度文化是落实责任的重要依据。

[评说]这是论证跑题、前后文关联不够、违反同一律的例子。该段论题是“责任文化教育”,但其从头到尾问题不断:(1)首句“国内政府在管理中责任文化也受到重视”即语序不当,喧宾夺主;(2)第二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一书中就要求提高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等公民道德素质”,没跟主题关联起来;(3)接下来“教育是基础”及“其中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也没说出跟主题的关系;(4)然后“第一责任文化的重要地位。……第二,有具体的实施措施。……”莫名其妙;(5)再下来“责任文化作为高职学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是区别于人才、学历、技术等传统要素的另一种社会存在形式,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又是高职院校长期发展中形成的重要无形资产”,前提与结果颠倒;(6)最后“制度文化是落实责任的重要依据”,也没有明确回应其跟主题“责任文化建设”的直接关系。

围绕“责任文化教育”这一主题,该段落可改为:“责任文化以其特别的重要性也受到政府的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一书中要求提高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公民道德素质,责任文化建设就内涵其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主体包括家庭、学校、机关和社会各方面,其中学校是进行责任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责任文化是区别于人才、学历、技术等传统要素的另一种社会存在形式,培育学生的责任文化,既是高职院校在长期发展中形成重要无形资产的源泉,也是构建高职学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制度是落实责任的重要依据,建设责任文化必须从制度建设抓起。”

[错例]某文章小标题“治本一:加快推进供热供暖”,其下文:“工作目标:2017年10月底前平顶山市建成区内新增集中供热面积274.4万平方米,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60%以上。全市建成区范围内严禁新建燃煤锅炉,严禁燃煤散烧。在未实现集中供热的区域应加快集中供热管网延伸,优先发展集中供热,其余供热管网无法覆盖区域,按照宜气则气、宜电则电的原则,完成‘气代煤’‘电代煤’改造工程。”

[评说]这是由思维前后不同一而导致的

文题不符问题。因为本文并不是在讲“供热供暖”问题,而是在讲“集中供热供暖”问题。小标题应改为“加快推进集中供热供暖”。

类似的,某文章小标题“严防有法不依现象,规范执法行为”,但其下文是:“规范执法主体。……强化证据意识。……规范办案程序。……”其标题跟后文也不照应,且标题的前半句前后不搭配。可改为“规范执法,严防有法不依”。

[错例]《省政协召开十一届十次主席会议》一文的导语为:“省政协十一届十次主席会议1月3日在郑州召开,研究关于召开省政协十一届四次常委会议有关事宜。”但后文一半篇幅说会议研究关于召开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有关事宜。

[评说]这属于导语失偏类前后不照应问题。可将导语改为:“省政协十一届十次主席会议1月3日在郑州召开,研究关于召开省政协十一届四次常委会议和召开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有关事宜。”

类似的,有些学术论文的摘要往往存在因表述要素不完整导致前后不照应的问题。比如内文讲实验条件有五个,可是其摘要中只讲三四个,就说会得到相应结果;还有的给出的数据跟内文实验所得、结论总结不一致。这些均有违同一律。

2. 层次关系错乱

一篇文章要有一个主题思想。要明确地表现主题,必须根据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合理安排段落。哪些先说、哪些后说,哪些处于平等地位、哪些处于从属地位,层次要清清楚楚,不能杂乱无章。同样,一个段落要明确表达中心意思,也必须合理安排句子,不能语无伦次。在一个句群里,一般句子之间要有某种内在联系,或有时先后,或有因果关系,或有条件关系等。如果在表达中不考虑时序,或因果无据,或条件

不符,或表关系的连词阴差阳错、张冠李戴,就会出现层次关系错乱的问题。^[6]

[错例]他对我们旗的每条道路、沟壑,散布于近四千二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水井深度、湖泊大小、水量多少、流经每户人家水流的粗细情况,适宜高寒地带种植的各种农作物的生长期和收成,畜牧业的原始形态和再生性发展,每个聚居点的地理、历史、宗教、民族风俗,对山地、丘陵、荒漠化草原、半荒漠化草原的每寸土地所能生长的植物群落,对历史的、现实的各种疑难问题,了如指掌。

[评说]这是多项并列成分列述混乱造成的层次关系错乱。可将该句内容分地理、种植和人文三个层次依次叙述,分别用一个介词“对”引领:将“每个聚居点的地理、历史、宗教、民族风俗”后移,与“历史的、现实的各种疑难问题”放在一起,使种植类内容相对集中,可改为“他对我们旗的每条道路、沟壑,散布于近四千二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水井深度、湖泊大小、水量多少、流经每户人家水流的粗细情况,对适宜高寒地带种植的各种农作物的生长期和收成,畜牧业的原始形态和再生性发展,山地、丘陵、荒漠化草原、半荒漠化草原的每寸土地所能生长的植物群落,对每个聚居点的地理、历史、宗教、民族风俗,以及历史的、现实的各种疑难问题,了如指掌”。

[错例]愚公,一直居住在这片土地上,这是对故乡的一种热爱,对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热爱,年且九十,不离不弃。

[评说]这是因果混杂的层次关系错乱。该句第一层次应是对愚公本身及其状况的交代,第二层次是对其的评价。可改为“愚公,年且九十,一直居住在这片土地上,不离不弃。这是对故乡的一种热爱,对这片土地上人民的热爱”,或“愚公,一直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年且九十,不离不弃。这是对故乡的一种热爱,对这片

土地上人民的热爱”。

[错例]这种责任不仅表现为科研人员在科研活动中要自觉遵守伦理原则,对生命、环境、基本人权和社会正义等表现出尊重、无害、关怀,实现科技风险最小化,在科技实践中不仅要求真与善,而且还要对人类负责;更重要的是,科技管理决策者和有关管理部门要把控制科技风险、保障科技朝着对人类有益的方向发展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

[评说]这是多层次逻辑关系错乱的例子。该句表递进的内容分三部分,可用“……不仅……而且……更重要的是……”关联,但第一部分里的关联词“而且”缺失,而第二部分内部非递进关系的分句之间又不恰当地使用了关联词“……不仅……而且……”,层次关系错乱,影响了思想的准确表达。可改为:“这种责任不仅表现为科研人员在科研活动中要自觉遵守伦理原则,对生命、环境、基本人权和社会正义等表现出尊重、无害、关怀,实现科技风险最小化;而且在科技实践中还要求真与善,对人类负责;更重要的是,科技管理决策者和有关管理部门要把控制科技风险、保障科技朝着对人类有益的方向发展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

3. 论证不足

在认识的各种场合,经常需要确定某一判断的真实性,为此,人们往往引用某个(或某些)真实判断作为根据,从这个(或这些)判断中推出所要确定的判断的真实性,这就是论证。如果只有论题,而没有论据和论证,这个判断便没有存在根据的说明,那么它就缺乏说服力。^[7]

比如,某刊《论“三个代表”的科学精神》一文的原稿第三部分谈到如何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第一,深化改革,健全法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下文谈的全是要改革、要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对健全法制的阐述就一句“经济管理体制仍保留着某些人治权治

的痕迹”。这就使得上述论题在其下文中不能完全找到依据,从而不能使人产生共识、认同其观点。为使文章前后呼应,要在此句之后再加一些诸如“尚未走上法制化轨道。法制建设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先行官和助推器。没有相关法律保驾护航,改革的深化便会沦为一句空话。因此,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从而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保障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促进改革开放”之类的内容。

4. 内容重复

比如,某报刊文章,其“五、近代化市政设施的发展”最后一段结语为“……将原来服务于帝王的城市空间改造成服务于市民的空间,显示了王权至尊性的意识形态向市民生活的重要性意识形态的转变”,而“六、都市规划结构演变特征”最后一段结语跟上一层一样,内容重复。

此外,有的新闻报道开头写某位领导“宣读讲话”,结尾时又补缀他“出席会议”,显系重复。

综上,本文所谈到的这几类常见逻辑错误,如果单从语法上看往往问题不明显,有时各语

法成分也齐全,但各成分之间的关联是错误的。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在编校中需理性分析,仔细判断,并运用相应的逻辑知识加以修改。唯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编校质量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 [1] 李世繁. 辩证逻辑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1-72.
- [2] 《普通逻辑》编写组. 普通逻辑[M]. 2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3]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 形式逻辑[M]. 2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 [4] 刘占先. 逻辑知识[M]. 2版.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 [5] 张静. 新编现代汉语(下)[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51-51.
- [6] 张静. 新编现代汉语(上)[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235.
- [7] 徐元瑛,崔清田. 简明逻辑学[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188.



引用格式:杰西·托马斯,魏华. 平行的沉默——关于绘画现状的认识与思考[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5):91-96.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1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5-0091-06

平行的沉默

——关于绘画现状的认识与思考

Parallel silence

—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of painting present situation

杰西·托马斯, [翻译]魏华

Jesse Thomas¹, [Translator] WEI Hua²

1.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加拿大 埃德蒙顿市;
2.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关键词:

叙事人物画家;

历史;

绘画;

真实性

摘要:为阐释人类心灵的奥秘和美的本质,通过不同系列作品提示人们,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图像扩散的世界,绘画始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拥有它自己的尺寸、历史与地域性,也就是真实性或灵气:一种将绘画与人类在仪式或魔法领域中最早的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品质。

收稿日期:2017-04-15

作者简介:杰西·托马斯(1970—),男,美国人,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助理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绘画;魏华(1977—),女,河南省许昌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美术史、设计理论。

非常荣幸能够获郑州轻工业学院之邀来聊聊在全球跨文化传播的背景下,为达到服务大众的需求,艺术家对人类的心灵奥秘和美的本质所进行的探讨。我是一个主攻美学、历史与政治交叉领域的叙事人物画家,我的绘画虽涉及概念上的广阔历史,但主要兴趣所在是北欧的文艺复兴、南欧的巴洛克和当代的德国绘画。我受邀在郑州轻工业学院展出了50幅我工作室过去5年的代表性作品,我将通过讲解这些不同系列作品的主题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来传达我对绘画现状的认识与思考。

我的讲述将从一系列小型复制品开始(见图1)。这些作品是我将原稿拍下来并投影出来的,因为在类似这样的演示中,总是会有原稿丢失的现象。我在这次演示中展出这些图片的目的是提示人们,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图像扩散的世界,绘画始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拥有它自己的尺寸、历史与地域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实性或灵气:一种将绘画与人类在仪式或魔法领域中最早的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品质。

1978年,我从温哥华搬到了新奥尔良,那年我8岁。从文化角度上来说,新奥尔良比加勒比北部地区更加不像美国,这是我从小居住的城市,其文化影响了我早期的思想。新奥尔良在文化上与美国的其他城市不同,其人口主

要是来自非洲和地中海—欧洲的后裔。这是一个种族多元化的城市,有既公开又戏剧化的重要的民间庆祝活动。在城市最重要和最真实的文化传统中,保守是当地社会和俱乐部所固有的。这种文化体验和对真实的信仰,形成并激发了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对世界的理解。新奥尔良文化弥漫着保守和固执的氛围,且面对全球和国家的外部压力和影响不愿改变,人们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真实的,而外来者不会且永远不会“得到它”。

另一个对我的艺术形成有很大影响的城市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一个我无数次探访并居住过的城市。在佛罗伦萨,我开始对人物肖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传统绘画的材料和技术产生兴趣。受这些影响,我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制作石膏和胶水底座,用蛋彩画和油媒介的混合物做底色,将金色和银色的叶子加入到我的绘画作品中。在佛罗伦萨的那段时间使我意识到了教堂中那些画作的特殊地域性、与建筑的特定关联性和永恒的讲述故事的能力。

《工作室》(见图2)是我在研究生院完成的两幅重要绘画之一,它是将我所感兴趣的菲利普·古斯顿与贝拉斯克斯结合在一起的一次尝试,表达的主题是夸张、幽默和个人写真,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将后现代意识与启蒙思想相结合。



图1 作品演示



图2 《工作室》(72×96”,布面油画,2003)

《艺术青年》(见图3)是我在研究生院完成的第二幅作品,它体现了我目前综合各种视觉来源的方法论——综合照片、直接观察、虚构和其他绘画的技法。这种策略能使我在作品中构建正式的和概念上的多样性,以使各个部分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Artistic Guy (Portrait of Galen Gondolfi) 2003 Oil on canvas 36 x 48 inches

图3 《艺术青年》(36×48",布画油画,2003)

《蓝色军团》(见图4)是我第一个成功的绘画作品系列,于2011年在旧金山、芝加哥我的个人画展上展出。在这些作品当中,我找到了一种方法来表达我对包括肖像画、静物、室内空间等历史题材的兴趣。作为绘画,它们既新颖又传统。在它们中,我找寻到一种方法,使绘画能够通过调和矛盾来表达复杂性。这些室内装饰是从1970年前后的自定义家庭目录中提取出来的,它们的设计唤起了美国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美国民主进步的价值观——每一个公民都肩负权利和责任,其位置被来自公共领域的心理紧张的形象所占据——演员、政客、法官、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人员。对我来说,这些人物形象说明了国家的暴力倾向和故意的无知,驳斥了那些把美国当作希望和自由灯塔的价值观和行为。

政治和美学的交叉点是观念的形成、思想的控制、国家品格的形成。在对世界的认知中,

我们必须简化、分类并继续前进,从而建立起一个简化和假设的信仰体系。一种温和的国家宣传系统是通过电视和报纸建立起来的,由大学董事会和私人基金会资助,微妙地支持着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已将美国引向内部充满分裂和内讧的不稳定状态。这种宣传系统的魅力在于它假设言论和思想自由是根本的,尽管事实是相反的。



图4 绘画《蓝色军团》

在我2013年的《Gold Ochre》系列绘图作品(见图5)中,我所感兴趣的是色彩的本质。这幅作品的主题灵感来源于葛饰北斋和安藤广重的木刻版画。我看着他们的作品,然后试图在我自己的时代和地域中重新想象他们的故事。黄色和赭石色存在于天然的氧化铁颜料中,颜色范围从红到绿,我想研究的是在这个简单的调色板中使颜色协调的可能性。将颜色理解为颜料本身是我绘画实践的中心。对我来说,考虑给定颜料的独特品质——相对不透明

或半透明、温度、体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这些因素都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其反射光线。这些颜料多来自动物、蔬菜或矿物,了解这些物质的历史和起源有助于我对颜料的理 解和使用。绘画面对的始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图像——物体(不是通过某种机械手段再现的图像,即摄影版画),多使用一种浅浮雕颜料。在这个系列里,我特别注意颜料的厚薄应用,经常使用诸如滚筒和掩模之前的工具,以尽量减少手势应用,创建无艺术家手势的舞台,使艺术家的工作变得更有效率。虽说人们对不同绘画技术的尝试非常有兴趣,但是技术的选取需要与主题所要表达的潜在含义相匹配。



图5 《Gold Ochre》系列作品之一：
春天的酒鬼

故事画的有效性问题的,在历史主义的艺术理论主张中有其依据,即绘画的关键点在于对本身的正式基础的还原处理。因此,涉及外部世界事件(历史、政治、文化等)的主题大部分被拒绝,媚俗图像周围被高雅艺术包围着。在后现代,艺术家们彻底否定了艺术仅仅指它自己的形成过程和品质的观念。在许多当代画家心目中,首要的是在投入绘画后醒来的极简主

义、概念、性能、装饰,并且新媒体必须确认其具有的不仅仅是审美领域的处理能力,也包括处理认知与道德层面的能力。

2014年的绘画《两个理论,一个模型》(见图6),反映了一些想法——二元性与困惑。这是一幅反映世界末日景观的图画,其标题涉及适用于当代语境下绘画的一系列二元关系。其中,包括假定抽象与具象之间的对立;“严肃”的艺术应该具有道德目的,或将某种真理与作为创造性想象力和自由媒介的艺术相对立;将绘画看作是一种破产的、有缺陷的、无法呈现重要的形而上学真理的观念与亚里士多德把艺术看作是通过一个平行的、投机的现实来了解世界的观念相对立。最后是,将诚意与反讽——相信或怀疑作者身份和创意的独创性——作为今天艺术创作的一个适当的方式,见证了杜尚的现代作品对当代艺术实践的影响。



图6 绘画《两个理论,一个模型》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保护新奥尔良免遭周围环绕着的水的破坏的大堤系统。这座城市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许多市民遭受苦难,乔治·布什领导下的美国联邦政府在应对这场灾难中表现得十分无能。

我的2014年《Def Perspectives》绘画探索了政治与审美领域的交集。通过木炭、烧焦的

木材和一种简单古老的技术,我试图用包括我自身经历的元素和近期美国历史上的人文事件在内的简单材料来表现一个复杂的主题。像金色赭石系列一样,我继续平衡机会和“熟练”技术,反对更严格的合成和绘画过程。这些作品中的断裂空间反映了一种梦想逻辑:意义开始凝聚,然后在走完顺序、实现明确的目的之前消失。每个作品中存在的多个图层指的是时间和记忆的通道,它们反映了我们的身份是流动的、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因为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决定、记忆、理解和欲望的总和。

在古罗马的毁灭和新奥尔良的背景下,《圣克莱门特》(见图7)使用梦的逻辑来考虑音乐、文化、经济和历史。企业通过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来影响政府。朋克摇滚音乐表达了对当代美国企业价值观系统的反对。在这幅绘画作品中,1970年代的美国“经纪人”亨利·基辛格和开创性的纽约朋克乐队的先驱一同出现在电视中,一起为智利学者、理想主义总统萨尔瓦

多·阿连德献唱。

《古根海姆》(见图8)是陈列在纽约著名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内的有关艺术世界和经济学的寓言,其创作意图在于表现家族财富是由智利矿业创造出来的。诗人的灵感来自于通过全球经济、军事、历史,诗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交织在一起的故事。

《对象和标志》(见图9)思考并表现了艺术、哲学和宗教在我们文化的过去和未来的作用。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理想化的裸体人像象征着完美,是艺术的核心。在1960年代的美国,在现代主义的鼎盛时期,绘画演化为简约的结构,一种与同时代的企业标识设计相似的设计运动。如果艺术是对特定时空中文化的反映,那么我们目前艺术情况的完美体现是什么呢?被追查的对象和媒体,就像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高盛银行出卖他的客户一样没有意义吗?

《圣巴西德》(见图10)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罗马圣巴西德教堂祭坛下的地下室,它融合了



图7 《圣克莱门特》(50×38",炭笔画,2014)



图9 《对象和标志》(50×38",炭笔画,2014)



图8 《古根海姆》(50×38",炭笔画,2014)



图10 《圣巴西德》(44×30",炭笔画,2014)

古典艺术和朋克摇滚的元素。画家站在他正在做的画的右边。我们看不出他画的是什么,但我们可以看到他正看着我们所站的地方。这是两个人处在有一个镜子的房间中的复杂反射。为了实现那种反射,他们必须以观众的身份站在我们站的地方。你知道画家正在看谁吗?油画作品《事物的秩序》(2015—2016)表明油画是图像和语言系统在审美与政治领域的交集。

《网格大师》(见图11)表明,现代主义画家深入探究艺术的本质,以超越表面的感官世界。如彼得蒙德里安、索尔·莱维特和阿格尼丝·马丁就在一堵墙之外的神经的语言形式中,把他们与外部真实世界分隔开来。

《物品的顺序》(见图12)表明,现代主义绘画中单色的起源是在崇高的景观——晴朗的蓝天、疏散的沙漠——中发现的。这位画家被无

限的多样性世界包围着,他正在寻找形而上的起源和本质,而在他的周围,科学的分类法和神奇的相似之处排列着世界中的事物,建立一种基于语言认识论的首要地位的秩序。

《圣帕瑟德·巴瑟》(见图13)表明,过去和未来汇聚在充满政治和美学形象的洞穴里。从纳粹新古典雕塑和美国企业标识设计的极简主义权利,到性别和身份表征的政治,我们都可以看到艺术、宗教、哲学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的过去和未来的。

《眼睛同情附件》(见图14)表明,早期的科学探究和调查包括魔法、炼金术和占卜。世界上事物的属性和使用是通过隐藏的词和他们的参照,以及在事物之间的可见相似性发现的。因此,在眼睛和附件之间有一种医学上的“同情”,因为这种植物的种子就像小小的眼球!



图11 《网格大师》(44×60",布面油画,2016)



图13 《圣帕瑟德·巴瑟》(44×60",布面油画,2016)



图12 《物品的顺序》(33×46",布面油画,2016)



图14 《眼睛同情附件》(32×40",布面油画,2016)



引用格式:杨远. 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5): 97-102.

中图分类号: J12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15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5-0097-06

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crafts with He'nan characteristic

杨远

YANG Yuan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河南特色工艺品资源丰富,承载着河南优秀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是文化艺术和乡土精神的完美结合。目前,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初具规模,但存在发展前景不明朗、产业化发展层次较低、工艺创新发展后劲不足、产业链条不完善、品牌意识淡薄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特色工艺品产业发展相关人才缺乏,特色工艺品产业理论研究薄弱,政府层面的宏观管理与相关政策支持欠缺及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鉴于此,应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提高理论研究水平和创新设计能力;加强政策性导向,完善配套措施;培育区域品牌,打造特色工艺品产业集聚区;拓展产业链,发展多元化产业模式。

关键词:

河南特色工艺品;

产业化发展;

区域品牌;

产业集聚区

收稿日期: 2017-03-22

基金项目: 2016年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162400410546)

作者简介: 杨远(1975—),男,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传统工艺美术。

特色工艺品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寄托纯朴理想和愿望的精神家园,不仅给大众带来了美好的生活情趣,也潜移默化地孕育了华夏民族的道德情感。河南特色工艺品遗产蕴涵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抢救和保护行将消失的特色工艺品遗产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迫在眉睫的社会责任。目前,特色工艺品的抢救、保护工作已经得到政府相关部门和学者们的重视,在政策支持和理论研究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于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的研究,仅见个别学者对产业资源的分析,如汪振军^[1]曾对河南淮阳的特色工艺品——“泥泥狗”的产业资源作了分析。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充分挖掘传统特色工艺品资源以更好地推进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目前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待深入探讨。鉴于此,本文拟结合河南特色工艺品发展的资源优势,对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供业界参考。

一、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的资源优势

河南省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其特色工艺品资源丰富,几乎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工艺品。河南特色工艺品资源分布的具体情况为:豫东以开封的朱仙镇木版年画、汴绣和周口淮阳的泥泥狗泥塑为代表;豫南以许昌的禹州钧瓷,平顶山的汝瓷,驻马店의香囊,南阳的玉雕、石雕、烙画为代表;豫西以三门峡的民间剪纸、皮影、面花和洛阳的三彩泥塑为代表;豫北以安阳的剪纸、滑县的木版年画、浚县的泥塑为代表;豫中以新密的石雕、砖雕,郑州的剪纸、布艺为代表。其中有的特色工艺品资源呈遍地开花之势,如剪纸艺术,几乎河南每个区域都有杰出艺人。

由此可见,河南特色工艺品资源极为丰富。从目前来看,河南特色工艺品创作有的仍沿用传统的民间工艺方法和题材内容,如玉雕、石雕、剪纸、年画、泥塑;有的则在传统基础上进行了适应性的改造,如新题材的年画和剪纸;有的则是完全新创的作品,如日用陶瓷工艺、铁艺等。这些优秀的特色工艺品承载着河南优秀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是文化艺术和乡土精神的完美结合。

二、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河南拥有众多特色工艺品品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传统特色工艺品的生产方式、产品形态等,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发展需求,大批特色工艺品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整个行业发展遇到了一定困难。近年来,河南省从政府层面上提出了不少措施,如文化强省战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老字号认定等,从各个方面对特色工艺品资源进行保护和开发,各地的工艺品资源逐渐被当地重视,大部分有了初步的发展,个别的已初具规模。

但从总体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资源较多但形成产业规模的比较少,发展前景不明朗,产业发展层次较低,创新发展后劲不足,产业链条不完善,品牌意识淡薄等。

以朱仙镇木版年画为例,虽然其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刻印作坊曾遍及全国,但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市场经济的冲击、科学技术的发展,木版年画渐渐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空间,正面临着市场的考验和挑战。首先,朱仙镇木版年画后继发展问题堪忧。就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继承和发展来看,目前全镇从事年画制作的作坊仅仅剩下天成、万同、曹家、天义德等六家,从业人员不到20人,而且多数面临后继无

人的局面。这与明清时期的 300 余家门店、民国时期 40 余家门店 2000 多从业人员^[2]相比,确实堪忧。其次,朱仙镇木版年画产业发展虽初具规模,但整体竞争力不强。就目前情况来看,朱仙镇万同年画社的经营状况较好,不仅仿制老版,还创作了一些新版,其销售也与市场接轨,发展思路较为清晰。但其他几家木版年画社经营状况不佳,有的年画社之间甚至为了争夺老字号的招牌而诉诸法律,出现不良竞争。另外,其制作质量也参差不齐,有的作坊依旧采用传统技法熬制颜料,有的作坊则采用了现代化学颜料,制作出的年画颜色深浅不一,色泽晦明不同。同时也存在着刻画技艺高低的差别,有的作坊木版年画人物表情呆滞,有的比较鲜活;有的作坊采用五色套印,有的则采用六色或七色套印。这就导致一个地方的同个层次的木版年画会出现多种价格。这些都不利于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品牌建设。

河南其他地方的特色工艺品发展也存在类似问题,如淮阳的泥泥狗,虽有初步发展,但仍然以家庭作坊式的生产销售为主,价格差参不齐,销售渠道单一。总之,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三、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整体来看,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制约。

1. 特色工艺品产业发展的相关人才缺乏

从特色工艺品创作的从业人员看,由于受到当前经济发展与就业形式多样化的影响,已经鲜有人愿意从事工艺品制作。另外,特色工艺品也缺乏规范的传承体系。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大多特色工艺品的制作仍是靠师徒手传口授、父子或母女相传的方式而延续。这样的传承方式导致特色工艺品技艺因人而存、人

亡艺失、濒临灭绝的境地,一些优秀的民间艺术可能会伴随着老艺人的逝去而销声匿迹。通过对豫北 200 余位民间剪纸艺人走访调研发现,新乡市获嘉县照镜镇剪纸艺人李同秀已达 90 岁高龄,而 60 岁以上的剪纸艺人占 89%,尤以 65~80 岁的人最多,剪纸大多为邻里婚丧嫁娶所用,不出售(除极少人做纸扎出售外),96% 的剪纸后继无人。^[3]

从特色工艺品的创新发展看,特色工艺品的制作主要依靠民间艺术传承人,而他们的创作由于受固有模式的限制,很少能够做到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不断创新,致使产品形式单一,不能很好地适应消费者需求,没有市场。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不仅需要有一定文化修养、专业技能的专业人才,更需要懂销售、会管理的专业人才。从特色工艺品的销售人才看,基本上没有专门从事营销的人员,都只是在家庭作坊里等待买家上门求购,销售渠道单一,影响市场效益。从产业管理人才角度看,专业管理方面的人才基本上没有,地方政府管理不到位,个体企业(作坊)管理理念缺乏。

2. 特色工艺品产业理论研究薄弱

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撑,也需要一定的理论指导。深化对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的理论研究,可以为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但从目前看,大多数学者只关注特色工艺品的属性、地域特点,对于其产业结构、产业链建立、产业化途径和措施等则缺乏深入研究。没有相关产业理论作指导,产业化发展会滞留在较低的层面上,产业发展方向不明朗,产业化发展受限,难以起到助推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的作用。

3. 政策支持不够,激励机制不健全

从寻求经济新增长点角度看,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性虽逐渐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可,但这种认识只是停留于表象,虽然也有

一些政策、资金扶持,但尚缺乏完善的配套措施,缺乏对扶持政策的贯彻和资金流向的监督体制,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导致无序开发、不良竞争现象时有发生。

四、推动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著名文化遗产保护倡导者、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曾指出:“传统手工艺的时代转型是个大问题、大难题……当今从社会结构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再到审美观念都在改变。作为生活应用性的民间美术,必须适应这种转变。”^[4]因此,对特色工艺品进行适应性的改造,就成为创新发展特色工艺品的必由之路。而特色工艺品的创新发展,需要深入挖掘特色工艺品所蕴涵的传统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对特色工艺品进行再设计、再包装,以实现其实用功能、审美功能的转型,使其成为满足当代人们物质、精神需要的消费品。同时,也应适应产业经济时代的市场需求,借鉴相关文化产业理论,推动特色工艺品产业向文化创意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此,针对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以期促进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

1. 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提高理论研究和创新能力

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亟需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营销人才,应注重专业队伍建设,培养专业化、规模化、规范化的管理人才和营销人员,为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这种人才培养,可以依托地方高校的相关专业来开展,如可在一些高校艺术专业中开展美术技法培训,强化传承人的美术创作技术;设置艺术市场管理专业,培养从事特色工艺品开发、营销的专门人才。可形成特色工艺品传承人与高校专家合作、特色工艺品

管理人员和营销人员与企业合作的新局面,打造由高水平艺人、专业管理人员、营销人员和高校专家组成的多层面人才队伍,为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

另外,应提高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理论的研究水平。特色工艺品资源面临着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其产业化发展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运用。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要避免走弯路,需要由专家学者、特色工艺品设计开发人员、企业科技人员联合组成科研团队,加强对特色工艺品相关理论和设计创新的研究,包括从特色工艺品的生产材料到市场需求、从田野考察到数据的分析整理,把握特色工艺品造型、技法、色彩、材质等方面独特的美学价值,进而把特色工艺品资源变成优质的艺术商品,实现其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变。

近年来,高校中已经有一批学者在关注和研究特色工艺品的保护和创新发展问题,也有高校在一些艺术类硕士研究生中培养了一部分民俗艺术方向的人才^[4],国家层面也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研修、研习和普及培训(特别是工艺美术类),为特色工艺品的创新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5],这是可喜的局面。但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人才的去向和成果的利用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政府加强引导和监督。

2. 加强政策性导向,完善配套措施

政府的政策性导向无疑对特色工艺品的保护和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优惠、资金支持等措施,对民间艺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鼓励作用。但这些措施要有效发挥作用,还需要完善特色工艺品资源保护和产业化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加强特色工艺品产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完善配套措施,设立专项资金,进行重点扶持,制定整体发展规划,完善监督、评估体系,真

正实现特色工艺品的可持续发展。

完善配套措施是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的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的配合与支持。目前,特色工艺品产业存在的不良竞争、侵犯知识产权、融资渠道不畅、税费繁杂等问题,都需要政府尽快在法规和政策层面解决和完善。

3. 培育区域品牌,打造特色工艺品产业集聚区

品牌是工艺美术产业发展的旗帜和振兴的标志^[6]。河南特色工艺品资源丰富、种类繁多,要进行产业化开发,就要找准发掘和利用的着力点——突出区域特色,树立地方特色品牌,形成品牌效应。品牌化建设需要长期的市场培育,一方面应加强产品的研发,从产品的审美、实用、包装等方面实施文化精品战略;另一方面应加强生产、市场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和不正当竞争,杜绝对品牌产品造成损害的行为。

产业集聚区是基于产业价值链的关联性企业或产业在一定地域内的聚合体。河南特色工艺品资源虽然分散但区域特点突出,应利用好这一优势,进行区域规划,保持独特的区域化特点。在进行特色工艺品区域规划时,应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园的集聚效应,带动相关特色工艺品产业形成集群化优势。特色工艺品企业应纳

入文化产业园区,进行集中规划、管理,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充分利用文化园区进行特色工艺品产品统一的展示和销售。目前,河南省的禹州、汝州、开封朱仙镇等地虽已经依托具有优势的地方钧瓷、汝瓷、年画等文化产业,进行文化产业园的规划,但从全省来看,尚未真正形成有影响力的产业集聚区,这方面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以实现名副其实特色工艺品的产业化集聚。

4. 拓展产业链,发展多元化产业模式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需要有完整的产业链条来支撑,因此,拓展特色工艺品产业链,是实现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传统生产方式中,以家庭作坊生产为特色的工艺品,处于产业链中的最低端,产品附加值小、收益低。以开封朱仙镇年画为例,1990年代,虽然声名远播^[7],但长期处于“年画好看,效益极低”的尴尬境地,没有形成产业链。近年来,朱仙镇以年画为核心,通过设立年画社、博物馆、文化产业园、年画国际研讨会等,采取传统年画与现代企业文化结合等措施,拓展年画销售领域,延伸年画产业链,年画带来的效益初步显现。如万同年画社,不仅对朱仙镇年画材料做了整理,又结合年画的特点为开封菊花展、中国邮政等设计作品(见图1),既展示了企业文化,又弘扬了



a) 开封菊花展宣传画



b) 中国邮政卡片

图1 朱仙镇木版年画创新作品案例

年画艺术。可见对于特色工艺品产业而言,通过构建特色工艺品产品—博物馆、产业园—国际研讨会(展销和理论研究)—企业文化—包装设计(撷取相关元素)—旅游产品等现代文化产业链条,可使相关行业产生拉动效应,实现特色工艺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特色工艺品产品应注重个性化、独特性的创造,特色工艺品的个性化特点决定了其产业化发展需要走多元化的道路,既要探索现代企业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又要保留传统家庭作坊的个性化生产;既要利用行业协会进行组织协调,又要鼓励民间艺人进行艺术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保证特色工艺品健康有序地发展。

以上,从政府到民间、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到企业,我们从各个层面和角度分析了目前河南特色工艺品产业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特色工艺品资源产业开发的相应对策。希望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有效保护特色工艺品,对亟待拯救的特色工艺品进行适应性改造,创新出具有实用价值的产品,使其逐步形成产业规模,以适应

当代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进而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 [1] 汪振军.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产业化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46.
- [2] 张继中. 朱仙镇木版年画[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2: 8.
- [3] 杨远. 濒危民间艺术遗产的传承创新思考——从豫北剪纸的调查谈起[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5): 82.
- [4] 冯骥才. 中国传统民间美术的时代转型[J]. 艺术生活, 2009(2): 15.
- [5] 文化部非遗司.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暑期试点工作评估报告[R]. 北京: 文化部非遗司, 2015.
- [6] 张玉磊. 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河南工艺美术保护与发展[C]//王日新.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报告(2013). 郑州: 海燕出版社, 2014: 222.
- [7] 王日新. 中原记忆: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3: 218.

(上接第70页)

学艺术作品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目前,我国理论界对该类著作权保护研究关注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由网络畅销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是文学艺术作品,我们应根据其本身特质,加强对该类影视作品著作权的研究,完善有关编剧署名权归属的法律法规,提升相关法律责任主体对著作权保护的法治意识,使其掌握更多的救济手段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对由网络畅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著作权的保护。

参考文献:

- [1] 王迁. 著作权法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61.

- [2] 王玮. 浅谈我国影视改编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4(6): 55.
- [3] 刘宁. 合作作品构成要件与认定标准探析[J]. 福州大学学报, 2009(6): 60.
- [4] 陈锦川. 著作权审判原理解读与实务指导[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4: 316.
- [5] 邱宁. 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未经许可的演绎作品之著作权辨析[J]. 法学杂志, 2012(4): 143.
- [6] 鲁昱晖, 朱婷婷. 网络小说改编影视剧的版权问题[J]. 青年记者, 2015(33): 86.
- [7] 李波. 论编剧的署名权保护——由电影《墨攻》案引发的思考[J]. 法制与经济, 2010(6): 76.



引用格式:朱畅然. 史前到北朝陶瓷器物上舞蹈图案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5):103-108.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5.01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5-0103-06

史前到北朝陶瓷器物上舞蹈图案研究

Study on the dance patterns on ceramic utensils from prehistoric to the Northern Dynasties

朱畅然

ZHU Chang-ran

郑州轻工业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关键词:

陶瓷器物;
舞蹈图案;
装饰纹样;
祭祀乐;
新声调乐舞;
胡腾舞

摘要: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陶瓷器物的纹样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中国史前到北朝时期陶瓷器物上出现的舞蹈图案,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思想意识、审美观念等,也表明从史前时期的宗教祈求平安的祭祀乐,到西晋时期改革乐器伴奏的新声调乐舞,再到北朝时期供人享乐的胡腾舞,乐舞逐渐成为一种可供欣赏、可陶冶情操的娱乐活动。

收稿日期:2017-04-02

作者简介:朱畅然(1992—),女,辽宁省法库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早期美术。

中国从史前到北朝出土的陶瓷器物众多,陶瓷器物的纹样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符号特征,其中的一些图案装饰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我国传统艺术的发展状况,如不同时期陶瓷器物上的舞蹈图案。目前学术界从舞蹈艺术的角度对这些图案的研究,尚未形成纵向联系。鉴于此,本文拟以史前到北朝的陶瓷器物上舞蹈图案为切入点,对我国早期舞蹈艺术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权作抛砖引玉。

一、不同时期陶瓷器物上的舞蹈图案

中国史前到北朝时期的陶瓷器物种类繁多,其中以舞蹈图案形式出现的装饰纹样颇具特色,在陶瓷装饰上尤为突出。

1. 史前时期陶瓷器物上的舞蹈图案

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步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1](见图1),是一种水器,被视为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珍宝。该舞蹈纹彩陶盆口径29 cm、腹径28 cm、底径10 cm、高14 cm,器形较大,敛口、卷唇、鼓腹,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唇与内外壁均有彩;主题纹饰为舞蹈纹,五人一组,手拉手,面向一致,头侧各有一斜道,似为发辫,摆向划一,每组外侧两人的一臂为两道,似反映空着的两臂舞蹈动作较大而频繁之意。

2. 西晋时期陶瓷器物上的舞蹈图案

1987年6月出土于安徽省青阳县庙前镇新发村的西晋墓中的人物堆塑谷仓罐^[2](见图2),通高32 cm,最大腹径26 cm,底径17 cm;胎

体厚重,呈灰褐色,胎质较粗松,腹上部施青绿釉,胎釉结合尚好。一组六人舞乐于罐上,左边一人面右跪坐,置琴于膝,双手弹琴,微露笑容;右边两人一人持箫吹奏,一人执槌击鼓;其下两人相向而立,作双手拍节奏状或抬手挥臂歌舞姿;右后上侧,一人昂首抬脚,左臂上举,右手放置嘴边,似在纵情叫喊。

3. 北朝时期陶瓷器物上的舞蹈图案

1971年在河南省安阳县洪河屯村的北齐范粹墓中出土的黄釉扁壶^[3](见图3),模制,高20 cm;形体扁圆,上窄下宽,蔽口短颈,颈与肩连接处施联珠一周,两肩各有一孔作穿带用。壶身全施橘黄色釉,底部有凝脂状酱色釉珠,釉色不均匀,底部挂釉。该壶之图案以两幅乐舞场面最为突出,中央一人娉娉起舞于莲座上,右手前伸,左手下垂,双足腾跳,反手回顾,动态盎然。左边二人,一人手持笛吹奏,另一人侧身,注视舞



图2 人物堆塑谷仓罐(藏于青阳博物馆)



图3 黄釉扁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1 舞蹈纹彩陶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者,双手仰起作打拍状;右边二人,一人手执五弦琵琶作弹奏状,另一人面向舞者,双手击钹。

二、不同历史时期陶瓷器物上舞蹈图案的艺术特点

不同历史时期陶瓷器物上的舞蹈图案组合、人物造型、工艺技法各不相同。

1. 舞蹈图案组合

舞蹈纹彩陶盆是一件以原始舞蹈为图案的彩陶盆,彩陶盆内壁直径最大处绘四圈平行带纹,最上端一道较粗。内壁接口沿处绘有一圈带纹,上下两组带纹之间绘有舞群人物三组,每组两边亦有向内弧线纹,一般为七条,其中两组分别为五条和八条。在相反两组弧线纹之间,有一条斜行的柳叶形宽带纹。金维诺指出,“舞蹈队列画在盆的内壁上,三列舞人环绕盆沿形成圆圈,下有四道平行带纹,代表地面,盆中盛水,则舞群似在水边,和池中倒影相映成趣,装饰意匠是别出心裁的”^[4]。也有学者从构图角度对舞蹈纹彩陶盆作了分析,如马明明^[5]认为,暂将四道圈纹的含义搁置,考虑一下它们在组成整个舞蹈纹环带画面的视觉作用。如果把其中三道圈纹去掉,前后对比效果见图4,上图为从舞蹈纹原图截取的一部分,下图为去掉三道圈纹后的样子,显然下图的整个图像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可见在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先民的审美观念已经产生。但笔者认为,除此以外,该图案还有深刻的文化

内涵。绘在陶盆内壁中上部的舞群,三列跳舞的人环绕盆壁形成一个圆圈,图案颜色较深并且能清楚地分辨出人物的动态。舞群下面是四圈平行带纹,可以看出每圈带纹的绘制并不均匀,但最上端一圈明显粗一些。笔者认为下面三圈带纹象征着水波,此陶盆若盛水,在四圈平行带纹最上端一圈的位置,可以隐约看到其他三圈带纹如同水波一般,舞群似在池边跳舞,和水中倒影相映成趣。在盆沿上的一圈带状纹饰除有装饰的作用外,还被赋予了天的含义,表示人类活动在天地间。在每组舞群两边各有相反两组弧线纹为装饰纹样,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产生了并行线纹饰,有的呈水平并行线,有的呈弧线并行线,线条流畅,间隔相等,犹如今天的人们用仪器所描绘。这种纹饰并非我国仅有,在世界不少国家的古代工艺作品中都可见到。这并不是由于彼此的影响与相互传播,而是因为此种纹样(如水波、树轮、皮毛等动植物天然形成的旋纹)是基于人类一种共同的基本的审美感受,以及它的不断扩展、生长感、力量感所给予人们的一种形式领悟,从而在装饰纹样上产生了共同的美的线形。另外,每两组之间还有一条斜行的柳叶形宽带纹,共三组。笔者推测,舞群两边的弧线纹可能为河边的树干或者垂柳的枝条。为了突出舞群,河边的树干只做装饰之用,绘一个柳叶既能表示是树还能较好地衬托舞群之美。

人物堆塑谷仓罐的器物主体为五联罐,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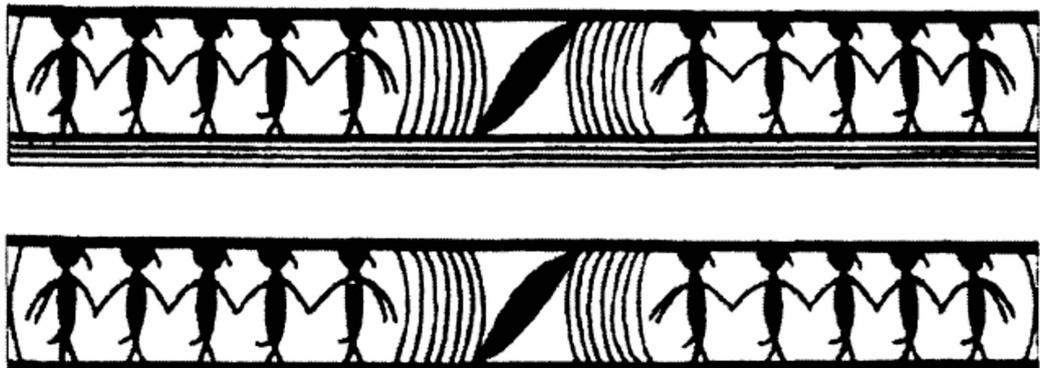


图4 舞蹈纹盆图案

间大罐平底,四只小罐呈十字对称式平行设置;在大罐肩部四只小罐之间堆贴有四组人物群塑。由于本文的研究重点为舞乐,因此这里只对第一组舞乐进行探究。春秋战国时期,音乐开始发展,相比原始乐舞,出现了乐器。魏晋时期,西、北各少数民族逐渐向内地迁徙,这促使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包括乐舞文化。由于战乱,一部分居民迁去南方,受江南吴声胡曲的影响,清商旧曲逐渐蜕变出了适合演唱江南民歌的新声调,新声调的伴奏乐器以弦乐器为主,也兼用管乐器。因此,出现了谷仓罐上一人弹琴、一人吹箫、一人击鼓、两人跳舞的组合形式。

北朝时期的黄釉扁壶腹部两面均模印五人一组的乐舞图案,两边图案相同。乐舞人物上端有一排连续的忍冬纹,是沿丝绸之路传播来的,在南北朝时期最流行,因它越冬而不死,所以被大量运用在佛教器皿上。舞者脚下的莲花纹,与当时佛教的盛行有关,寓意人的灵魂不灭、轮回永生。这种舞乐形式的出现,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西域音乐大量传入。可见,是陶瓷制作者把西域乐舞、绘画、宗教等文化符号巧妙地进行组合并模印在黄釉扁壶上的。

2. 人物造型

舞蹈纹彩陶盆上的舞蹈图案为每组五人手牵手状,面向一致,小人头上有类似于发辫的装饰,都偏向一侧,每组靠近外侧的两个舞蹈小人的外臂上均由两条短线组成,像是模仿舞蹈动态幅度之意。^[6]每组小人都以一足支撑重心,另一足做起势或落势的舞蹈动作,人下体有三道,接地面的两竖道为两腿,下腹体侧有一斜道。关于这条斜道,学术界有不少争议。王克林^[7]通过对土著民族舞蹈图画装束情形的研究,结合这条斜线的所在部位,分析后认为:此道应当是生殖器官保护带类的装束。戴春阳^[8]通过对舞蹈者体型体态的推测,认为彩陶盆上舞蹈者下腹体侧的一道,应该是女子腰间飘拂的某种织饰带,其功用当然是为着饰美。李泽厚^[9]则

从古史文献记载与舞蹈纹中人物的装饰上推测,孙家寨彩陶的舞蹈纹表现的是一种图腾活动,具有严肃的巫术作用,舞蹈纹中的人物臀部的斜出之物为操牛尾,头部的装饰是干戚羽旄——笔者偏向这种说法,理由是:徐旭生^[10]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谈到,《山海经》中所说的昆仑之丘即青海高原。有传说昆仑山瑶池住着西王母,长着豹子尾巴。《山海经·西山经》记载,“又西北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11]^[47]。《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11]^[237]可见,早期的西王母形象,与女娲炎帝黄帝等神一样,都带有兽相。因此,笔者推测,舞群大腿根部斜道是先民模仿西王母的一种祭祀活动,五人手拉手的女性在柳条垂落的小河边跳着祭祀的舞蹈。

人物堆塑谷仓罐上的舞乐六人,一人跪坐置琴于膝、二人吹箫击鼓、三人歌舞。这些人物为高鼻窄额,戴夹顶、元宝形帽或系巾帻,均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由于胡人的迁徙,文化的融合,舞乐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死后人们也希望可以在另一个世界有舞乐欣赏。由此可见,西晋时期人们对舞乐的精神需求大大提高。

黄釉扁壶壶腹上模印一人歌舞、一人吹奏、一人打拍、一人弹奏、一人击钹。五人皆高鼻深目,头戴蕃帽,身着窄袖长衫,腰间系带,足蹬半筒高靴,是典型的西域人形象。^[12]根据文献考证,五人跳的乃是风靡当时的胡腾舞。^[3]这种胡腾舞是一种流行于古代西域的民间舞蹈,此舞大多以男性胡人为主,其特点多以腿脚功夫见长,既提膝腾跳、刚毅奔放,又潇洒诙谐、雄健矫捷。唐刘言史诗“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四座无言皆瞪目,横笛琵琶遍头

促”^[3],正是对这一场面的写照。

3. 工艺技法

时代不同,陶瓷器物上的装饰纹样也不同,工艺技法亦不一样。原始时期的陶瓷技艺比较简单,首先考虑的是实用,然后才考虑其美观,即装饰作用。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装饰丰满,内彩很发达,在器物的内部和外部都有加彩,且善于运用曲线,追求动感。这一时期的舞蹈纹盆的装饰纹样,大多是用黑色颜料绘于橙底的陶盆壁上的几组相同的人物图案。随着物质需求逐渐得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有所提高。两汉时期,陶瓷工艺开始出现显著的提高和发展。到了西晋时期,国家安定,越窑青瓷的烧造技艺又有所提高。人物堆塑谷仓罐正是这一时期的新作,它采用雕塑、堆塑、贴塑等手法,生动地表现出人物的形态和神态,既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又赋予谷仓罐以特殊的意义。北齐时期的陶器包含双色以上的釉色,白胎陶器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范粹墓中出土的黄釉扁壶,装饰纹样的工艺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采用模印的手法,在模具上用阴刻法,再模印到壶身,制作起来更加省时省力。

三、不同时期陶瓷器物上舞蹈图案的文化内涵

任何事物的发展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背景,每个历史时期陶瓷器物上的纹样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陶瓷是因为农业的出现和定居生活的需要而引发的造物设计,它首先是生活用品,但同时也是艺术造型作品;它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人类开始创造出一种物象,通过平面图形来再现现实生活,比如陶瓷器物上的舞蹈图案。

1. 史前时期舞蹈图案的文化内涵

舞蹈纹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作品,原始农耕时代、母系社会的鼎盛时期,以及图腾崇拜和巫术礼仪并存的时代,造就了这个时期高度发达的原始艺术和原始宗教。

舞蹈纹盆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也标志着人类思想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原始社会早期并无任何形式的宗教可言,人类以集体的力量和简陋的工具与自然界作斗争,然而对自然界的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尚不能够科学认识。于是,恐惧和希望交织在一起,将许多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神秘化,从而产生了原始宗教。宗教是人类心灵的一种寄托,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刻画出神,有保平安的意味。笔者认为,舞蹈纹盆上的舞蹈图案是古代人们在祈求神的庇佑活动时的一种记录。《尚书·虞夏书》也有“击石扮石,百兽率舞”^[14]的记载,所描述的是在原始石制乐器的敲击伴奏下所表演的狩猎舞。舞蹈纹盆的整个画面,人物突出,用实线条表现,重在写实,描绘了先民们在劳动之暇,在大树下、小湖边,手拉手集体跳舞祈求神庇佑的情景。

2. 西晋时期舞蹈图案的文化内涵

青瓷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制瓷水平的一大进步,西晋时期以玉为贵,而青瓷恰好色调泛青,质感如玉,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儒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加之贵族阶层斗富,“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随葬品也竞相豪华奢靡。而司马炎在强调发展生产的同时,反对奢侈,厉行节俭。当时社会,儒家推行以孝为先、佛教追求极乐世界、道教倡导修炼以求长生不老,三种思想碰撞融合后,加之巫术文化的长期盛行,“灵魂不灭”的思想成为社会的共同信仰,给谷仓罐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谷仓罐的设计,罐上堆塑涉及衣食住行游娱方方面面,其中乐舞既是死者生前喜爱的娱乐活动,又是其希望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仍可以继续欣赏的娱乐活动。这样设计,一方面解决了烧制大量随葬品所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问题,另一方面也使青瓷的设计寓意深刻、整体和谐统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审美价值,成为当时造型最复杂、装饰设计手法和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种明器。作为最典型的青

瓷明器之一的谷仓罐,它巧妙地将两者融合在一起,既是对死者生前生活的真实写照,又是对来世的一种希冀。

3. 北朝时期舞蹈图案的文化内涵

北齐时期的农业、盐铁业、瓷器制造业都相当发达,单色瓷、双色釉白胎陶器在当时得到迅猛发展。这个时代流行截面近似杏核形的穿带扁壶,釉陶和瓷质兼具。后世出土的北朝时期陶瓷制品数量较多,但造型单一,形制上与前一时期扁壶没有关联,出土地域仅限于北方地区,皆为安阳窑、巩县窑、邢窑等北方窑口产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大融合时期。民族混战、政权更替,尤其是北方各族聚居、杂居的局面,使得自西汉以来中国与西域之间的音乐传播更加畅通无阻,不同民族之间的音乐文化得到了广泛的接触与充分的交流,又因为魏晋时期的铜多用于铸币,许多青铜器以铁器和陶瓷代替,从而促进了陶瓷的需求和生产,因此陶瓷开始渗入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瓷器的纹饰以模印为主,流行胡人乐舞、对凤、驯狮、联珠纹等带有异域文化色彩的纹样。北齐统治者对胡文化的痴迷曾使北齐境内胡风盛行,对西域乐舞的痴迷也影响着北齐境内士人阶层与中下层对于西域胡乐舞的追逐。胡腾舞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男子独舞,流行于北朝至唐代,当时深得中原贵族赏识,风靡一时,配着回鹘乐曲,既雄健迅急、刚毅奔放,又柔软潇洒、诙谐有趣。黄釉扁壶除壶身舞蹈图案外,还印有忍冬纹、联珠纹,这些都是西域绘画中常见的纹饰,这当是北齐时期西域文化影响中原地区最为直观的证明。黄釉扁壶与舞蹈图案的结合还体现出该时期“气韵生动”^[15]的美学趣味。因此,人们在陶瓷上印制胡腾舞形象就是情理之中的事。

四、结语

各个历史时期陶瓷器物的纹样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中国史前到北朝时期陶

瓷器物上出现的舞蹈图案,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思想意识、审美观念等,也表明从史前时期的宗教祈求平安的祭祀乐,到西晋时期改革乐器伴奏的新声调乐舞,再到北朝时期供人享乐的胡腾舞,乐舞逐渐成为一种可供欣赏、可陶冶情操的娱乐活动。

参考文献:

- [1]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J]. 文物,1978(3):48.
- [2] 朱献雄. 安徽青阳县清理一座西晋残墓[J]. 考古,1992(11):1050.
- [3] 河南省博物馆. 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72(1):47.
- [4] 金维诺. 舞蹈纹陶盆与原始舞乐[J]. 文物,1978(3):50.
- [5] 马明明. 对青海大通舞蹈纹彩陶盆的再阐释——关于史前艺术对远古社会形态表现的个案研究[D]. 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09.
- [6] 潘旖妍. 生命之舞——对舞蹈纹盆纹饰的浅层图像解读[J]. 水墨丹青,2012(5):72.
- [7] 王克林. 彩陶盆舞蹈图案辨疑[J]. 考古与文物,1986(3):47.
- [8] 戴春阳. 舞蹈图案彩陶盆辨析[J]. 考古与文物,1994(4):33.
- [9]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26.
- [10] 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
- [11] 山海经[M]. 李荣庆,马敏,注释.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 [12] 古开花. 北齐范粹墓及同期墓葬中的西域文化[J]. 考古研究,2013(5):26.
- [13] 袁胜文. 陶瓷扁壶的源流[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10):93.
- [14] 李民,王健撰. 尚书·虞夏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9.
- [15] 朴相泳. 略论“气韵生动”及其美学意义[J]. 理论学刊,2005(4):123.